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教育

贵  
甲 秀 昌 明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秀昌明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 12.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1-18593-8

I . K297.31; G52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B11J27 号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教育

## 甲秀昌明

JIAXIU CHANGMING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出版人 朱文迅  
策划编辑 谢丹华 汪琨禹  
责任编辑 陈章  
装帧设计 陈电  
责任印制 黄红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2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2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94千字  
书号 ISBN 978-7-221-18593-8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胡忠雄 王 宏

成 员 戴建伟 邓 谦 汪延皓 刘丽先 李 波

宋庆松 何谋军 胡 琳 杨 菲 沈 兵

何 丹

总 审 订 史继忠 郑荣晴 文思宛 杨 青 彭文俊

办公室主任 邓 谦

##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顾 问 陈祖武 顾 久

主 任 史继忠 郑荣晴

## 《甲秀昌明》编委会

主 任 李 波

副 主 任 齐 忠 肖 文 徐 刚 李 莉 郑 胥  
张雪丽 齐贵生 李 玮 李明昌 刘贵新

成 员 市教育局各处室、市直属学校（单位）、  
区（市、县）教育局负责人

指导专家 史继忠 郑荣晴 段 洪

## 《甲秀昌明》编辑部

主 编 刘贵新

副 主 编 龙 林 杨冬宁

撰 稿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益鑫 李 旭 陈 希 肖婵婵

黄登贵 曾 岚

图片提供 吴位弟 刘贵新 龙 林



## 总序

胡忠雄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而镶嵌在云贵高原的明珠——贵阳，更是被一代代文人迁客所推崇和追捧。五百年前，一代圣贤王阳明初到筑城，便对贵阳山水发出“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羨九华”的赞叹，后来龙场悟道又对贵阳气候给予“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的盛赞。山水之城与避暑天堂完美邂逅，让人在如春凉夏的惬意中尽享如诗时光，爽爽贵阳就这样在夏日的徐徐清风中向我们走来……

徜徉于这座有着山水禀赋和文脉传承的城市，攀黔灵山，感叹“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的天地造化；游南明河，体悟“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的天人和谐；登甲秀楼，领略“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城市韵律；访文昌阁，见证“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的城市文脉，一山一水尽显气韵，一楼一阁各展风流。

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硃坐万竹中，凉风生静衣”，是黔中贤士竹林畅游对清风送爽的感慨；“虹霓蒸海气，烟雾洒春岚”，是明朝文人送友赴任对宜人生态的赞誉。大自然对贵阳格外偏爱、不吝馈赠。北纬 26 度、平均海拔 1100 米，最佳的纬度与高度在这里相拥，造就了地球上最美的风景

和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夏季平均气温 22.3℃、相对湿度 76% 至 79%，最佳的温度与湿度在这里相遇，让人体机能良性运转、肌体活力充分焕发；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1 万多个、平均风速每秒 3 米以下，最佳的浓度与风度在这里相逢，让人沉浸氧海、吸氧畅游。无与伦比的“六度”，孕育了这方独一无二的康养胜地，成就了贵阳蜚声中外的避暑美誉。

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四万年前，贵州先民在高峰镇招果洞建造了“洞穴家园”，创造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之一，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两千年前，秦通楚道，汉置牂牁，神秘的夜郎古国融入了汉帝国，成为汉文化天空中一颗灿烂星辰。一千二百年前，自唐代开始，开阳兴起丹砂开采，逐渐成为中国丹砂采冶的重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中国红”。一千年前，从宋代以后，青岩古道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形成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无数传奇故事、历史沉浮都在马帮的声声驮铃中回响不息。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远赴南京觐见朱元璋，化解了西南边陲战乱危机，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千古佳话。五百年前，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参学悟道、开宗立派、教化民风，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无数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以身证道、改天换日，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一处处红色地标熠熠生辉，留给贵阳人民厚重的红色基因。六十年前，“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的“三线”建设者，以青春抒写家国情怀，铸就了砥砺前行、艰苦创业的精神丰碑。古往今来，渊深厚重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滋养着贵阳儿女、浸润着黔中大地，造就了“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精神品格，生生不息、历久弥坚。

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

看扶风山泉清树古，茂林掩名祠，奇山藏书院，体悟“雨滋苔藓侵阶绿，露洗松阴满院清”的幽静雅致。看天河潭飞瀑流湍，水自天上泻，雾从云中生，沉浸“空山闻水声，碧潭衍飞瀑”的壮阔景致。看森林公园林木蓊郁，立黔南首关，俯重峦叠嶂，饱览“一山高耸翠微巅，突兀穿云欲到天”的钟灵毓秀。看十里河滩水明如镜，流潺潺岁月，忧芸芸苍生，尽享“真山真水到处是，几步花圃几农田”的田园风情。看红枫湖一碧万顷，织河道沟汊，集旧沙湾洲，欣赏“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的诗情画意。看高坡云顶碧草连天，草长莺飞绿，奔马驰浩瀚，沉醉“倚空千嶂横起，银阙正当中”的静谧灵动。还有弦歌不辍的孔学堂，碧水苍山的鸭池河，童趣盎然的云漫湖，浪漫温情的花溪公园，古朴幽深的青岩古镇，绚丽绽放的万亩樱花，玉水金盆的底窝八寨，烟雾缭绕的南江大峡谷……延绵百里的环城林带，穿城而过的南明河水，星罗棋布的绿地公园，缓缓铺展出“十里山水半入城”的美丽画卷。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居于闹市高楼也能品山水之味，游走林间田舍也能赏城市之美，寄身市井巷陌也能享湖草之乐。崇尚天人合一的贵阳人，早已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浸透血脉、融入灵魂。

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辣，构成了贵阳美食的底色。糟辣椒、糊辣椒、油辣椒、烧辣椒、糍粑辣椒，辣得酣畅，软糯香滑的辣子鸡、麻辣松脆的香酥鸭、行销全球的“老干妈”，成为无数游子的“乡愁”寄托。酸，勾勒了贵阳美食的特色。酸可与一切相溶，红酸、白酸、鱼酱酸、晒醋酸、杨梅酸，酸得过瘾；酸可与一切相遇，鲜鱼、牛肉、猪蹄、肥肠，热气腾腾的酸汤火锅，既开了胃又暖了心。奇，增添了贵阳美食的亮色。贵阳有数百种小吃，肠旺面筋道弹牙、牛肉粉汤鲜味美、糯米饭咸甜相宜，在每个早晨唤醒沉睡的味蕾；清新的丝娃娃肚容万物、热辣的豆腐果外焦里嫩，在每个小摊等待逐味的老饕；滚烫的糕粑稀饭甜糯香浓、冰凉的玫瑰冰粉沁人

心脾，在每个街角惊艳疲惫的心灵；爽脆的折耳根其貌不扬，却能在每碗蘸水中释放奇特的口味。鲜，体现了贵阳美食的绿色。最优良的环境、最洁净的土壤，造就了绿色生态的山野之味，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等“黔菇”，雷竹笋、方竹笋、楠竹笋等“黔笋”，香椿、阳荷、蕨菜等“黔芽”，与甘甜井泉不期而遇，完美诠释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辣、酸、奇、鲜，在此起彼伏的吆喝、摩肩接踵的喧嚣、流光溢彩的夜市中，绽放出“千家万户店铺开”的市井烟火。

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这里有贵酒黔茶。“贵山贵水迎贵客，好山好水出好酒。”酱香白酒醇香浓厚、手工米酒清香甘甜、生态果酒蜜香飘逸，“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贵酒已凝成时光的幽雅细腻，汇成岁月的回味悠长。“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盛赞黔茶“其味极佳”，滋味香浓的都匀毛尖、不疾不缓的湄潭翠芽、汤色红艳的普安红茶，在沸水升腾中奏响自然的韵律、释放大地的芬芳。这里有贵银苗绣。“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千年非遗历久弥新，“纹、珠、饰”美轮美奂，“绣、画、染”出神入化，千锤百炼的银饰，巧夺天工传“绝活”，银丝万缕间闪耀民族艺术之光；大美无言的苗绣，绣出时尚新“国潮”，飞针走线中编织民族无字华章。这里有黔药贵果。“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苗岭山脉间，孕育着一座“天然药物宝库”，56个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95种黔产道地药材遍布黔中大地，成就了以杜仲、灵芝、天麻为代表的“贵州三宝”黔草名片。“奇山秀水出珍果”，猕猴桃、刺梨果、蜂糖李、红樱桃、火龙果……这些蕴山水之灵秀、领自然之神韵的绿色食品，是“舌尖上的贵州制造”，也是献给世界的健康礼包。

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纵情山水之间，没有案牍劳形、车喧马嚣，只有逍遥自得、从容悠然。这里，让莘莘学子神往，革命圣迹、儒学基

地、地质公园，是感悟精神、研学心修、探索奥秘的宝地，可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这里，让年轻一代心动，奇峰峭壁、清溪飞瀑、深涧幽洞，是攀岩探险、漂流露营、山地运动的天堂，可在“忽魂悸以魄动”中饱览鬼斧神工。这里，让不惑一族躺平，民族风情、古镇文脉、乡村民宿，是都市休闲、农耕体验、亲子游玩的乐土，可让“久在樊笼里”的身心“悠然见南山”。这里，让银发老人忘忧，天然药谷、生态氧吧、矿物温泉，是理疗康养、候鸟旅养、修身颐养的福地，可在“游目骋怀青山间，物我两忘绿水中”享受最美夕阳红。每一位旅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埋心底的诗和远方。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让我们通过《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穿越重重关山，冲破氤氲云雾，相遇“爽爽贵阳”，共赴心灵之约、共鉴山水之美、共品人间之味、共享“六爽”之魅！



## 编写说明

《甲秀昌明》定位为一部集中展现 600 年来贵阳教育的勃兴、转型及发展之通俗读物，在选材、语言、结构、风格等方面，突出大众性、故事性、可读性、专题性、科普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精选基本史事，将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融入教育故事的历史叙述和评判中。如讲明代的五个书院以展现王阳明教育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明代教育蓬勃兴起；讲三条状元街以呈现贵阳的科举名流、甲秀盛况；讲李端棻等贤人名士以彰显他们对促进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讲抗战时期内迁和新建的六所大学以突显贵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的短暂兴盛，等等。

第二，以通史为基本架构，努力实现教育历史与通俗读物的结合。《甲秀昌明》参照通史编纂体例，以时序即时间为基本架构，以“专题（3 个）+ 故事（17 个）”的形式呈现，展现贵阳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使读者了解其历史演变基本脉络，既呈现贵阳教育的“实”，也凸显贵阳教育的“彩”。

第三，充分考虑教育史实资料的真实性及其研究权属。《甲秀昌明》是从贵阳市教育系统遴选出来的优秀骨干教师，紧紧依靠专家的指导和中共贵阳市委总编委的编纂意见，在参阅权威教育史实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数易其稿编纂成书的。所采信的史实资料，以其事，求其是。



# 目录

引 言	01
-----	----

---

第一章 明代教育勃兴	07
------------	----

---

一、贵州宣慰司儒学	11
二、龙冈书院——千古龙冈漫有名	37
三、文明书院——知行合一首讲地	52
四、王门弟子兴书院	60
五、贵州设闾乡试始	71
附表	80
1-1 明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贵州首科举人名录	80
1-2 明朝贵阳辖区进士名录	81

第二章 从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	83
------------------	----

---

一、清代贵阳三书院	86
二、高攀教育转型旗	94
三、教育改革初试水	101
四、留学潮的兴起	108

五、新式学堂的发展	114
链接	124
1. 贵阳三条状元街	124
2. 万马如龙出贵州	140
3. 贵山书院三先生	143
附表	150
2-1 清朝贵阳进士简明统计表	150
2-2 今已划出的清朝贵阳府辖区进士简明统计表	160

### **第三章 近代教育发展** 162

---

一、从学堂到学校	165
二、女子教育在贵阳	189
三、“文化西迁”——贵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	195
四、职业教育有较大发展	228
五、国立中学对贵阳教育的贡献与促进	234
六、乡村教育短暂兴起	247
七、社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254
附表	265
3-1 抗战时期内迁或新建的贵阳高等学校一览表	265
3-2 大夏大学各学院在校学生人数	266
3-3 大夏大学各学院历年毕业学生人数	266

### **后 记** 268

## 引言

每当人类选定一处地方作为居住之所，便会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一种文化，并实施一种教育。

据史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平西南夷，置牂柯郡，贵州（今贵阳）自此纳入中原政权的国家版图，但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宋，都未见关于贵州文化教育的文字史料。据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元朝在顺元城（今贵阳老城区）创建了“顺元路儒学”，这是贵阳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学校，给贵州埋下了一颗文化教育的种子。这颗种子在明代的贵州，不仅生根发芽，而且蓬勃生长。

### 一

对贵阳来说，明朝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代，其中三件大事对贵阳的文化教育发展影响至深：一是兴办贵州宣慰司儒学，二是王阳明入黔，三是贵州独立设闾开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宣慰使司驻地贵州城兴办了明朝贵州的第一所官学——贵州宣慰司儒学。这是一所完全按照中原、江南儒学规制兴办的官学，是明朝在贵州推行教化、实施实质治理的标志，也是贵州儒学教育蓬勃兴起的起点。贵州宣慰司儒学以其标准的儒家学堂规制、完备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成为贵州早期兴办学校的标杆，引领着明朝贵州的文化教育发展。其后，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完成

贵州建省，以贵州城（贵阳）为省会。按照省级建制的教育机构的完善与相关官吏的配置，贵州的教育文化管理实现了与先进区域的同频并轨，大大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贵州建省后，史志日臻完善，文化教育发展始有翔实载述。多任驻贵州省级行政官员，都以“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为训，弘文昌学，兴学办校。据莫与俦《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载，贵州置省时仅有3所学校，到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的学校已增至20余所。作为省会的贵阳更是最先得到惠泽，司学、卫学、府学、书院，勃然兴盛，声教远播。贵阳成为引领黔中文化教育的中心，特别是贵州宣慰司儒学、文明书院、龙冈书院、阳明书院等，成为当时全省文化教育的标杆。

这一时期，对贵阳乃至贵州的文化教育而言，阳明先生的入黔是一大幸事。阳明先生兴办书院，开设讲坛，启蒙教化，播文化之种，培教育之根，造福一方乡民。他建立了龙冈书院，躬为训课，讲经释典，传播其“心即理”之道。他坐堂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心学体系，对贵阳乃至贵州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贵州学风一时兴盛，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任贵州巡抚江东之与巡按应朝卿提出在鳌矶石上修建阁楼一座，以培风化，并取名“甲秀楼”，寓意“科甲挺秀”，以此祈愿黔中人才辈出，秀甲天下。至今，甲秀楼不仅成了贵阳市的地标性建筑，更是贵阳市文化教育的象征。

谈到贵阳的文化教育象征，又不得不谈与甲秀楼几乎同时期修建的文昌阁。作为一座寄寓了中华传统人文理想的特殊建筑，文昌阁是古代中国城市建设的标配，为供奉文昌帝君之所。贵阳文昌阁始建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贵阳“四阁”中至今仅存的一阁，与甲秀楼遥遥相望，二者成为贵阳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历史文化建筑。它们不仅唤起了我们对贵阳历史文化的追思，还能让我们体会到贵阳教育教化的艰辛历程。本书名为“甲秀昌明”正寓有此意。

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独立设闈开科，可以说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随后，贵州各府学、州学、卫学、县学纷纷增设，科举考试的参与者数量显著增加，培养出了诸如谢三秀、吴中蕃、杨龙友、马士英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贵阳籍文人学者。

## 二

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尽管经历了朝代的更替，贵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似乎并未遭受重大冲击。尽管有部分学校经历了兴衰和更迭，但总体而言，学校和书院基本沿袭旧制，数量有所增加，规模也得到了扩展，人气更是日益旺盛。

顺治、康熙年间，在贵州兴起了社学和义学。顺治九年（1652），朝廷要求每乡置社学一区；康熙四十五年（1706）朝廷议准，贵州府、州、县、卫俱设义学，准许土司子女就学。民国《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记载：“书院之外有社学、有义学。凡汉人在乡之学，总曰社学，所以别于府、州、县在城之学也。”“朝廷为彝洞设立之学，及府、州、县为彝洞捐立之学，则曰义学，盖取革旧之义，引于一轨同风耳。”可以看出，民族教育已成为清代教育管理的一种常规。

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曹申吉捐资重修了残毁的阳明书院，后又历经多次扩建完善。雍正十一年（1733），阳明书院改为“贵山书院”，其办学规模和文化影响冠于全省。

嘉庆五年（1800），巡抚常明应贵阳学子之需和当地士绅奏请，于贵阳城北新建了“正本书院”（亦称“北书院”），于城南新建了“正习书院”（亦称“南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阳府在正本书院基础上建贵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迁至城南雪涯洞，之后易名为贵阳中学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的前身）；正习书院（南书院）后改为学古书院、经世学堂、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等。二书院历经百年，弦歌不绝。

建省 600 余年以来，贵州的文化教育见证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兴衰。其中，贵阳的教育也在继承中不断丰富，在丰富中不断改进。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管理和科举制度，对贵州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贵州人才培养的意义是深远的。其间，在华夏科举场上，贵州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辉煌成就，可谓“俊杰之士，比于中州”，正如诗中所言，“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贵阳作为省会，占据地理之要、文教之先，科举榜单，自当为首。贵州历史上的三位状元，皆出自贵阳。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带来了中西文化教育的激烈碰撞与交融。这一时期，贵阳的文化教育也在以一种敏感的节奏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入了中华民族求变图强的行列。

贵阳人李端棻，与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任可澄创建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的前身），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创办了贵州公立师范学堂等。李端棻还曾受聘主讲经世学堂，传播新知识、新理念。针对明代以来八股取士的弊病，他积极主张变革教学的内容，倡导学习外语、数学、天文、地理、格物（物理、化学），培养既有儒家传统道德，又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之才。李端棻不仅对贵阳的近代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的近代教育都有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另一位对贵阳乃至贵州近代教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是曾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严修是贵州最早主张“中体西用”的人，也是贵州最早进行新式学校改革的人。在严修的督导和改革下，贵州学界一改清末的陈规陋习，黔中“士林蒸蒸向学，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他亲自撰写了《学古书院肄业条约》，改革了书院的课程，对办学做出了明确规范。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奠定了后来新式学校建设的基础。

得益于李端棻、严修等近代教育先驱的直接影响，贵阳的文化教育在清末民初时期始终处于历史前沿。无论是新思想的传播、新式教育的推广，还是对外开放的举措，都紧随时代的潮流。光绪三十年（1904）底，林绍年出任贵州

巡抚，刚上任就提出办教育是“本中之本”的教育主张。他创办了第一所实业学堂贵阳蚕桑学堂，以及贵州官立贵阳师范传习所等学校，派出了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其选派的第三批出国考察、留学人员（官员、学子）共 151 人，其中学师范的有 76 人，他们回国后大多数回贵州从事教育工作，很多人成为贵州近现代教育的中坚力量，为贵州后来的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法定近代学制系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贵阳各学段教育也应时快速发展。

### 三

民国建立之后，贵阳的教育在艰难中发展。从民国成立到民国 20 年（1931），贵阳城内总计有小学 26 所，其中省立 2 所，公立 1 所，私立 23 所，学生总数不到 5000 人。中学仅有模范中学、南明中学、达德学校初中部、道一中学、省立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县立中学、省立贵阳女子中学等 10 余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缓慢，高等学校仅有省立贵州法政专门学校、省立贵州大学 2 所，职业学校只有省立农林学校、贵阳电报学校、省立贵阳高级医师职业学校等 3 所。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学校内迁入黔，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战时文化”发展景象。私立大夏大学、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和国立湘雅医学院等高等学府的迁入，显著推动了贵阳乃至整个贵州省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学府的加入也加速了贵阳基础教育和相关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例如，中学的数量从战前的 8 所增长至抗战胜利后的 18 所。一批迁入贵阳的专家学者在当地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大夏大学附中、伯群中学、清华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对贵阳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贵阳文通书局、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省立科学馆、贵州省立艺

术馆及《贵州教育公报》《达德周刊》等文化机构和媒体的成立与成长，共同促进了贵阳文化教育的繁荣，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象。

本书通过梳理贵阳教育 600 余年发展脉络，精选对贵阳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等，串珠成链，以史话的形式再现贵阳教育发展历程。

## 第一章 明代教育勃兴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大明王朝自此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大明虽然立国，但国家尚未一统，此后，朱元璋君臣在继续完成统一的同时，着手建立制度，全面开展国家治理。在文化教育方面，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诏中书省：

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教。<sup>①</sup>

明朝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核心政策，中书省立即着手制定办学规制并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文官紧缺的问题，在洪武四年（1371）和五年（1372），明朝举办了两次科举考试，从全国选拔人才。两次考试暴露了科举取士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明朝进行了改革，推出了新的科举制度。办学规制和科举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大明王朝“教化治国”的基础，推动了传统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

西南平定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辖18卫又2直隶千户所，并兼管隶属湖广的6个卫，明朝自此开始了对贵州的治理。洪武年间

<sup>①</sup>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 第二卷 明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主要采取军事管控和土司制度<sup>①</sup>的管理模式，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又加入流官制度<sup>②</sup>，形成了“土流并治，军政分管”治理模式。贵州，这片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作“万古蛮荒”的高原，正式纳入了大明王朝的实质治理。按照明朝的办学规制，在贵州凡是有府、州、县建制的地方，都逐步兴办了官学<sup>③</sup>，开启了移风易俗的“教化”之路。

在贵州城<sup>④</sup>兴办“贵州宣慰司<sup>⑤</sup>儒学”，标志着贵州登上了中华文化教育的大舞台。但是，明朝时期的贵州，是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兴学教化的对象，既有因卫所<sup>⑥</sup>而产生的军屯人口，也有从东部到西南开发高原的普通民屯人口，更有文化靠口口相传、教育靠“言传身教”<sup>⑦</sup>的众多原住民族。为此，明朝在贵州专门开办了教化军屯人口的卫学和教化原住民族的各级司学。根据朝廷的要求，各土司必须派遣子弟入学，众多原住民开始接受儒学文化教育。据史料文献的统计，有明一朝，贵州先后一共兴办了40多所司、卫、府、州、县官学。在这40多所官学中：

司学 有贵州、思州、思南3所宣慰司学，还有宣抚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10余所，如永宁宣抚司、普安安抚司、平浪长官司、九姓长官司、新化蛮夷长官司等各级司学，后多改办或并入了府、州、县官学。其中，贵州宣慰

① 土司制度，元朝建立的一种“以夷治夷”制度。元朝直接任命民族首领做地方官，称作“蛮夷官”，按实力、管辖区域的大小，级别不同，由高到低分别授予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的官职。前三个级别高，称作土司；后两个级别低，称作土官。

② 流官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基本模式。“流官”即流动的官员，也就是官员到某地任职，任职期满，可以留任，也可以调离。在可能派驻朝廷官员的地方，朝廷派官员赴任治理，这种方式称作流官制度。

③ 官学，古代称政府办的学校为官学。

④ 贵州城，今贵阳市老城区。元朝始筑顺元城，明朝改顺元城为贵州城。

⑤ 贵州宣慰司，设立于洪武五年，是明朝贵州辖区最大的土司，驻贵州城。

⑥ 卫所，卫是明代地方驻军建制单位，负责辖区内的驻防与屯垦，每卫有军人5600名左右，军人家眷随军驻屯，实行“三分操备七分屯”的管理制度；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所以叫作“卫所”。

⑦ 这里指“口头说明”加“行为示范”。

司儒学兴办最早，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并取得了考取进士 23 人、举人 268 人、岁贡 159 人的突出成绩。

**卫学** 有普定、铜鼓、平越、都匀、龙里、新添、威清、平坝、安南、兴隆、赤水、安庄、乌撒、清平、偏桥、毕节、平溪、清浪等近 20 所卫学。

**府、州、县学** 有思州、镇远、黎平、思南、铜仁、石阡、都匀、平越、安顺、贵阳等 10 所府学，有定番、黄平、普安 3 所州学，有荔波、婺川、永从、新贵、天柱、贵定等 6 所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更基层的社学，在弘治十八年（1505）时，仅贵州城就有社学 24 处，生童近 700 人；偏远的普安州也兴办过 10 所社学。

随着官学的兴起，以私人讲学为主要特征的民间书院也渐渐产生。在明代，贵州境内先后出现过文明、铜江、魁山、中峰、龙冈、天香、石壁、阳明、南山、正学、鹤楼、紫阳、月潭、明德、斗坤、为仁、兴文、南皋、凤山、渔矶、大中等 20 余所民间书院。这些书院中很大一部分都与一个人物有关。

这个人物就是王阳明。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sup>①</sup>驿丞。他历经磨难，在龙场悟出了大道，并创办龙冈书院，受邀主讲文明书院，开启了自由讲学新风。其后王门弟子、后学，如王杏、蒋信、李渭、马廷锡等，或开书院，或主讲书院，弘扬王学，实施教化，推进了书院式私学教育在贵州的蓬勃发展。这些书院中的文明、龙冈、阳明、正学、渔矶等 8 所开办在“贵阳府”辖区，对培养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推动贵阳和整个贵州的教育、学术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章将讲述这些书院的发展故事。

随着书院的兴盛，贵州的读书人数量日益增加。为了让读书人有参加科举的“进身之道”，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争取在贵州单独设科场。其中首倡者，是贵州水德司（今贵州德江县）人田秋。他给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上了一份

<sup>①</sup> 龙场驿，在今贵阳市修文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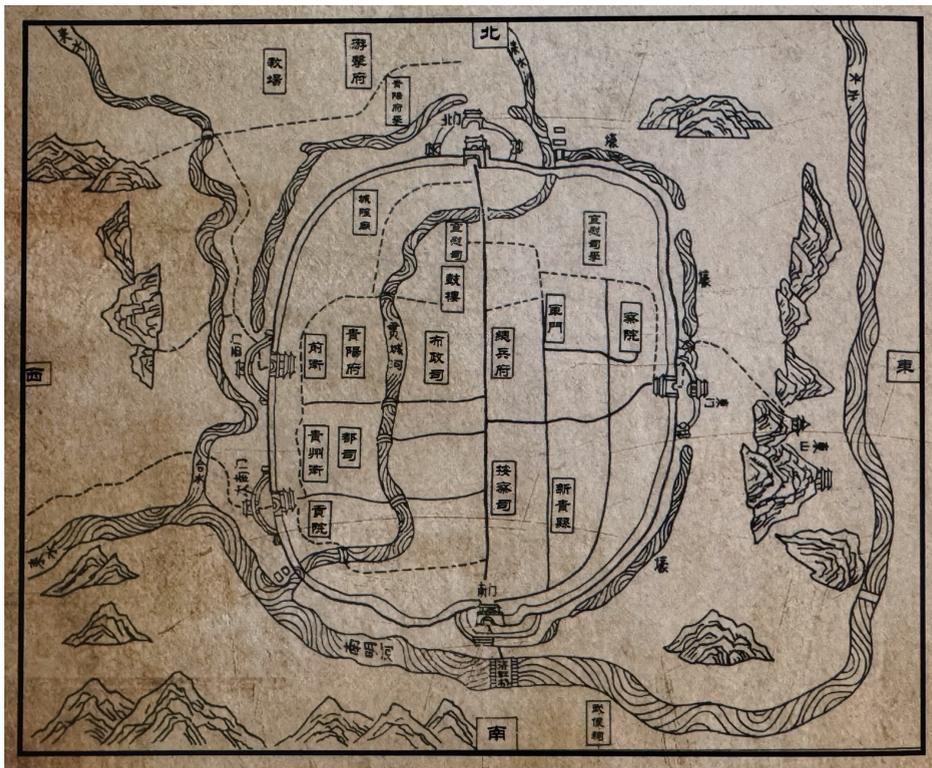
叫《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的奏折。这份奏折最终促成了贵州设闈，使作为明朝第十三个行省的贵州，在嘉靖十六年（1537）取得了独立乡试的资格，从此，贵州学子活跃于中华科举文化大舞台，为明清时代出现贵州人才“万马如龙出贵州”铺平了道路，也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儒学教育在贵州的发展。

本章将从贵州宣慰司学开始，通过对王阳明在贵阳的文教活动的探索，探寻贵阳著名书院的历史，讲述田秋上疏开科举的故事，为读者介绍明朝蓬勃兴起的贵阳教育。

## 一、贵州宣慰司儒学

贵州宣慰司儒学，是明朝在贵州全域兴办的第一所儒学，更是明朝兴办最早、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和出人才最多的一所官学。

儒学，既指儒家学说，即儒家文化思想；也指儒家学堂，即讲授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文化思想的专门学校，是中华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这本



明代贵州城（今贵阳）图

书里，儒学专指儒家学堂。

在今天的贵阳，有两条街与古老的儒学关系紧密，一条是市府路，另一条是忠烈街。

贵阳最早的儒学，就出现在市府路上，先是一所官办儒学，后是一所书院。元朝控制西南以后，在今天的贵阳市及周边区域，设置了“八番顺元诸路<sup>①</sup>”和它的管理机构“八番顺元诸路都元帅府”，并在南明河畔筑了顺元城<sup>②</sup>，作为“都元帅府”的驻地。“都元帅府”建在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址那一带，即今天的市府路。在“都元帅府”的北面，元朝兴办了贵阳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学”；后来顺元路儒学迁往新址，顺元路儒学教授<sup>③</sup>何成禄就在此地办了个“文明书院”。不过，这一所儒学和一所书院，存在时间都不长，最迟在元朝末年就消失了。这



市府路路牌及街景（2024年摄）

- ① 路，是元朝的地方二级行政区，相当于明朝的“府”，也相当于今天的“地级”行政区。
- ② 顺元城，最早的贵阳城，“顺元”意为“归顺大元”。顺元城，是一座只有东、南、西、北四门的以夯土为城墙的小城。明朝将顺元城改名贵州城。
- ③ 教授，中国古代教育官职，官阶自从九品至正七品，是一种既当老师又负责学校教育、教学和考试等的官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在第一、二章里出现的“教授”均指这个古代教育官职。

在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明嘉靖《贵州通志》里都有记载，但仅有只言片语，既看不出办学规模，也看不到办学影响。由此可见，儒学确实在元朝走进了贵阳。顺元路儒学和元代贵阳文明书院算是贵阳最早的学校，但就学校教育而言，它们只是埋了一颗儒学的种子，既没有生根，更没有发芽。

儒学在贵阳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忠烈街。贵阳大十字附近有条东西向的省府路，沿着它向东走到尽头，左转就是忠烈街。今天，在这高楼林立、热闹非凡的城市里，忠烈街就是条不起眼的小巷子。讲述别的什么，可能都跟它没什么关系，可是，讲述明朝贵阳的文化教育，甚至说，讲述明朝贵州的文化教育，都要从它讲起。

忠烈街有过一所学府，叫作“贵州宣慰司儒学”，它是明朝政府在贵州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后来几经修缮、扩建，它就成了明朝贵州规模最大的官学。这所学府，不仅是传统儒学在贵阳的生根发芽处，而且是贵州文化教育的领头雁，它一直引领着明朝贵州的文化教育发展。



贵阳忠烈街路牌及街景（2024年摄）

## 土司子弟入太学<sup>①</sup>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的一天,南京国子监门口,来了一群人,一个太监,几个礼部官员,还有十几个穿戴打扮完全不同中原的年轻人。

附近的官绅士民正看热闹时,只见国子监的几个官员迎了出来。那太监跨了几步台阶,背对大门站直身子后,就扯着公鸭嗓子大声喊了句“国子监接旨”。听他这一喊,在场官民都赶紧跪了下来,太监扫视了一眼,就拿腔拿调地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移风善俗,礼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民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美,特允其请。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远之心。钦此。<sup>②</sup>

听太监宣读完圣旨,人们才明白,这群穿着打扮十分古怪的人,是从西南来的,是皇上恩准来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他们是云贵各地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的儿子,其中就有代理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的儿子阿期陇弟。

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太祖朱元璋都等待了差不多二十年。

① 太学是中国古代国立最高学府,明朝把“太学”改了名称,先叫作“国子学”,后叫作“国子监”。“国子监”这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朝。

②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早在洪武四年（1371），大明王朝就在贵州城设立了贵州卫<sup>①</sup>，将自己的势力楔进了西南的这片高原。对于当时尚未完成天下一统的大明王朝来说，这种做法也只能是一种威慑。随着时局的发展，代表贵州地方势力的四大土司<sup>②</sup>就先后纳土归顺大明，接受了朝廷的赐官封爵，朝廷也许诺过让他们永守其地。洪武五年（1372），元朝所封水西宣慰使霁翠、水东宣慰使宋蒙古歹（朱元璋赐名宋钦）联袂入京朝见朱元璋，请求朝廷封赏并承袭原有官职，于是大明朝廷顺势设立了贵州宣慰司，任命霁翠为宣慰司使，任命宋钦为宣慰司同知（副使），准予世袭。霁翠的妻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奢香夫人。

十年后，傅友德率大军平定西南。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朝廷在保留土司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军屯民屯制度。这是一个“二元”管理模式，一是以贵州都司<sup>③</sup>及其所辖卫所，在贵州实施军事驻屯管控；一是以贵州宣慰司管理下设的各级土司、土官，在宣慰司辖区内实行内部自治管理。不过，朱元璋和朝臣都明白，这种管理方式不是让贵州地方长治久安的良策，治标不治本，要使地方长治久安，必须实施实质治理。什么是实质治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就是实质治理，即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形成文化认同，产生文化向心力，进而在没有武力管控的情况下，政治制度仍然能正常运转，与政治制度相匹配的各种政策和措施，都能得到有效执行。

在贵州早日推行教化，是朱元璋的强烈愿望。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就下诏西南，命令各土司：

① 贵州城的贵州卫设置于洪武四年（1371），驻贵州城西城区，是“贵州第一卫”，比贵州都司早设置十余年。明朝时期，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近30个卫。

② 四大土司，是指明朝贵州的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播州杨氏，相传始于唐末，终于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思州田氏，相传始于隋朝，终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水东宋氏，相传始于唐初，终于明末崇祯年间；水西安氏，相传始于三国，明太祖朱元璋赐姓安，终于清康熙年间。

③ 都司全称“都指挥使司”，是明代行省级军事管理机构。卫所实行军籍世袭制，从军官到士兵都世代从军，各卫由都司直辖。

凡有子弟，皆令入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sup>①</sup>

这道诏书的意思是：西南各处土司人家的子弟，都要进学校接受教育，让他们懂得阐明君臣父子关系的圣人之道，懂得礼乐在文明教育方面的作用，等他们学有所成后回归家乡，就能够用他们学到的东西改变当地的风俗民情，最终使这些地方的社会风气跟中原一样。

但是，朱元璋也明白，靠行政命令是无法实现他的愿望的，他得等待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贵州的“夷人”倾慕中原、江南文化，进而产生主动学习中原、江南文化的自觉。这得等待，这种长期都是“化外之地”的区域，中央政府强制推行文化教育，强制实现移风易俗，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千百年来，“夷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的风俗民情。强制改变，他们轻则反感，重则反抗，甚至反叛，这就必然破坏这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信任和稳定。朱元璋在平定西南之初，就确定了安定边疆和民族区域的“怀柔”政策：

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sup>②</sup>

这项政策的意思就是：改变社会风气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俗，使人懂“礼”就是根本；用前人良好的思想来引导百姓，兴办教育要做在前面……广泛地开展文化教育，以此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务必让这些地方的社会风俗跟中原一样。

在这项政策之下，还有一些鼓励土司子弟到儒学求学的具体措施，如土司

①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其中，“中国”一词指中原，与今天的“中国”不是同一概念。

②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子弟入学国子监不用考试，学习期间还予以奖励，如《明实录》洪武二十三年（1390）六月诏：

赐国子监读书贵州土官子弟程延等夏布袭衣、靴、袜。<sup>①</sup>

朱元璋的耐心，大明王朝的耐心，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个契机，才有了国子监门口的这一幕。

因此，自两年前奢香夫人的儿子阿期陇弟等西南土司子弟入学国子监后，国子监秉承朝廷治理边疆和民族区域的国策，不折不扣地执行洪武皇帝亲自下达的任务，土司子弟在国子监受到悉心教导。奢香之子阿期陇弟在国子监学习期满，得到朱元璋恩准，返回贵州袭职贵州宣慰司使，并获赐“安”姓，改名安的。自此水西霁翠家族称水西安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愿望，朝廷的推行，国子监的努力，使“广教化，变土俗”逐步变成现实。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少数土司子弟进京入国子监学习，激活了更多贵州土司子弟学习中原文化的强烈愿望，“进京入太学”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一则万里入京并不现实，不说车马劳顿，就是他们的身份也不允许，他们进京是“非召不得擅往”；二则国子监也不是想入就入的，那是国家最高学府，两京十二行省的官宦子弟，要入监学习做“监生”都是有条件的。如果朝廷为这些土司子弟大开方便之门，就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中原、江南这些官宦子弟入监学习的需求。

怎么办？把儒学办到贵州去。

<sup>①</sup>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 太祖明诏办学校

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一天，贵州城东门内的一片空地，大明代理贵州宣慰司使顺德夫人奢香和大明代理贵州宣慰司同知明德夫人刘淑贞，各带了一小队“夷人”在那里等候。不久，他们等候的人就到了，是一个将军和一个文官。这位将军叫马烨，是贵州都司代理都指挥使，是朝廷派驻贵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这位文官叫芒文缜，本在国子监任正九品学正<sup>①</sup>，如今被朝廷任命为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官阶升到了正七品。

将军和文官下了马，四人见了礼，那将军就讲明了今天的公务，大致意思是：皇上下了明诏，令本将军督率二位夫人和芒大人，在这贵州城兴建宣慰司儒学，今天请两位夫人来，就是给这宣慰司儒学选个地方。

三人听马烨说完，都恭敬地回答道：“全凭将军定夺。”马烨见没有不同意见，就确定把宣慰司儒学建在贵州城东城区这块空地上了。接着，马烨就做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就这样，当时的贵州城东城，今天的贵阳忠烈街，这块能“文运弘昌”的风水宝地上，明朝贵州的第一所官办儒学就开始兴建了。

开始在贵州办学兴教，标志着大明王朝实质治理贵州这件大事启动了。《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诏贵州都司，明令在贵州城兴办贵州宣慰司儒学，并再次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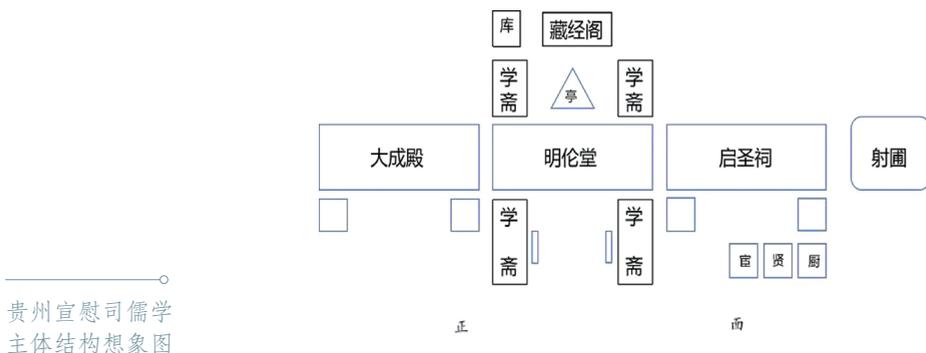
凡有子弟，皆令入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sup>②</sup>

① 学正是明朝国子监的教育官员，负责教诲约束学生，并讲解儒家经典的文字和内容，官阶正九品，国子监是明代国家最高学府，这个“学正”应该相当于今天高校的班级辅导员。

②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贵州宣慰司儒学的规模体制完全仿照中原、江南儒学。中国古代的官办儒学是仅次于皇宫的宫殿式建筑群落，规模最宏大的是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各省城的省级官学是国子监的缩小版。

贵州宣慰司儒学兴建时，贵州尚未建省，贵州城还不是省城，但据嘉靖《贵州通志》中相关记载，贵州宣慰司儒学也是国子监的缩小版，校园中心建筑是学宫，配套建筑是文庙和启圣祠。学宫是殿厢式建筑，建在校园的中轴线上；文庙和启圣祠是殿庑式建筑，建在学宫的两侧。建成之初的大致建筑布局如下图所示。



在校园中轴线的中点位置上，修建的是学宫的正殿明伦堂。明伦堂是中国古代文庙、书院、太学和各级官学的学宫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之所，是古代中国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教育品牌，具有传播文化和推动学术研究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礼堂或报告厅。

“明伦”一词源于《孟子·滕文公上》，简单地说，就是阐明人伦。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比如家庭中的夫妻、亲子、兄弟姊妹、翁媳婆媳、妯娌等的相处，社会上的朋友、同学、师生、上下级等的相处，都属于人伦范畴。西周礼制强调的“长幼尊卑有序”，儒家文化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体现的就是人伦关系。在今天看来，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不断强化的这种人伦关系，带有浓烈的封建性，但它也实实在在地理顺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简单有效地防止了违背伦常的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生。那个时代，能在明伦堂讲学、论道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化教育精英。

明伦堂的正面两侧是各有两个房间厢房，分布着“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也就是四间教室。左右厢房前各立有一块名叫“题名雁塔”的空白大石碑。雁塔也称大雁塔，即陕西西安市南慈恩寺塔，是唐高宗为追荐其母而建。唐朝有了大雁塔之后，每次科举及第的新进士，吃过“杏园宴”，就去大雁塔，推书法好的进士在塔上题写他们的姓名，就有了“雁塔题名”这个典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有这样的描述：

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善书者纪之……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年二十七。

后世之人就用“雁塔题名”比喻应试及第，而唐以后各朝的官学都立有以“题名雁塔”命名的空白石碑，既是留给学生题写姓名，也是用来标榜学校的教学成绩。

明伦堂的后面，还建有一个亭子，一座尊经阁，两间学斋，两间库房。亭子是个碑亭，里面立有铭刻《视》《听》《言》《动》《心》五箴<sup>①</sup>的箴碑，嘉靖年间又立了铭刻嘉靖皇帝亲撰《敬一箴》的石碑，所以叫“敬一亭”。尊经阁有三间房，用来收藏朝廷颁赐的制书和经书，相当于今天学校的图书室（馆）。制书就是皇帝颁布的命令文书，相当于诏书；经书就是儒家经典，这座尊经阁里就收藏有朝廷御赐的《五经大全》等经书。两间学斋分别叫“博文”“约礼”，

<sup>①</sup> 箴，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所写内容都以“劝诫”为主。

可能是教室，也可能是教师办公室。两间库房是用来收藏、摆放祭器和乐器的。

学宫右侧的文庙，左侧的启圣祠，都由正殿和左右廊庑组成。启圣祠的左前方还建有乡贤祠、名宦祠和烹饪祭品的厨房“神厨”。在启圣祠的左边还建有射圃<sup>①</sup>。

文庙是中国古代学校建筑必须有的建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配”。文庙的中心建筑是大成殿，供奉“至圣先师文宣王”的牌位或雕像，并有四位“亚圣”的牌位陪供。“至圣”是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四位“亚圣”是颜回、曾参、孟轲、孔伋，是后世儒家尊崇的古圣先哲。古代在校园里建文庙，寄寓“文运弘昌”，目的是让学子们遵循先圣先贤之道，自觉接受文



贵阳府学宫，也称文庙

① 射圃，古代儒学开有“射”这门课程，射圃就是练习射箭的场地。

明教化。启圣祠是祭祀孔子五代先人的祭殿，主祀孔子父亲叔梁纥，以四位“亚圣”之父配享。贵州宣慰司儒学的文庙，在洪武年间只建成了大成殿，大成殿两侧的廊庑，殿前的戟门，以及其他配套建筑都是后世增建的。

古代中国在学校建设上是“学庙<sup>①</sup>一体”的。除了私塾这种最小的私人办学形式，一般都是“有学就有庙”。在古代中国，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地方大型官学如省城学校，都是学校、文庙、贡院相邻而建，如果想具体了解，可以去参观北京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街，或去参观南京的夫子庙。府、州、县学，可能因为财力不足，往往会庙学合一，只建文庙，除了规定的祭祀时间，就在庙宇里教学。带有私学性质的大型书院，往往是借用庙宇开办。家族学堂直接就开办在家族祠堂。古代中国，官府办学，社会办学，私人办学，家庭聘请塾师教育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制度礼仪都只是表象，传递中华文化精神才是本质，至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能，都是细枝末节，琴、棋、书、画则更在其次了。中华文化精神都是从古圣先贤那里来，而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思想，第一圣人自然就是孔子了，所以文庙祭祀的是孔子，配享的都是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名人。这既是彰显中华文化精神的源头，又是追溯中华学校教育的开端，还是引导学校教育发展的规范，更是给学生树立人生奋斗的楷模……凡此种种，也就决定了，祭拜圣人，是中国古代人发蒙就学的第一课，求学路上的必修课，人生旅途的家常课。学校与文庙就自然建到了一起，即使最小的“私塾”，也要供奉着孔子的牌位；家庭堂屋那个神龛上，中间最大的那个牌位上，古代写的是“天地君亲师”。今天的乡村人家也还保留着堂屋和神龛，只是有的将中间那个最大牌位换成了“天地国亲师”，那个“师”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老师”，而是“至圣先师”——孔子。

贵州宣慰司儒学的校园初期建设，从动工到建成可能历时二到三年，明朝

<sup>①</sup> 庙，也称庙宇，不是道、佛等宗教供奉神、佛的道观、寺院，而是中国人祭祀先人的地方，所以天子家的称作太庙或宗庙，王侯家的称作家庙，普通家族的叫祠堂。普通家庭里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堂屋里那个俗称“香火”的神龛。

万历《贵州通志》收录的两篇“记”中都有提及。

王直《宣慰司儒学记》：

贵州去京师万里，实古荒服之外，裔夷之区也，德威所至，无思不服。太祖高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设贵州宣慰司抚治，又欲使皆复于善，诏立学校以教焉。由是贵州始有学，盖洪武二十六年也。<sup>①</sup>

费宏《重修宣慰司儒学记》：

贵州虽远在西南，为《禹贡》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学已建于洪武甲戌。<sup>②</sup>

王直是六朝老臣，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吏部尚书；费宏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状元、四朝老臣，曾两任内阁首辅。他们所“记”应该是准确的。贵州都司接诏后，选址开工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直说“贵州始有学”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费宏说“宣慰司之学已建于洪武甲戌”，洪武甲戌年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由此推算，贵州宣慰司学的初期校园，从动工到建成应该用时二到三年。

贵州宣慰司儒学初期建设完成后，儒学的教育教学随即展开。

### 宣慰司学施教化

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月初一。

①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明）嘉靖〈贵州通志〉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269页。

②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明）万历〈贵州通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页。

贵州城东门内，刚落成的贵州宣慰司儒学，正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

学校师生：教授芒文缜和四位训导<sup>①</sup>，二十多个土司子弟，二十多个汉族后生。

观礼者：贵州都司、贵州卫及附近各卫的朝廷命官，贵州宣慰司及下属的各级土官；受邀的汉、夷士绅。

此时，正在按司仪的引导完成典礼的议程。

首先，是在文庙大成殿祭拜至圣和亚圣们，分两步。

第一步：上香。芒文缜和四位训导双手捧香，徐步上前，躬身作揖三次，才将香插入五个牌位面前的香炉里，然后作揖，后退着回到自己刚才站立的位置。

第二步：跪拜。芒文缜带着众人躬身作揖，跪下叩头，连叩三次。完成之后，起身站好，接着重复一次。这叫“二拜六叩”，如果皇帝亲自参加祭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也必须行这个礼。

其次，是众学子行“拜师”礼。在司仪的导引下，众人离开文庙来到学官，芒文缜带着四位训导在明伦堂大门前摆设的椅子上就座，众学子在台阶下按原先的队列拉开距离站好，然后在司仪指挥下，众学子完成“一拜三叩”的拜师大礼。

再次，由教授宣布课程和学规……

贵州宣慰司儒学的办学历史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我们今天一年分春、秋两季开学。中国古代并不是这样，而是根据农事忙闲来决定，存在春季、秋季、冬季三种开学情况。学期长短也跟我们不一样，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古代官学的每次开学都要举行程式化的开学典礼，第一个仪式就是“祭孔”。

<sup>①</sup> 训导，古代官学的教师。

明朝官学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

明朝官学都是免费就读，而且提供食宿。官学都有固定的学田<sup>①</sup>，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一入学就由学校提供吃住。明朝规定，在籍且有启蒙经历，能通过入学考试的男孩，就有进入官学的资格。学生进入官学免费就读，称作“廩膳生”，吃住费用称作“廩米”。

免费就读，提供饮食和住宿，就有配套的很严格的学规：

考试。实行“月考”和“岁考”，通过考试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月考由学校进行，岁考由府、州、县主官主持。

评价。实行“稽查簿记”，记录学生日常行为，评定学生品行。

言论监督。学生就读期间严禁评论政治。

惩罚。罚作吏人<sup>②</sup>，追缴学费。学生在校修业期限十年，学习期间，如果学业无成，或犯大过，就要罚作吏人，追缴学费。

……

按照朝廷谕令，贵州宣慰司儒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首任教授芒文缜，是江西临川人，他有国子监学正任职经历，既清楚大明朝廷的办学兴教政策，又清楚各级官学的学制和课程设置，还懂教学、善管理。儒学虽是新建，但在他的主持下，四位训导协同努力，教育教学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明朝各级官学的学额<sup>③</sup>是有明确规定的，洪武二年（1369）十月发布的《辛卯诏》：

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

① 学田，即国家分配给学校的土地，这些土地出租给别人耕种，每年收取租金。租金就是政府拨给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用来解决学生的吃住。

② 吏人，在官府中办差的各种差役，相当于今天的办事员。罚作吏人，就是终身禁止参加科举。在当时的士绅眼里，吏人是低贱行业，因此罚作吏人这一惩罚对读书人是具有羞辱性的。

③ 学额，就是招生人数。

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sup>①</sup>

贵州宣慰司儒学开办初期，学额没有明确规定。说明朝廷希望贵州城的这所儒学能广招土司子弟入学，扩大儒家文化思想在“夷人”中的影响，使“教化治国”这一基本国策能在这片高原上更快更好地推行。后来，随着贵州整体局面的稳定，才明确学额为每年30人。同时，朝廷明令与都司、宣慰司同城的贵州卫、贵州前卫<sup>②</sup>不独立开办卫学，卫中军民学生都附读于宣慰司学。各卫自有学额，附读是指不另办学校。卫学，如果视作官学中最低一级的县学，它的学额就是20人，但上述两卫由于都在后来作为省城的贵州城内，是贵州最重要的两个卫，它们管辖的军屯、民屯多，人口也多，故其学额在30至40人之间。贵州宣慰司儒学，完全按定制办学后，它的学额加上两卫的学额，常年招生人数在90至110人之间，所以它是一所规模非常大的儒学。虽然这所儒学算是什么级别史无记载，但它在贵州城，在贵州都司驻地，在贵州建省后的省城；它的首任教授是正七品官阶，而府学教授才从九品官阶；后来程番府移驻省城并改称贵阳府，过了20余年又另建了贵阳府官学。由此可见，这贵州宣慰司儒学的级别是非常高的，而且是专门给土司子弟开办的，这充分体现了朝廷对贵州这个民族区域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推进教化、移风易俗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也是朱元璋“王道教化，没有遗土”这种意志的体现。

贵州宣慰司儒学的兴办，为贵州全域各级官学的兴办树立了样板。此后，各地府、州、县、卫、司陆续开办官学，除学校规模不能与宣慰司儒学相比外，学制、课程、管理都完全仿照宣慰司儒学，而且宣慰司儒学还为贵州各地官学

①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② 贵州前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设置，驻贵州城南城区。

输送了大量师资，在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以前的30余年里，朝廷不允许贵州学子参加科举，宣慰司儒学和其他官学的学生能取得的功名，大部分就是生员和贡生；如果被推举入国子监就读的，则是监生，他们中间的优秀者大量被荐举到各级官学做训导，做出成绩的还被提拔为教谕<sup>①</sup>。如贵州宣慰司人越升，宣慰司学生员，博学能文，热心教育，朝廷特授其为播州宣慰司学训导；再如贵州卫人王训，他的弟子很多都在贵州各地官学做训导或教谕。

王训（约1417—1497），字继善，号寓庵，贵州卫人。王训是个人才，他出身军籍，少时就学于贵州宣慰司儒学。他博览群书，为人慷慨，懂兵法，有谋略，18岁时上《保边正要策》八篇，主论宏大精辟，深受赞扬。曾在驻黔将领幕府佐理军备，但未受重用，于宣德十年（1435）赴云南乙卯科乡试考中举人，成为明朝贵州卫的“第一举人”。中举后，因故未能进京参加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的会试，不久被荐举为宣慰司儒学训导，正统十四年（1449）因功升任宣慰司儒学教授。在宣慰司儒学，先做学生，然后做训导，最后做教授的，王训是第一人。任职期间，王训“教导诸生，奖掖后学，教法严整”（嘉靖《贵州通志》），对明代贵州文化教育发展有重大贡献，被誉为“贵州明代文教鼻祖”。在史料中记载过著作的贵州人，王训是“别集”类的第一人，著有《寓庵文集》30卷、《孙子注解》等著作。他还是当时贵州最有影响的诗人，被称作贵州诗坛“开草昧之功”的第一人，作品多失传，《黔诗纪略》中收有他的诗六首，诗作雄健有骨，苍劲悲凉。如：

### 南 庵

净度招堤旧接茅，地偏应不近尘嚣。

山腰倒接城边路，水口斜通阁外桥。

深院落花无客扫，空门掩日有谁敲。

<sup>①</sup> 教谕，是管理县学的教育官员，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或教育局局长。

忘怀好接莲花社，分付山僧早见招。

据《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2002年版）记载，由于贵州各级官学积累了大量的廪生、生员、贡生、监生，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师资队伍，因此大明朝廷在贵州各地开设过以普及教化为主的社学。社学是类似小学性质的“识字”学校，目的既是在民族区域普及教化，以期移风易俗，实现国家对地方的实质治理；也是为各级官学扩大生源，特别是扩大“土生”<sup>①</sup>生源，还可能为了减少文盲。社学要求每35户设立一所，送民间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学，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教材，但社学因兴办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实行不久就消失了。

以贵州宣慰司儒学为标准陆续开办的各级司学，成为明朝贵州儒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在原住各民族“夷人”中，大力推进儒学教育，使年轻“夷人”，特别是土司子弟通过在各级司学的学习，接受儒家文化思想，进而在“夷人”聚居区域传播儒家文化思想，通过移风易俗，完成文化积淀和文化熏陶，形成大一统文化向心力，从而实现“化夷”的目标。自明成祖永乐时期起，“化夷”目标逐步制度化，明确要求土司子弟“未经儒学教化者，一律不准承袭土职”（《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闰七月《辛丑诏》讲得更明确：

命各处土官衙门应继儿男俱照军生例遣送官学读书、乡试，其相离地远者，有司计议或二卫、三卫设学一所。<sup>②</sup>

这种做法虽然有明确的强制性，但在教化“夷民”，推动移风易俗，提高“夷

① 土生，明代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称谓。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 第二卷 明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民”文化素质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从洪武年间到万历中期，贵州各土司中就产生了近 500 名贡生，还产生了不少“夷民”文人，比如水东宋氏的宋昂、宋昱，就是典型代表，他们长于诗词，合著有《联芳类稿》。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宣德十年（1435），距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月贵州宣慰司儒学第一次开学典礼，已经四十一年了。这一年秋天，两京十三省举行宣德十年乙卯科<sup>①</sup>乡试，贵州学子远赴云南乡试，发榜消息传回贵州“省城”，这座深处黔中腹地的高原小城，瞬间就沸腾了。高原上兴办各级官学这么多年了，“省城”终于出举人了，省城各衙门张灯结彩，举行庆贺；全城市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当然，最热闹的是宣慰司儒学，人们都来这里庆贺；最兴奋的是这里的师生，因为省城出的两个举人，都是宣慰司儒学的生员，他们是王训和秦颢。

这可叫作“破天荒”啊！

办学都四十一年了，才出了两个举人，破的什么天荒啊！

这不问还好，问起就是泪！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兴办贵州宣慰司儒学后，贵州境内各府、州、县、卫也陆续兴办官学。但是，贵州开办官学不久，读书人还不是“官学生”。在明朝，没有学校教育经历就没有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朝廷明诏贵州学子不得参与科举。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各类行政官员、司法官员都有，唯独没有学政官员，贵州文化教育由云南学政代管，贵州学子仍不得参与科举。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朝廷才下诏，允许贵州学子乡试。先附试<sup>②</sup>湖广，后附试云南，每科举人录取人数不得超过五名。万水千山，艰险重重，百余年间，

① 科，即科举考试。一般将举行科举之年的“干支”冠于“科”前，称作“某某科”。

② 附试，指本省不设考点考场，去其他省应试。

贵州学子或望而却步，或半途而返，或死在途中……

宣德十年（1435）乙卯科，是朝廷允许贵州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后的第三次乡试，解额<sup>①</sup>五名，宣慰司儒学夺得两名。

明朝科举考试由低到高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是省级考试，每年一次，由各省主管学校教育的学政官员主持，各级官学的童生<sup>②</sup>应考，考试合格则成为生员，取得乡试资格。乡试仍然是国家级分省考试，每三年一次，在秋天举行，称作“秋闱”，由礼部派官员到各省主持，一般是翰林院的官员，生员应考，考试合格者被录取为举人，取得会试资格，也取得入仕资格。会试是国家级统一考试，于乡试的下一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举人应考，考试合格者录取为贡士，取得殿试资格。殿试在会试发榜后择日在皇宫大殿里举行，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合格者就是进士。

在科举功名上，相比于王训，秦颺还要出名一些。

秦颺（1412—？），字士昂，明朝贵州宣慰司（今贵州省贵阳市）人，卒年不详。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秦颺进京会试，排名104，由举人成功晋级殿试；殿试排名三甲第二，赐同进士出身，成为贵阳科举史上的“第一进士”。最初授职“行人”，后来升任礼部员外郎，最终出任云南左参政。秦颺为官清廉，办案认真。曾出巡金齿（今云南西部澜沧江流域），坐船渡潞江，遇上了大风浪，满船人都大惊失色，他却毫不害怕，端坐船中，从容赋诗：

无端恶浪助颠风，自矢平生信与忠。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向潞江中。

不久风止浪平，安全过江，人们都说，是因为秦颺的忠诚和清廉得到了神

① 解额，明朝朝廷给“两京（北京和南京）十三省”乡试的举人录取名额。

② 童生，即尚未取得任何功名的普通学生。童生院试合格，就是生员，俗称“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灵的庇佑。

除王训、秦颙之外，宣慰司学还培养了不少学术人才。

儒家经典是伴随儒学走入贵阳的，在顺元路儒学和何成禄创办的“文明书院”存在的时候，贵阳人就见到了儒家经典，但没有留下过贵阳人研究儒家经典的记载。贵阳第一个研究儒家经典并因此著书立说的人，是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甲戌科进士易贵。

易贵，贵州宣慰司贵竹长官司（今贵阳）人，生卒年不详。他中进士后，一开始在京城任职，升到兵部主事，又转任礼部郎中，后来离京出任湖广辰州知府。他为人刚正，不畏权势，遇事明断。在辰州任职时，他兴办学校，体恤民情，引导当地百姓移风易俗，很有官声，期满离任，不知何故，就告别了仕途，回到“贵州城北”闲居。他原本通读过儒家经典，对《易》很有兴趣，回家闲居期间，一开始只是校订一些书籍，后来就深入研究起儒家经典来。本来只是兴趣，可研究多了深了，就发现了前人没有说到的东西，于是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发现写成文章，后来把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易经直指》。有了这本自己的著作，他对研究儒家经典就更努力了，后来又写出了《群经直指》《诗经直指》这两部著作，他还把自己的其他文章编成了《竹泉文集》，可惜的是，他的著作没能传下来。但在当时，他的著作已在高原上流传，他成了一时有名的学者，被称作“贵阳经说<sup>①</sup>第一人”。后世评价说，在明代贵州文化教育发展方面，易贵是一个有开创性功劳的人物，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易贵之外，在宣慰司儒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些学术人物。嘉靖《贵州通志》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志书，主持编写者是宣慰司儒学训导张道，参与编写的汤建中、马阳、吴铠、李朴等11人，都是宣慰司儒学生员。

自首任教授芒文缜和四位训导起，历任教授、训导都教导有方，教法严整，得到官府的肯定和社会的好评。在他们的辛苦耕耘下，贵州宣慰司儒学的学子，

<sup>①</sup> 经说，即说经，注解儒家经典。

在科举功名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明朝科举史上，贵州全省共考取举人1720人，进士109人，其中贵阳进士30人。贵阳区域产生了多少举人，没有史料记载，但贵州宣慰司儒学出的举人、进士，在《贵州通史·明代的贵州》中却有准确统计：举人268人，进士23人。另外，贵州宣慰司儒学还产生了159名岁贡，岁贡是举人、进士之外有做官资格的读书人。

### 宣慰司学兴教功

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初，贵阳，这小小的高原之城，早已笼罩在寒雨之中，这日天刚破晓，北城门敌楼上就传来一人悲怆的低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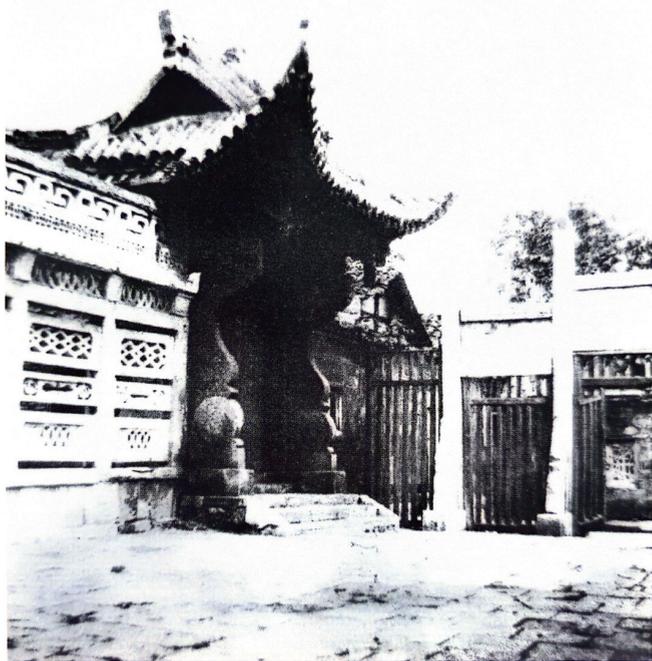


古代城门敌楼（2023年摄）

雄堞荒凉形影孤，凄风冷露剥征襦。  
 四郊密垒腥膻恶，十月重围鼠雀无。  
 敌忾有心才已尽，叫阍何路泪将枯。  
 牂牁亦是西南郡，应遣貔貅破豕狐。

东方的那抹晨光照在了一张苍白憔悴的脸上，晃眼看以为是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其实他只有五十岁。他头顶缨子凌乱的头盔，身着战甲，手持一柄长枪。他那已然深陷的双目注视着城外，有几分坚毅，有几分忧郁，又有几丝盼望，也有几许无奈……他不是守城的老兵，他是一年前才辞职回到贵阳的四川布政司参政潘润民。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过半百的潘润民辞职归乡还不到半年，就发生了“奢安之乱”，贵阳被围。应巡抚李耘之召，潘润民参加了守城和平叛，



○  
 贵阳府学宫礼门

数月之后，城中粮尽，军民饿死无数……最后，能上城守御的人马不足千人，而潘润民一直坚守在城头。三百多天后，贵阳最终解围。巡抚李耘将潘润民守城之功上报朝廷，称赞他“忠心可格日天，直品独高月旦”“忠忱自许，意气特抒”。

文化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这种力量要靠教育来蓄积。

自从兴办了贵州宣慰司儒学，明朝贵阳区域学子，走进贵州宣慰司儒学的那道礼门，就接受了儒家文化思想的洗礼，再走出贵州宣慰司儒学的那道礼门，就成了太平时期的才俊，动乱时节的忠臣。

潘润民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潘兴国的九世孙。洪武年间，潘兴国到贵州前卫戍守地曹官堡垦荒，就成了曹官堡的一个纯粹的普通农家。在明朝大力兴办儒学培养人才的大环境中，潘氏子孙因时而变，一面躬耕一面自读，试图通过耕读来寻求发展之路，就逐步演变成了耕读之家。潘润民的祖父潘维岳就读于宣慰司儒学，嘉靖十六年（1537）参加贵州首次乡试，考中了举人，成为潘氏家族科举仕途第一人。潘维岳中举后，当过知县、知州，他清廉自持，亲民恤民，所至之处，皆有惠政，给子孙做出了表率。潘润民也就读于宣慰司儒学，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贵州乡试，高中解元，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京会试考中进士，走上仕途。潘润民的子孙均善诗，有《潘氏八世诗集》若干卷。潘氏家族是贵阳有名的耕读世家，二百余年风雅不坠。

贵州宣慰司儒学，忠实地执行了大明王朝“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国策，不只给贵阳的读书人讲授了儒家经典，而且将儒家文化思想播种在了贵阳这片土地上，将儒家积极入世、忠君爱国、清廉仁义的思想，深深地植入了贵阳人的灵魂。当时，安邦彦乱军杀向贵阳的消息一传开，贵阳周边士绅百姓纷纷入城避难，小小贵阳城的人口迅速增加到了四十万。其中有很多是周边居住的“夷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叛乱而成为“夷人”，就加入叛乱中去，巡抚李耘立即召集士绅、诸生组织百姓守城，这些“夷人”也加入了守城的队伍。经过两百多年的文化教育，终于扩大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范围，终于使

“夷人”们认同了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观念，有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在贵阳城粮尽而援军不至，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于饥饿的情况下，他们宁愿饿死，也没有出城投降叛乱者，更没有给叛乱者做内应。

贵州宣慰司儒学，不仅培养了众多忠于大明王朝的土司子弟、科举功名人物和文化学术人才，而且还塑造了一众文化家族，如纯粹屯堡农家转化而来的曹官堡潘氏，纯粹卫所世袭军职人家转化而来的贵州卫许氏、马氏、杨氏……为贵阳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也正是爆发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奢安之乱”，终结了贵州宣慰司儒学的办学历史。天启二年（1622），朝廷谕令废止贵州宣慰司儒学，存在了230年的贵州宣慰司儒学，在几乎如影随形地陪伴大明王朝走完全程的时候，走进了历史，成了贵州文化教育史、学校教育史上抹不去的永恒记忆。

贵州宣慰司儒学废止三十六年后的一天，处在明清更迭的疾风暴雨中的高原小城贵阳，在它的四周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空中还有飞蝗一般的火箭……

这是顺治十五年（1658），大明降将洪承畴率领十五万清军，正在猛攻贵阳城。出身世袭贵州卫指挥佥事军职的许允达将军，正率领亲族和部下，在城上拼死抵抗。很快，贵阳东门内城区多处被炮弹、火箭击中，迅速燃起冲天大火……

经过数天激战，许将军和他的亲族、部下全部战死。贵州卫许氏军职一脉忠于大明王朝，并与之相始终了。许氏也是一个由纯粹的军屯人家演化出来的文化家族，而且是文武兼备。这个文化家族也是宣慰司儒学培养出来的，许奇是许氏的第一个举人，许奇的长子许一德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贵州乡试解元，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贵州通志》的主撰。

这场大火烧了数天，已寂寞冷清了三十六年的贵州宣慰司儒学，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在如今贵阳市的忠烈街，已找不到贵州宣慰司儒学一星半点的遗迹了，但它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研究价值还一直存在。贵州宣慰司儒学是儒家文化思想在贵州真正落地生根的标志，是贵州从“万古蛮荒”到快速融入中华文化的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朱元璋在国家治理思想上超越前人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是国家对地方实施实质治理的根基，只有文明教化，移风易俗，才能激活民族文化、国家文化向心力，才能诞生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民族大家庭，才能维系大一统文化思想，才能让大一统文化思想坚如磐石，并不断发展强大，不断繁荣昌盛；是贵州学校教育史的起点，它如一粒能生根发芽的种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让古代贵州的学校教育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也如一粒星火，点燃了高原贵州这片学校教育的荒原，星火燎原，推进了贵州学校教育的蓬勃



贵州宣慰司儒学礼门（今东山阳明祠礼门）（2023年摄）

发展。

其实，贵州宣慰司儒学还有一点遗存，就是它的那道石质的礼门。战火之后，贵州宣慰司儒学的礼门就孤独地矗立在今天的忠烈街头，嘉庆十九年（1814），在修建阳明祠的时候，它被移到了东山，成了阳明祠的礼门……

也许文化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神奇，在贵阳这片土地上，它肇始于一所学校，蓬勃于一个人物。当那所学校毁了，那个人物走了，它就用一座象征着文化教育的石质礼门，将学校和人物永恒地连接在了一起，共同述说以文化人的故事。

下文讲述的，就是那个人的故事。

## 二、龙冈书院——千古龙冈漫有名

在贵阳市修文县的龙场栖霞山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洞，因王阳明先生（1472—1529）曾在此居住，取名为阳明小洞天，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在阳明洞所在的山顶，有几间古色古香的建筑，就是著名的龙冈书院旧址。



阳明小洞天（2023年摄）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到修文龙场，担任小小的驿丞。他在龙场期间，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在《龙冈漫兴五首》的第四首中写道：

卧龙一去忘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  
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  
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  
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

他把自己比作闲居乡野的诸葛亮，预言总有一天龙冈将名扬天下。正如王阳明所预料，今日的龙冈，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无法绕过的地标，是全世界阳明心学门徒的精神圣地。

### 栖居山洞悟大道

正德三年（1508）初夏的一日深夜，龙场驿丞在小小的山洞里已昏睡多时。这是一个晴天，只是此时那弯月亮早已落下，天空只有繁星闪烁，洞中显得更



修文县中国阳明文化园  
王阳明像（2020年摄）

加幽暗昏黑。那山洞不大且浅，驿丞躺在最里边洞壁下的草铺上，临近洞口的草铺上还躺着两个他从家里带来的小男仆。可怜啊，他本来在京城任职于刑部，只因触怒大太监刘瑾，竟遭杖责四十，却未死于杖下，就贬到这龙场驿来做驿丞了。谁承想这记录在朝廷驿路案牍中的驿站，早已屋倒墙倾，竟然连个避风躲雨的栖身之所都没有，这驿站又远离州县所在，竟无人知道他这驿丞已到任月余，而周边虽有茅屋村寨，却是苗夷所居，言语不通，他也无力修复这驿站，只好在洞中栖身。

突然，驿丞说起了梦话。他一会儿一个腔调，似乎正与人对话一般。两仆早已习惯主人梦话，也未打扰。只是他说着说着，竟然从草铺上翻身坐起，人却未醒，梦话依然。两仆也翻身坐起，见主人并不叫他们，就继续听主人梦话，也不知主人说的是什么……

次日醒来，这位三十多岁的驿丞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大彻大悟了……

这个驿丞就是王阳明，他做这个梦的事情，被弟子写进了《阳明先生年谱》：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仿佛在梦境中，他得到某种启示，平日里苦苦思索的问题，一下子贯通了，如洪流江河决然而下，世界豁然开朗。原来，自己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其实一直就在自己的本心之中。“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如一灯照亮千年暗，我们常常遍寻经典，求教他人，只为得到真理的指导，结果得到的道理越多，反而越来越迷茫。殊不知一切的真理，原来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心即是理，只要发于心，则心与万物浑然成一理，此中关节一通，万事万物皆无滞碍。想明白这个问题，他兴奋得一跃而起，忍不住向着天空长啸，心底一片光明。他将自己的心得与所有儒家经典的道理一一对应，无不契合通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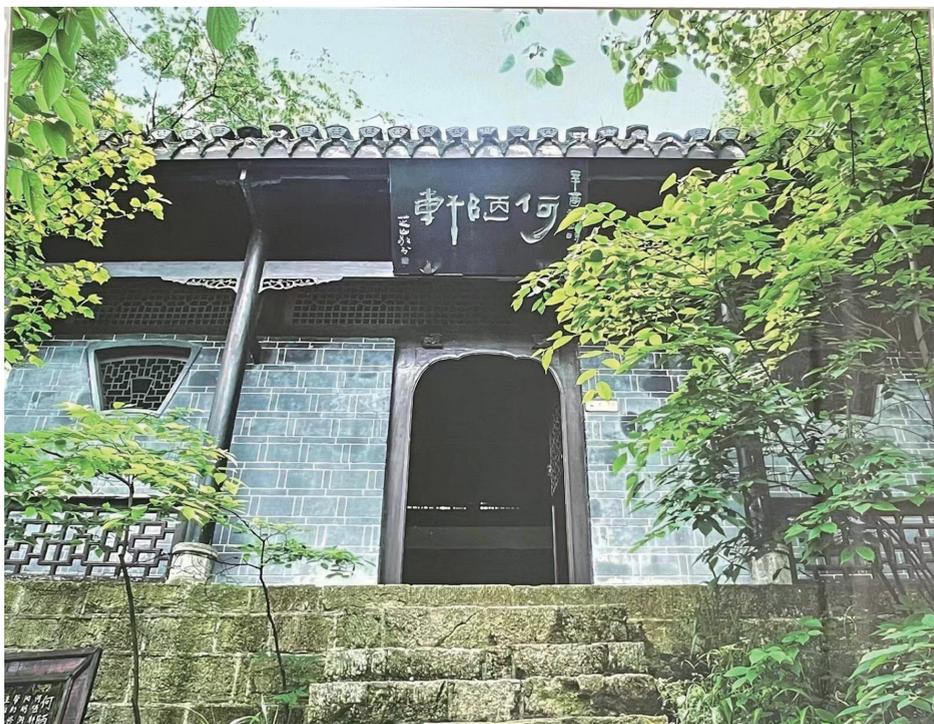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悟道了。

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会有这种经历，灵感在一瞬间如电光照亮思想的夜空，从心理学上讲，这可能是高度沉浸、充分酝酿后进发的火花，与专注和积累密不可分。龙场悟道被称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这注定是中华文明史上光辉的一夜，也从此奠定了王阳明的圣人地位。也正是从龙场开始，王阳明逐步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阳明心学。

悟道之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自内心升腾，作为一个圣人，他有不可推卸的使命，那就是弘道，教化众生。这种使命感让他浑身充满力量，仿佛圣光笼罩，他的生命在这一刻，实现了真正的意义。他坚定了传道的信心，于是他经常在阳明小洞天给周围的年轻人讲学论道，并教他们儒家文化礼仪。“有个江南的读书人在龙冈山洞里讲学”，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远近的读书人是“士类感慕云集”，周围的“居民环聚而观者如堵焉”，都赶来看热闹……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小小的山洞已经容不下了。当地居民见此情境，就自发为阳明先生在山洞旁边修建起教室来，他们平整地面，割草砍树……很快就把房子建起来了。应大家的请求，王阳明给这片房屋取了名，叫“龙冈书院”，并欣喜地写了一篇《龙冈新构》，记录了此事的经过。“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他还写了一首诗：

滴居聊假息，荒秽亦须治。凿巖薙林条，小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花药颇杂蒔。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  
轮奂非致美，毋令易倾敝。

由诗可见，龙冈书院环境十分优美。打开窗户可以看见，近处是茂密的树木和竹子，远处是星星点点的人家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河流。他希望这片美丽



何陋轩（2024年摄）

的地方，不仅仅是个人独享，来访的朋友也可以在此小憩。最早的龙冈书院非常简陋，但是已让阳明先生非常感动，于是他又写了《何陋轩记》，对当地百姓的淳朴善良大加赞赏：“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粝顽梗，而锥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也就是说，当地的“夷人”就像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也像未经加工的木材，虽然不行中原的礼教，但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 坐起歌咏俱实学

转眼到了深秋，天气已凉，农事已了。

这天下午，书院门前，何陋轩下，一群人在空地上，有着青衿小帽的汉人青年，也有衣着迥异的苗夷后生，他们说的说，唱的唱，舞的舞，跳的跳，好不热闹。王阳明也在其中，正用他那腔江南方音放声吟唱……

这不是联欢，这是阳明先生的讲学。他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授他悟出的大道。

在龙冈书院，王阳明采取了独特的教学方法。

**歌咏式。**为了打破语言沟通的障碍，王阳明创造性地采取歌咏形式教学，将儒家经典知识编成歌谣，带着大家一起歌唱。音乐是最好的沟通语言，再加上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所以讲学场面非常热闹，大家歌之咏之，有趣至极。这种形式既打破了语言沟通的障碍，也活跃了教学气氛，让学生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他并不认为歌咏是简单的游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教学手段。他说：“坐起歌咏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时至今日，当我们来到龙冈书院，山林掩映，清风徐来，仿佛还能听到当年阳明先生与学生一起歌咏的声音，如天籁般回响，这是多么和谐温馨的场面啊。圣人的教学之道，与天地自然共生共鸣，“歌以咏志”，不正是这样吗？

**问答式。**王阳明还采用师生问答的形式，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这种方法就像《论语》记述孔子和对学生的对答一样，即由弟子提出问题，王阳明回答。著名的《龙场生问答》文章中记录了王阳明解答学生各种问题的情形。学生提的多数是学术问题，也有与王阳明直接有关的社会人生问题，即使有的问题问得十分尖锐，他都耐心解答。包括学生问他为什么那么想离开龙场，是不是因为过去身处京城，对这个偏僻的地方不满，还是过去身居高位而现在身份卑微所以想要做官。而他也从自己肩负弘道天下的使命的角度，予以正面的回答，光明坦荡。并由此教育学生：“贤者之用于世也，行其义而已。义无不宜，无不利也。不得其宜，虽有广业，君子不谓之利也。”王阳明教给学生的是君子的处世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处世，为的是广行道义，在这世间推行道义，既不会不合时宜，也不会行不通，而且在君子眼里，抓不住“推行道义”

这个要害，即使自己广有产业，对社会也不是有益的。他这种广博的胸怀和师生平等谈心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心悦诚服。

在他一生的教学中，常常使用问答的形式教学。《传习录》中就记载了很多问答，留下了很多经典对话，如：

弟子曰：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阳明曰：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弟子问：做事之前，思路感觉很清晰，规划得也很好，但是开始做事之后，就发现事情和自己想的就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只静心思考是没用的，在事情上磨炼自己，一个人才能慢慢做事条理沉稳。这样的对话还有很多，先生的回答往往开宗明义又拨云见日，启人心智。

此外，讨论式、静思内省式也是王阳明常用的教学方式。

毫无疑问，龙冈书院的教学是活泼有趣的，师生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阳明先生非常喜欢，他常常在诗中记录下与学生在一起的欢乐场景：

简滞动罹咎，废幽得幸免。夷居虽异俗，野朴意所眷。  
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门生颇群集，樽单亦时展。  
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腆。林行或沿涧，洞游还陟岫。  
月榭坐鸣琴，云窗卧披卷。淡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  
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

他与学生一起，或弹琴，或歌咏，或畅游林间，在寓教于乐中传授新知。“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他也会与学生饮酒作乐、投壶弹琴，师生之间关系融洽跃然纸上。

有时候，有的学生匆匆地来，问了几个问题，又匆匆地走了。王阳明不免

失落，也会记录下师生相聚的时光。

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  
有琴不肯弹，有酒不肯御。远陟见深情，宁予有弗顾？  
洞云还自栖，溪月谁同步？不念南寺时，寒江雪将暮？  
不记西园日，桃花夹川路？相去倏几月，秋风落高树。  
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真有趣。  
胡不携书来，茅堂好同住。

学生从百里外赶来求学问道，却只住了三晚上，阳明先生向他们表达了遗憾，并自信地说“吾道真有趣”，热情邀请他们带书来，一起学习。此时的阳明先生，是情感丰富的，对书院的一切，他都倾注情感和心血，写在自己的诗歌里。

在王阳明这种大思想家、教育家强大能量场的影响下，人们蜂拥而至，龙冈书院热闹非常。他的学生中，有当地的读书人，也有少数民族的子弟，更有数百里外慕名而来的人。如湖南的冀元亨与蒋信，千里迢迢，奔赴王阳明门下。

冀元亨，字惟乾，号闾斋，武陵县人。他后来毕生追随王阳明，深得信任，后来，在阳明先生功高名盛、遭人诬陷时，冀元亨也蒙冤而死。蒋信，字卿实，号道林，常德人。后来任贵州提学副使，他在贵州重建文明书院，新建正学书院，回到家乡后，创办了桃冈书院，毕生致力于传播阳明心学，将阳明先生的大道传于天下。最初他们做学问是盲人摸象，没有机会和条件得到名师的指点。得知王阳明在龙场，他们就千里迢迢地来了。

## 启迪人生立信条

王阳明怎么也没想到，龙场驿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竟然会聚集这么多人，还都是来做他的弟子的。他想了好几天了：他们都来追随我，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这份赤诚啊！这人一多，人各有性，取舍也各不相同，难免会有这样那样



### 《教条示龙场诸生》

的误会，弄不好还会起冲突。我是不是要给他们立些规矩呢？又立些什么规矩呢？

他又想了两天，终于想好了。第三天开始讲课的时候，他将卷着的一张纸打开，然后点了点冀元亨，说道：“惟乾，你来给大家念念！”

冀元亨忙上前接过那张纸，并说道：“好的，先生！”

他双手将字纸展开，开口读道：“教条示龙场诸生……”

随着弟子的增加，龙冈书院的规模日益壮大，王阳明以《教条示龙场诸生》明确地订立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项书院教条。这是书院的规章制度，也是王阳明给门下弟子树立的人生信条，更是王阳明教育观点的体现。

第一条是“立志”，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有个志向。如果没有志向，就像舟船没有控制方向的舵，骏马没有缰绳，只能漫无目的。“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意思是立志要高远，要以圣贤为榜样，求圣得圣，求贤得贤。王阳明非常重视立志，他少年时期就给自己立下了“做圣人”的志向。他给弟弟王守文写过一篇《示弟立志说》，其中写道：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意思就是：如果不立志，那就像栽种一棵没有根的树，就算你辛辛苦苦浇灌，也没有什么用，许多人一生碌碌无为随波逐流，其实就是没有立志。这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立志是人生的起点，“致良知”是教育的目标，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从学求知而成为有“良知”的人，教人立志，就能“有教无类”。这就是王阳明最根本的教育观点。

第二条是“勤学”。他说：“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如果学习不勤，那么志向无从落实。并且他认为，学习的关键是勤奋，勤奋比聪明更重要。在勤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谦虚，“以勤确谦抑为上”，他反对飘浮不实的学风，在勤学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实践精神，“学”不只是读书，而且要将学到的“知”用于实践，从而变成“真知”，也就学以致用，用以求真，变成一个动态的循环。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教育上的体现。

第三条是“改过”。王阳明认为，大贤都有过，何况凡人呢？但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是能改过。“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一个人“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一个人就算从前是盗贼，只要

能改过，并不影响他做一个君子。他常给学生讲“象”改过的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哪怕如同“象”那样穷凶极恶的人，也有改过从善的可能。他是相信性善论的，“吾于是益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人皆可为圣”，这是王阳明的教育原则。

第四条是“责善”。这是王阳明教诲学生的朋友相处之道。他说，朋友之道“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于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隐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他要求学生友善待人，指出朋友的过错，方法要得当，语言要委婉，不要伤害对方。最好是让人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内心感动而不是难堪。他反对那种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缺陷，肆意攻击别人的人，并且说，这一条，要从他本人做起——“责善当自吾始”。作为老师，难免会有批评学生的时候，阳明先生也是要求自己，讲究方式方法，才能让学生接受教育而不至于自尊受损。他强调“善于人处”，突出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作用。

在他一生的讲学中，门生遍及天下，但是都以这四条作为教育学生的基础。他的教育观点，体现着对学生品德的培育，对学生身心的关爱，也正是在他的教育下，王门学子，英才辈出。<sup>①</sup>

龙冈书院的学子们是荣幸的，他们作为王阳明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最早的王门弟子，成为黔中王门的奠基之人。这些人在贵州的文化发展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当时的学生众多，其中不乏少数民族的子弟。他在龙冈书院有多少学生，现已难以稽考，仅在他所写的《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一部分，他们是：张时裕、向子佩、赵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陈良丞、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易辅之、詹良丞、王世丞、袁邦彦、李良丞。书中提到：“高鸣凤、何廷远、陈寿宁劳远钱别为致谢，千万千万！”想必此三人也是他的学生。

<sup>①</sup> 郭长智：《王学圣地话王学——贵阳王阳明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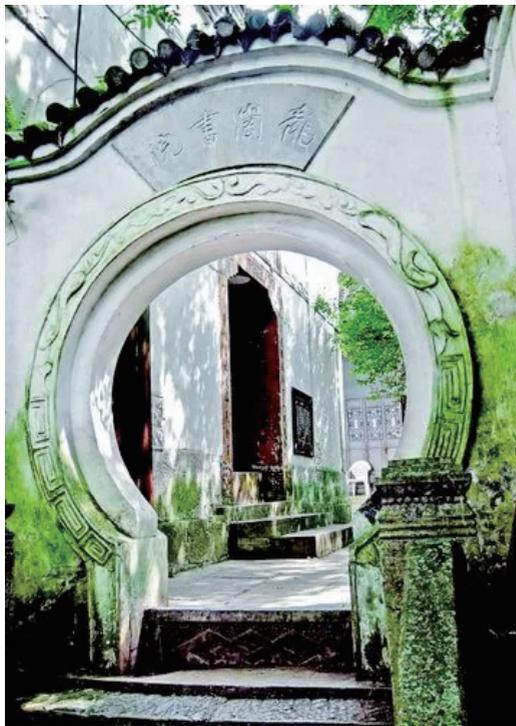
又书中有“惟善秋元贤友”之句，所以可能还有一个叫惟善的学生。朱氏兄弟为何人不明，是否也是他的学生，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这仅仅是他学生中的一部分，因为他在书中写得很明白，其一是“书院中诸友不能一一书谢”。由于龙冈书院的讲学听众很多，所以具体人数肯定不止王阳明记录的这些。

这些学生中，汤昇（字伯元）后来中了进士，曾任南京户部员外郎、潮州知府、巩昌知府。他为政清廉，就任潮州时“政事裁决如流，监税租不一染指”。《黔记》一书中评论说：“伯元得文成之正，具有吏治。”晚年以诗自娱。著有《逸老闲录》《续录》。而那个才思敏捷，爱写诗而被王阳明认为他“有所偏”，提醒他要“师圣贤”的陈文学，也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中了举人，累官至陕西耀州知州，其著作有《陈耀州诗集》《余生续稿》等。

### 书院自由讲学风

在当时，书院官学化严重，如同府、州、县学一样讲读朱子所著《四书集注》，学生多以考科举为目的。教学通常以八股文训练为主，刻板无趣。王阳明创立的龙冈书院，教学灵活，注重实学的教育方法，无异于一股清流，开启了教育的新风。他不作空论，不故弄玄虚，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使学生听得明白，得其要领，并付诸行动，称之“实学”。他的教学不是“满堂灌”的“填鸭”方式，不是自以为是的“圣贤之言”，而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怀疑、反驳，师生互勉，以交谈的方式引导学生，使学习一步步深入。他对学生不是要求他们做八股文章，而是教育他们做人，并通过诗文来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王阳明开启了贵州一代新风，在他离开贵州以后，这种优良学风不断延续，泽被后世。

龙冈书院作为王阳明亲自创立的第一家书院，是阳明思想传播的第一站，有太多独特的文化意义。后来，他一生传道，所经历书院众多，但他一定不会忘记，龙冈书院里他第一次分享悟道成果时的心境。而简陋的龙冈书院作为开贵州书院风气之先，同样价值巨大。正是龙冈书院的开拓性，如同明灯照亮昏暗，



龙冈书院旧址（2024年摄）

贵州大地迎来文教的光明。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代贵州学者翁同龢称：“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王阳明因教化边地之功，被学者称为“黔学之祖”。后世学者认为，“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冈始”。龙冈书院对贵州文教发展的影响，犹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据统计，明代贵州书院，以龙冈书院为分界线，在前140年间（1368—1507）发展非常缓慢，仅有4所；自龙冈书院后，136年间（1508—1644），迅速发展到44所。其中除了其他因素，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带来的积极影响，自是无限深远的。

龙冈书院既是阳明先生谪居龙场时的家，也是他讲学布道的场所。但在王

阳明先生离开龙场后，龙冈书院一度无人打理，破坏严重。阳明先生去世 20 多年后，在明嘉靖三十年（1551），他的弟子赵锦任贵州监察御史，对书院进行修复，并亲题匾“龙冈书院”。到明末清初，书院又被战乱毁了。

清乾隆十年（1745），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学政邹一桂和修文知县王肯谷再次重建龙冈书院。乾隆年间，陕西人秦睿以进士出身，被任命为修文知县。秦睿喜欢研究和宣讲理学，他捐出自己的养廉钱，率当地绅士和民众对书院进行维修建设，并在书院立训示十六条。每逢赶集的日子，便聚集苗民开展讲学。秦睿离开修文的时候，龙冈书院的重建工程尚未完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川人宋铎出任修文知县。在前任知县秦睿建龙冈书院未完工的基础上，宋铎又捐出自己的养廉钱续建并完工，还捐了膏火费请老师在书院为地方子弟讲学。嘉庆十四年（1809），浙江人张镛对龙冈书院进行了补修。嘉庆二十一年



重建的龙冈书院（2023 年摄）

（1816），修文知县李于垣对龙冈书院进行了维修，并购置了田产，收入作为管理龙冈书院和祭祀阳明先生的费用，还倡导建“王文成公祠”。道光二十六年（1846），贵州巡抚乔用迁、按察使吴振棫、布政使司罗绕典、修文知县许大纶等，对龙冈书院进行维修改建，更名为“王文成公祠”，并邀请当时任职贵州的一些官员一起，节选王阳明诗文书写、刻碑，由许大纶嵌于何陋轩及王文成公祠内墙。

后历经咸丰、光绪、民国年间多次维修增补，形成了以享堂、文成宫、仓圣宫、元气亭为一体的四合院。1979年后，修文县人民政府又多次对其进行了维修维护，使龙冈书院昔日面貌得以存续。2006年5月，阳明洞和阳明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龙冈书院是阳明洞的主要附属建筑。

2018年，修文县在龙冈书院旧址所在的山脚下，易地重建了规模宏大的龙冈书院，致力于阳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千古龙冈漫有名。直至今日，龙冈书院依然是天下仰慕阳明心学的人们心中的精神圣殿，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前来瞻仰。

### 三、文明书院——知行合一讲地

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的一天，一个读书人打扮的男子，正在贵州城里走街串巷，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似乎要寻找什么……街巷里，时不时会飘过一阵读书声或歌咏声，用的还是江南口音。男子也是江南人，太熟悉这江南方音了，此时，他是越听越纳闷：这边陲之地，汉夷杂居之所，何来这么多江南读书人呢？见有路人，他忙上前打听，路人回答：这是龙场王夫子教的啊！

男子心中感慨：龙场王夫子，不就是恩师吗？恩师谪龙场，时不及二年，竟然教化了一方百姓，了不起啊！

男子叫王杏，新任贵州巡按御史，王阳明的弟子。

身为巡按，微服巡访是职责，却没想到，一到贵州城，收获的竟是恩师的教化成果。

阳明先生在贵州的教化成果，还得从他在文明书院的讲学说起。

#### 百余年后又重生

阳明先生主讲的这个文明书院，已不是元朝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建的文明书院，那个书院在元末就不存在了。一百多年后，明弘治十八年（1505），浙江余姚人毛科出任贵州提学副使，他很重视边地的文教风化和人才培养，决定重建文明书院。为什么要重建文明书院呢？毛科在《创建提学道公署记》中写道：

惟忠烈桥西胡指挥废宅，洎四旁民家薄产易得，爰授以值得之，先以左偏创文明书院，以陶熔士子矣。右偏乃建提学分公司。

“陶熔士子”，也就是教化、培养读书人。所以，他不仅重建了书院，还修建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公楼。修建书院的工程从弘治十八年（1505）十月开始，于正德元年（1506）七月结束。在这过程中，还意外掘得元代《重修顺元路儒学记》的残碑一通，说明新建的文明书院的确是建于元代文明书院的旧址之上。书院建成后，毛科请贵州城的名士徐节写了一篇《新建文明书院记》。那时贵州没有几个进士，徐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徐节在《新建文明书院记》中描述了书院的规模和仍用“文明”命名的原因：

书院成，前有大门，门之内有文会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之后有四斋：曰颜乐，曰曾唯，曰思忧，曰孟辩……斋之上戟门，门之内有左右庑，上有先圣庙，庙后设师文、学孔二斋……墙垣门宇，焕然一新……以续斯道之传，仍以“文明”揭匾，盖因旧而易也。

之所以叫“文明书院”，一是在元代文明书院的旧址上重建，一是延续书院弘扬儒学的精神。徐节将毛科兴建文明书院与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周敦颐建濂溪书院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弘扬儒学的伟大善举。书院修好后，选拔了学生 200 多人就读，分班教学。书院里有一间乐育轩，毛科经常到这里来，给学生上课，和大家交流。

## 文明书院论大道

阳明先生在龙冈书院讲学的事一传开，远远近近的读书人都赶往龙场驿，拜先生为师，听他教诲。四周村寨的居民也去围观，真是里三层外三层，唯见人头攒动……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贵州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本就久仰阳明先生大名，听到这个消息，他也不顾官体，立即亲往龙场。那是讲官位、讲排场的时代，下级来见上司，小官来拜大官，就是“官体”，席书是一省学政，四品高官，王阳明是从九品的驿丞，差不多就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虽然他



文明书院旧址标示牌（2024年摄）

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但毕竟还是品级悬殊啊！

席书走了近百里驿路，才到了龙场，恰好赶上阳明先生在讲学，只好等到讲完之后，才跟王阳明见了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席书就直接说出了来意，热情邀请先生进城，请他到文明书院做主讲……

正德四年（1509）十一月，阳明先生来到文明书院。他采用在龙冈书院的教学形式，把内容编成歌咏，经常和学生一起诵唱。这种形式，既克服了言语不通的障碍，学子们也易懂、易记、易诵，很快就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席书自来听课，见到这种形式，也颇有兴致。课后，他与王阳明讨论学问，请王阳

明谈谈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点，但王阳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谈起了自己在龙场悟道的心得。第一天，席书多少有些失望，茫然而去。第二天，席书又来，王阳明又同他谈论自己的心得及其与儒家经典的对应关系。如此四天，席书终于豁然大悟，并感叹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sup>①</sup>于是席书亲率贵阳的学子，以隆重的礼节，拜王阳明为师。也是在文明书院，阳明先生基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悟道，首次阐述“知行合一”，这也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

席书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当面听到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的人。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他有高尚的道德，践行着儒家君子谦逊的传统。他为人正直且宽容，后来身居高位，多次直言维护王阳明，而且乐于举荐人才，有古君子之风。此时，就身份而论，他是一方学政，官居四品，而王阳明不过是从九品的驿丞，就年龄而言，他也比王阳明年长十一岁，



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

<sup>①</sup>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天真书院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27页。

但他依然能就学问虚心请教。王阳明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毕竟在当时，程朱理学是至道真理，几乎没有人怀疑过。朱熹主张“知先于行”，而程颐主张“知而后行”，这种学说，是为即物穷理以求明心见性的体现，认为只有认识事物的“理”，才能获得一定的“知”，方能化为指导具体的“行”。这一套逻辑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王阳明却有新的看法。他认为：“今人却以为先知然后能行，且讲习讨论以求知，俟知得真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终身不知。”这个质疑犹如当头棒喝，且指出了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在。诚然，就一件事而言，先弄清楚原委，再做出决定，是行事良方。但是，将这一理论作为指导一个社会的学术思想，恐怕经不起推敲。最关键的是，容易造成王阳明所说的如果都去求知而行，那么恐怕没有几个人这样做，最终导致无知无行。

对此，王阳明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知行合一”。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行功夫不可离。”这句话的厉害之处是，指出知的过程中有行的要素，行的过程中有知的伴随。他又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出有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的宗旨。”这段话道出了知行合一的真谛，那就是植根本心认识事物，一念动而行便起，如动善念就是灭恶念的行。后来，王阳明又完善了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之间，互为印证，共生共起而最终达到无碍无滞的圣人境界。

那么，程朱理学为什么要把“知”和“行”分开呢？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提出了心中的困惑。王阳明是委婉客气的，他说古之人之所以将“知”和“行”分开，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对那些“懵懵然任意去做”的人，要强调“知而后行”，方可保险；对那些“茫茫然悬空去思索”的人，要强调“行而后始知真”，才有益处。他并没有过激地批评古人，但他说自己提出“知行合一”，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王阳明先生在文明书院的讲学，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虽然短，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致力于弘扬“知行合一”，闲暇之余，游览贵阳的山水，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文。在书院的日子里，他写了《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一诗：

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  
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  
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  
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

诗中描写了文明书院里优美的景色，雨后细草翠绿，晴天屋檐下的桃树清新，先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宗旨，那就是传道授业。说他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改课讲题，而是研几悟道，即是确立他的讲学宗旨为弘扬圣人之道。在教学形式上，他说不要小看日常的坐起咏歌，那都是真实的学问。这首诗其实是他“知行合一”思想的一种体现。阳明先生还强调学习圣贤，要求弟子打好知识基础，重视品德修养，不要迷信、不要盲从，坚定方向，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在写给弟子陈宗鲁的《赠陈宗鲁》诗中，他说：

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言辞恳切，训导有方，也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王阳明还在写的《醉后歌用燕思亭韵》一诗中希望他的贵阳弟子们“记取青松涧底之，莫学杨花满阡陌”，要在浮躁的世界里，守静本心，研究学问，不要学轻浮虚华的作风。在文明书院讲学期间，王阳明还主持整理印

刷宋代名臣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一书，作为书院教材，供贵阳士子研习，使书院教材得到规范，学生在科举事业上受益良多。对于当时缺书少籍的贵州边陲来说，这无疑是一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建树。

## 兴衰几度问残阳

随着毛科、王阳明、席书等人离开，辉煌一时的文明书院又渐渐衰落了。嘉靖十八年（1539），王阳明的入室弟子湖南常德人蒋信（世称正学先生，又号道林先生）任贵州提学副使，时距毛科修建文明书院已近三十年了。此时的书院已经有所残破，“惟败瓦残石，颠倒隐伏于乱莽丛棘之间”。看着恩师当年讲学的地方如此荒败，蒋信百感交集，不禁感慨：“夫人之无意于风教也，一至此哉。”最重要的是，没有了书院，远处的读书人甚至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于是他决定在原址上重修文明书院。结合原来的结构和地势，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文明书院就被修葺一新了。“即故址而高、而卑、而堂、而舍，凡六月而功告成。”新的文明书院受到读书人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感谢蒋信为大家提供了庇护之所。蒋信告诉大家，书院是有形的庇护所，大家要追寻精神上的庇护，那就是以圣人之道教化百姓。大家无不叹服，纷纷向蒋信请教。作为王阳明的弟子，蒋信经常在文明书院讲授阳明心学，于是文明书院又兴盛起来。随着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文明书院已经容纳不下了，蒋信就在文明书院的右侧新建一所书院，取名为“正学书院”。贵阳的文教风气再一次振兴起来。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初，蒋信因病情严重向巡抚刘彭年请求回归故里，不再任职。刘彭年虽不愿意，但还是批准了。七月，刘彭年因为乡试事务繁杂需要人手帮忙，又派遣官吏催促病愈的蒋信尽快回来任职相助。而此时恰逢御史魏洪冕初至贵州，听说此事后，就上疏弹劾蒋信擅离职守。蒋信未做过多解释，而是释然离职而去。蒋信离职后，文明书院又渐渐陷入荒废。一直到嘉靖年间，当时贵阳的马廷锡在南明河畔的渔矶书院（位于今天甲秀楼旁河道转弯处）主讲，学者很多。马廷锡是蒋信的学生，属于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讲的

也是阳明心学。嘉靖三十六年（1557），万士和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其间，万士和多次去拜访马廷锡，作有“避世幽人三草径，了心居士一茅庵”“身带白云常满室，手栽瑶草已成林”等诗句。他邀请马廷锡主讲文明书院，并撰有《贵阳请马心庵入主文明书院启》，记录事情经过。

随着阳明书院逐渐兴盛，文明、正学书院就渐渐衰落了，最后被当作官衙使用。到了清代，文明书院成为贵阳知府衙门，民国废府后成为贵阳县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成了贵阳市人民政府驻地。

文明书院自元朝皇庆年间（1312—1313）到明朝隆庆五年（1571）的最后一次修缮，延续了200多年。其间有过辉煌，也有过荒败。真是兴衰几度问残阳啊！

文明书院的历程，与王阳明密不可分，它见证了阳明先生在贵阳的重要活动，又在阳明先生一代又一代弟子的努力下，发展壮大。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传播场所，文明书院中那带着江南音韵的琅琅读书声，见证了贵阳这座城市的文教发展历程。

## 四、王门弟子兴书院

### 阳明书院

王杏巡按贵州。王杏在贵州城微服巡访的事，很快就传开了。一天，他正在借住的布政司厢房整理巡访材料，却来了一群人拜访他。来人有几十个，都是王阳明的贵州弟子，领头的是汤昇、叶梧、陈文学。他们来拜访，不是因为王杏是学弟，也不是因为这位学弟担任巡按，而是来请求王杏出面，主持在贵阳兴建一座“王公祠”来纪念他们的恩师王阳明。阳明先生已经辞世五年了，他们觉得恩师的学问，恩师的功绩，恩师的封爵，都具备建祠享祭的资格。他们一再恳请，王杏就与贵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韩士英等商议，最终购置贵阳城东的“白云庵”建成了“阳明书院”，在书院里建了一座阳明祠。

王杏把经过写成了《新建阳明书院碑记》：

先生门人汤君昇、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余曰：“公帑未敷也。”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又次日，汤君昇辈又请……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僉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祠典有弗合焉者乎？请许之以激劝边人。”遂许之。为赎白云庵旧基，给助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祭田仪式亦备。

书院修成后，规模宏大，有门庑厅堂五座，总共十三楹，中间的三间祭祀

王阳明，其余的用来读书讲学。当时，阳明先生才去世几年，他的学说遭到小人诋毁，被斥为“伪学”。在如此局势下，黔中王门弟子依然一片赤诚，感恩遵奉阳明先生，将阳明心学的大旗树立在贵州高原之上。贵阳的阳明书院是王门弟子主导成立的第一家纪念阳明先生的书院，成为贵州推行阳明学的重要实证。

嘉靖二十年（1541），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他为阳明书院增加了祀田，保障了书院的日常开支。嘉靖二十五年（1546），王门的另一个弟子王学益任贵州巡按，他将阳明书院迁址改建到宣慰司学的右面，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学术和教育功能。

嘉靖三十年（1551），江西王门弟子胡尧时任贵州按察使，他非常关心阳明心学的传播，要求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并且组织阳明书院里的师生，参拜王阳明。他要求：

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

他还把王阳明的著作定为书院的教材，“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在他的推动下，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得到传承和发扬，阳明书院逐渐成为贵阳文教的重要所在。

阳明书院在历代王门弟子的不断维持下，日益壮大。明隆庆三年（1569），程番府并入贵阳府，需要建贵阳府学，于是阳明书院改为贵阳府学明伦堂。阳明书院由于被府学占用日久，疏于打理，渐渐荒败。

但是作为纪念阳明先生的重要书院，不可能就这样废弃。隆庆五年（1571），贵州按察使冯成能看到阳明书院的情形，“是时阳明书院已废堕，余复为恍然茫然，即檄有司为更新计”。他赶紧命令有关部门，拿出阳明书院的改建方案。贵州巡抚阮文中看到昔日的阳明书院破败的样子，也忍不住感叹：

“此岂可以妥先生之灵哉？檄司府为改建之。”<sup>①</sup>有了两位官员的支持谋划，改建阳明书院很快就有了进展。“既而得于郡城东，风气明秀，冠于黔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他们在城东，找了一块风景秀丽的地方，改建了阳明书院。改建后的书院焕然一新，“前为享堂，后为讲堂，俱六楹。前后为左右房各四楹，前为二门，又前为大门，树桌楔于通衢，匾曰‘阳明书院’”<sup>②</sup>。此时，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贵阳人马廷锡来到书院主讲，阳明书院于是声名大振，渐渐成为贵阳学子聚集求学的重要场所。

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右王门弟子郭子章担任贵州巡抚，他在贵州时间较长，功绩很大，平定明代最大的土司叛乱——播州之乱。作为王阳明的门下弟子，他常到阳明书院讲学，并写了自己的心得：“予日坐其中，因思先生在龙场，虽云困厄，未若予十之二三，而悟良知以启圣钥。”（《疾慧编·自序》）他回想阳明先生在龙场的经历，用来激励自己。

阳明书院作为传播阳明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历代王门弟子的维护下，不仅日益壮大，还在全省范围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阳明书院的示范带动下，阳明心学在贵州得到广泛传播，贵州的书院也从王阳明到贵州时的两三所增加到四十多所。当时，除贵阳外，泰州王门的罗近溪游历龙场，江右王门领袖邹元标谪成都匀，各派王门弟子与黔中王门的学者们同时闪耀贵州，他们相互论学，弟子云集，阳明心学覆盖了贵州全省。出现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为中心的五大“王学重镇”，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朝末年，贵州战乱频繁，阳明书院毁于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曹申吉重建阳明书院。康熙二十八年（1689），贵州巡抚田雯对王阳明非常崇拜，又增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并写了《阳明书院碑记》。后来的历代巡抚，均对阳明书院有所增建维护。

① 冯成能《改建阳明祠记》。

② 阮文中《阳明书院碑记》。



贵阳阳明祠的阳明书院（2024年摄）

雍正十一年（1733），贵州巡抚元展成奉旨将阳明书院改名为贵山书院，并拨银一千两增建学舍五十间，并亲题“贵山书院”匾额和“天地之性人为贵，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对联。

经过两百年的风雨后，阳明书院将书写贵阳教育历史的任务交给了贵山书院。

阳明书院是王门学子为纪念王阳明而修建的，为王阳明的思想在贵州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启了贵州文教的新时代。它孕育了贵州的科甲兴盛，为科举时代“万马如龙出贵州”的人才兴旺奠定了基础。

### 正学书院

嘉靖二十年（1541）的一天，贵州城文明书院的门前，一个老年书生模样的人，一边走一边看，一会儿捋胡须，一会儿摇头叹气……原来，三十二年前，

他曾在这书院里听阳明先生讲学，当时他二十六岁，家在湖广的常德，他是与同学冀元亨一道来贵州龙场驿的，一同拜了王阳明为师，其实王阳明也只不过比他大了十一岁。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阳明先生到文明书院讲学，他和冀元亨也跟到了文明书院……谁承想三十年后，他又来贵州了，而且是来贵州做提学副使，主管贵州的学政事务。

书院的门不仅没有关，而且还歪在一边，老头儿跨过门槛，顺着熟悉的路径走了一圈，里边早已没人。冷清寂寞都还罢了，那一间间房舍，有的已经倒了，有的已经倾斜，真不知什么时候也要倒了……唉，怎么能这样呢？这还是弘文兴学的地方？还是当年恩师讲学的地方吗？我得修复它！我得修复它！老头儿在心里说道。

这老头儿叫蒋信，是刚上任的贵州提学副使，时年五十八岁。

阳明心学起于贵州，王门弟子与贵州也特别有缘。王杏在贵州巡按两年后，调往了他省，数年后的嘉靖二十年（1541），又来一位王门弟子蒋信。蒋信跟贵州很有缘，阳明先生贬谪龙场时，他与同学冀元亨一道，远赴贵州龙场驿，做了先生的弟子。告别先生后，他学问突飞猛进，后来科举成名，走上了仕途。三十二年后，他又来到贵州，当年的布衣学子，如今已成为贵州提学副使，专门负责贵州的学政。继承了先生的衣钵，他要在贵州继续弘扬先生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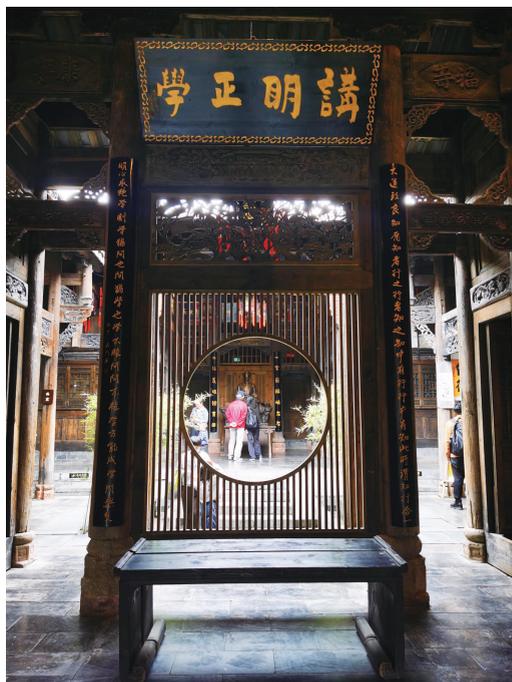
蒋信到任，见阳明先生当年讲学的文明书院残破不堪，早已荒废，痛心不已，决意修复。于是他为修复书院发起了征集募捐，得到官绅的踊跃支持。“得金百两有奇，即故址而高而卑，而堂而舍，凡六月而功告成。”文明书院修复后，蒋信经常亲自在其中讲授阳明心学，一时之间，学风鼎盛。

作为阳明先生的弟子，蒋信学养深厚，在他的影响下，黔中士子来事学者越来越多，文明书院已不能容纳。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蒋信决定在紧靠文明书院的右侧再新建一所书院，取名为正学书院。为什么叫正学书院？他解释道：“曰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正学书院修建了“止善堂”，

供大家学习讨论，他又亲自撰写了《正学书院落成记》，详细记录了修建的经过。

值得一提的是，蒋信在《正学书院落成记》中强调，正学书院是要选拔“士之秀出者养之于中，而示以趋向”，这就决定了正学书院的两个属性，一是进一步弘扬阳明心学，以心学为正，故名正学书院；二是培育精英，将文明书院中学习优秀拔尖者，选拔至正学书院来学习。这样一来，就在贵阳的书院教育中开创了精英教育，为培养人才开辟了空间。当时，诸生以努力学习、进入正学书院为荣。这为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和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蒋信非常重视正学书院的发展，进入正学书院的学生，要经过考察选拔，他本人也经常亲临书院讲学。他被认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传播者，在他的支持下，正学书院越来越兴盛，开创了贵州阳明心学的盛况。在当时的学术界，贵州对阳明心学的传承和研究，可谓是遥遥领先。正学书院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为“黔中王门”的形成奠



讲明正学对联（2024年摄）

定了基础。对此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蒋信，也被后人尊称为“正学先生”。

遗憾的是，正学书院在明代隆庆年间毁废严重。隆庆五年（1571），浙江慈溪人冯成能任贵州按察使，看到正学书院如此破败，于是加以修整。后来随着明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正学书院在清代成为贵阳府的官衙。

和贵阳的其他书院相比，正学书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的影响却很大。从阳明先生在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开始，心学的种子已经在贵阳种下。阳明先生离黔后，近三十年，贵阳书院逐渐衰微，是蒋信的到来，重新兴起了贵阳的阳明心学。他亲力亲为，赴书院主讲，并公开倡导阳明心学为正学，选拔优秀人才以充正学书院，树立了黔中学术以心学为主的明确导向，这也是阳明心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惜不被学者重视，《明儒学案》中未提及有黔中王门。历代学者限于陈见，认为阳明先生只是在龙场悟道，但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却视而不见。实际上，在王门弟子王杏、蒋信等人的极力推动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蔚为大观。自文明书院、阳明书院、正学书院、渔矶书院一脉传承，阳明心学有汤昇、陈文学、孙应鳌、马廷锡、李渭等人，研究成果丰硕，足以成王学一门。

天下王门学者众多，在全国传播广泛，这当中，贵阳正学书院可谓独树一帜。在阳明先生去世后，阳明心学一度被质疑为“伪学”的背景下，在云贵高原打出阳明心学是“正学”的旗号，是难能可贵的。贵州学子的感恩之心，对阳明先生的由衷信奉，是阳明思想传播史中光彩的一笔。

## 渔矶书院

人说贵州城南门外的渔矶湾畔风景如画，值得一游，但上任数月来，王绍元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王绍元是贵州巡抚，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天到贵州城的。

深秋的一天，正好是休息日，天气甚好，天蓝云白，王绍元带了一个随从，就信步出门，他要去渔矶湾走走。

南门外，南大溪（今南明河）绕城而流，在鳌矶石以下形成了一道美丽的河湾，叫渔矶湾。这里水面宽阔，河水清澈，绿树成荫，还有人划着小船在河中捕鱼……

遥见对岸有一小亭，亭中还有一人在摇头晃脑地读书。于是王绍元让随从去河边叫了船，他要去对岸跟那读书人聊聊。船到河心时，他又看见有七八个年轻人出现在亭子里，似乎正在向那读书人讨教。于是向划船的艄公打听，才知那是心庵先生在讲学。

王绍元到贵州城不久就听说过心庵先生马廷锡，只是一直忙于公务，没能抽出时间去拜访，今天出来走走，竟然与心庵先生不期而遇了。

王绍元过了河，在渔矶湾散了一会儿步，直到那些年轻人都走了，他才进亭子跟马廷锡见了面，聊了好半天……后来，王绍元一有空就来跟马廷锡交流。再后来他就决定在这渔矶湾畔给马廷锡建座书院。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学者皆称心庵先生。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嘉靖十九年（1540）乡试高中举人。当时，王阳明先生的弟子蒋信，在湖南武陵桃花冈构筑精舍，聚徒讲授，传播阳明心学。马廷锡不辞劳苦，远赴桃花冈，拜蒋信为师，刻苦学习阳明心学长达数年。直到对阳明先生的心性之学完全心领神悟，他才拜别恩师，回归故里。这时的他已经满腹经纶，在担任过几任地方官后，马廷锡选择辞官归隐，在渔矶湾的栖云亭中，读书传道。

渔矶湾风景优美，当时贵阳名士袁应福写了一篇文章《栖云亭》：

邻人马朝宠新作一亭，名以栖云，距余家后园才数武。余喜，便于登览，得朝夕与共乐之，因为赋诗。

作亭在荒陂，丛筴乱其址。翛然林莽间，空翠来不已。

入门苔径滑，疏篱间多积。亭前挂长松，墙西放郁李。

花坞与药栏，一一位置美。吾园及此亭，相距咫尺耳。

来不问主人，相见翻共喜。尤爱修竹林，摇碧映窗几。

想见六月凉，风露浩如洗。别藓露奇石，高怀缅长史。  
解组内江归，息影栖于此。寤歌真自适，穷愁未应耻。

从诗中看来，栖云亭所在茂林修竹，繁花盛开，可以想见当年风景之美。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阳明的弟子徐霈任贵州按察使，他扩建栖云亭，并作《栖云亭记》：

心庵青年解绶，杜门静养已十载矣。有见天地万物浑为一体，而物动易趣，愈思愈乱，外融内一，性乃孔昭，此其所自力者。侍御王公奇之，为构堂以居焉。然而颓垣荆榛，步武错迕。余至，乃緝而新之。插竹编篱，有亭有门。亭曰“栖云”，门曰“渔隐”。亭之前，凿池如玦，映之以月；门带流水，激以石湍，其声潺潺，如钩如轮。山川出云，或曰云取其幽也，渔取其隐也。心庵栖云而渔隐，所谓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其称名欤！又曰兹地山川奇丽，泉谷空鸣，昼夜不辍，而又覆之以云，或为白衣，或为苍狗，变怪百出，莫可指陈……

这篇记对马廷锡先生的学问倍加赞扬，也描写了栖云亭的优美风光。马廷锡在这山水俱佳处讲学，远近的读书人纷纷前来，一时间学风蔚然，热闹非凡。

嘉靖三十六年（1557），金谿（今江西金溪）人王绍元担任贵州巡抚，他对马廷锡的学问非常佩服，极力向朝廷推荐马廷锡为“真儒”，望其能“出山”入仕为官，但廷锡早已绝意仕途。于是，王绍元在渔矶湾为马廷锡湾修建了一所书院，取名为渔矶书院，该书院位于南明河流经甲秀楼附近的左岸。院内建有主静堂和栖云精舍，以满足更多的学子读书求学。在马廷锡的主持下，前来渔矶书院学习的生员越来越多，有的学生不远数十里、上百里负笈而来。一时间，“南方学者争先恐后负笈请业”，“蒋道林（蒋信）桃冈精舍讲学盛况，俨然再现于渔矶栖云间”，渔矶书院的盛况可比肩桃冈书院。

到了万历、隆庆年间，马廷锡讲学之风日盛，声名愈振。贵州巡抚南昌人阮文中，按察使慈溪人冯成能，提学宜兴人万士和，纷纷拜谒提请，礼聘他到城内的“正学”“阳明”两书院担任主讲。于是马廷锡又到正学书院去教学。随着马廷锡的工作重心转移，渔矶书院已不再是讲学之地，而仅仅作为他生活起居之所。马廷锡晚年与孙应鳌、李渭往复论学，三人有唱和诗文多篇。万历初，江右王门邹元标贬滴贵州都匀，讲学必称三先生，可见他们影响之大。马廷锡也写了很多著作，如《动静解》《自警辞》《警愚录》《渔矶集》《渔矶别集》等，可惜都已经亡佚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底，马廷锡的恩师蒋信病逝，他远赴湖南为蒋信治丧、塑像、建祠，此期一二年内，渔矶书院实际上已经盛况不再。时至今日，



渔矶书院旧址翠微园（2024年摄）

南明河畔渔矶湾上的渔矶书院已不复存在，但其附近的甲秀楼和翠微园依然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教历史。

渔矶书院是因学识渊博的马廷锡的聚众讲学而兴起的一所书院，它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贵阳教育的影响却很大。马廷锡一生兢兢业业，在贵阳讲学三十多年，每次授业听讲常数百人之众，成就人才，不计其数。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毕生致力于传播阳明心学，开创了贵阳的一代学风，对贵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五、贵州设闈乡试始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据说这是刘基的一首预言诗，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贵阳李端棻那副祝贺赵以炯中状元的对联里也用了这个诗意，想来刘基可能真写过这首诗。如果用这首诗来形容贵州科举文化的发展，还真让人不能不想起那些为贵州争取一所贡院的人和事。

### 田秋上奏是首功

正德五年（1510）六月，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在从“省城”贵州城（今贵阳）前往云南省昆明城的驿道上，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和四五个成年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是去赶这一年云南乡试的贵州生员。他们从省城出发，已经在路上走了十几天了。这少年是四十天前从水德司过来的，叫田秋。一起上路的是五个人，还没走到省城，就只剩他和另一个成年人。到省城又与几个去乡试的生员结伴而行，才到普安州，又只有五六人了。

正走着，有人叹了口气，说声“我不要这功名”了，掉头就往回走。众人赶忙一阵劝，他还是边走边说：“你们考中了，做了官，上个奏，求朝廷给贵州设个闈吧。”就一晃一晃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那人走远了，田秋才心里发誓：我一定要走到云南府，争取考个举人，等有了前程，一定要给朝廷上奏，请朝廷给我们贵州设闈，修贡院！

这几个人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了，又走了十几天，终于赶上了云南的乡试。

他们这几个人中，最幸运的就是这十六七岁的少年田秋——他考中举人了……

十九年后的一天早上，一太监把一份请在贵州设闈的奏折放在了嘉靖皇帝书房的御案上。

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明代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城）人。田家原居江浙，到田秋的曾祖父田永富时，才迁入贵州。田永富精通中原文化，田家后面几代人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田秋的祖父田万钟对诗词书画十分在行，尤其是楷书写得特别好，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当地人推举为教师，专门教育富家子弟。田秋的父亲田显文是田万钟的三儿子，人称有“异质”，从小跟着父亲田万钟熟读《毛诗》，十二岁起师从学者孙善述。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田秋就出生在这个书香之家。田秋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又勤奋好学，三岁开始识字，一年后就能识字四千多，五岁已读书数卷，每天都能写下数句话的日记，七岁时已能写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在府城思南已小有名气；十三岁参加思南府城童试，成为府学生员（秀才）；十七岁远赴云南参加庚午科乡试，考中举人；二十一岁进京会试、殿试，考取进士，成为思南府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考中进士后，他却放弃做官，请假回家孝敬父母，二十九岁才走上仕途，出任福建建平府推官。两年后，父亲去世，田秋归乡守孝。守孝期满，朝廷起复，出任河间府推官，次年奉调入京，任户科给事，后历任礼科左给事、吏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等职。

田秋就任户科都给事 中后，他给嘉靖皇帝上了《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

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以此也。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

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侵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渐增解额，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若两广之盛乎！议者曰：科之不开，病于钱粮之少，臣窃以为不然。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而举人坊牌之费，贵州自办也。鹿鸣之宴，贵州自备也。今所加者，不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每岁不下数百两，思南府又有棉花税。若设一税课司，委一廉干府官监收之，每岁亦可得数百两。只此数项，足够其费。况求才大事，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且历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盖一方之至愿，上下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区画之详，在彼必有定议，乞敕该部再加详议。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劝，则远方幸甚。

田秋所奏，概括起来就是：贵州附试云南弊端太多，不利于贵州培养和选拔人才，贵州已具备开科取士的条件，而且开设贡院的费用贵州自己能够承担，请朝廷在贵州建个贡院，让贵州独立举办乡试。贡院，就是今天说的考点或考场，只是在科举时代，每个省只有一个贡院。如果一个省连贡院都没有，这个省就没有举办乡试的资格。贵州就遭遇了这份尴尬。从洪熙元年（1425）朝廷允许贵州学子参加科举，到田秋上奏，已经105年了，贵州，大明的第十三

个行省，一直附试云南，贵州的学政由云南代管。

贵州设闈这件事，早在田秋出生的弘治七年（1494），巡抚贵州的右都御史邓廷瓚就上奏过，后来还有几个人也上过奏折，朝廷都用“贵州人才未盛，旧制未可轻改”给驳回了。后来，按察贵州监察御史张淳、镇守贵州总兵官焦俊也上过奏，仍旧被朝廷用这个理由给驳了回来。

嘉靖皇帝很重视这件事，内阁首辅张璁等商议后，就将田秋的奏折转到了礼部，让礼部勘议后回奏……

但是，田秋的《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在礼部躺了四年，因为“勘议”并不轻松——这须做实地调查和研究，还要做综合评估。可贵州，距京城万里之遥，到贵州任过职的官员都说那里是穷山恶水，礼部的官员谁也不想揽这个苦差，田秋虽然想，但他是贵州人，朝廷不会让他回家乡做“勘议”，他的“勘议”也作不得数。他心里着急，但毫无办法。其实，嘉靖皇帝也没忘记田秋上奏的这件事，只是以为礼部还在“勘议”。

后来，田秋就离京外任了，他先后出任过福建布政司左参政、四川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职，四十八岁辞官回乡。田秋为官，廉洁奉公，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功德卓著，政绩斐然。

田秋争取贵州开科取士的建议，还需等待另一个人来完成。

### 王杏贵州建贡院

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在贵州城里转了几天。这天，他带了按察使韩士英，一起来到贵州城内的西南角，那里是一片空地。他们站在一个土坎上，王杏指着这片空地对韩士英说：“这块地虽靠近城墙，但总体还算开阔，我看建个贡院，还是建得出来，韩大人，你看呢？”

韩士英看了看，说道：“王大人，你可真是有心人啊！这块地不错，建个贡院足够了，而且开考时也好防范！”

王杏道：“我们去见布政使大人，就抓紧把贵州设闈的事上奏朝廷吧！”

于是两人转身下了土坎，就去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嘉靖十三年（1534）的一天，新任贵州按察使韩士英和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到皇宫来陛辞领训，嘉靖皇帝在训诫勉励一番之后，就将勘议贵州设闈的事交给了这两人。

两人一到贵州，立即着手勘议，又与布政使等省级高官做了合议，于是王杏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

贵州自建省设学校养士以来，历百五十年来，文教茂往昔十倍。诸生就试云南，苦于道路。今于贵州城内西南隅择地，可以营建贡院。计所需白金二千四百余两，检藩库羡缗可办。

王杏虽然是个正七品的小官，比正三品的按察使、正二品的布政使低了好几级，但他是巡按监察御史，是代天子巡狩，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是“以小制大，以卑临尊”的角色。官阶低却权力大，所到之地，除监察地方官、审录罪囚、检察非法用刑这些主要职责之外，还负责检察仓库钱粮，查勘农田水利、桥梁驿站，考察政教民情，检查、勉励地方办学兴教……对地方事务都有监察权。因此，王杏上这份奏折，比布政使、按察使都更有分量。

王杏在奏疏中以实地勘议结果，肯定了贵州一百五十多年来办学兴教的业绩，用“文教茂往昔十倍”的事实，否定了“贵州人才未盛，旧制未可轻改”这一惯用的论调，为贵州设闈做了最有力的争取；用“诸生就试云南，苦于道路”，再次强调了田秋奏疏中关于贵州学子“附试云南”的弊端；再报告了贡院选址和费用预算，并强调“检藩库羡缗可办”，也就是贵州行省的国家金库里的结余银两就能够负担贵州设闈的资金需用。

王杏的奏疏坚定了朝廷在贵州设闈并与云南分开乡试的决心，于是朝廷再次将田秋奏疏、王杏奏疏交给礼部研究。礼部经过讨论、评估后得出结论，并

将结论上奏朝廷：

贵州文教渐洽，人才盛行，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往往文章气节与中原江南才俊齐驱。

这个结论，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估结果：贵州文化教育一天比一天好，已培养出大量人才，每一次的科举考试都有人参加并考中举人或进士。近些年来，无论是选入翰林院继续深造的贵州进士，还是被授予各部职事或担任言官的贵州进士，他们的文章和人品、气节，都是能跟中原、江南科举出身的优秀人才并驾齐驱的。这个评估结果，为朝廷最终决定贵州设闈提供了最有力的实施依据。

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核准并下谕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许贵州自乡试，免附云南，解额贵州二十五人。

朝廷同意贵州自主举办乡试，自此结束“附试云南”，并且明确贵州乡试录取举人名额为25人，在上一科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名额，这是王杏向朝廷争取的结果。此后逐科增加，贵州乡试录取举人的最后定额是每科30人。

于是，贵州省城（贵阳）就建了第一个贡院，贵阳也就有了第一条“贡院巷”。当时的贵州城（贵阳）本来就不大，宣慰司学附近已无空地，王杏和贵州行省官员在前期勘议时，就选定了贵州城内西南角靠城墙边的一片空地，作为贵州贡院的修建之所，具体位置在今贵阳都司路市一医一带。贡院虽然靠近城墙，但整体建筑规范而宏敞。根据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和《贵阳府志》中的相关史料，可作一个大概描述：

贡院建筑群落坐南朝北，居中有两座建筑，一座是明远楼，一座是至公堂，它们的后面还有一座天监堂。天监堂的东西两边，对称建了教务用房，一边两间，分为誊录、受卷、弥封、对读四所。在天监堂的后面有一间叫“内帘”的

房间，门上挂着一块题有“桂香”二字的匾，再往后还有一座挂着“文衡”匾的堂，堂内左右都是房间，这就是考官阅卷的地方。在至公堂的左边是“监临”房，右边是“提调”“监试”用房，前边是“文场”。“文场”就是考场，里面就是“号房”。“号房”就是编了号的很小的独立房间，相当于今天考场里的考生座位。文场的前面有三重门。给考生提供饮食的供给所第一道门的外边。第一道门叫“天开文运”，延会、搜检、巡绰这几个点设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

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首次乡试开科取士时，王杏已改任巡按山西监察御史。他在贵州辛苦了两年，建好了贵州的第一所贡院，却没看到贵州首次乡试的空前盛况。

### 首次乡试赛盛典

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大明全国“两京十三省”举行丁酉科乡试，从开“龙门”迎接众生员入闱，到贡院发榜，紧张忙碌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而贵州行省乡试副主考王诰仍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中，他欣然命笔，写起《嘉靖十六年贵州乡试录后序》：

皇上主一所敬，尽制尽伦，以锡极于四方，四方象之，越十五年矣，千万里外无不于变震叠。此科诸事，类皆草创，无不整整如故事。黔士之文，大抵皆中闾外肆，膏沃光烨，而穷理博古，识时务之学，无不具也……猗欤盛哉！百七十余年旷典也！

“太华丽、太盛大了啊！这是一百七十多年来的空前盛况啊！”从王诰副主考这两声感叹中，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到他那激动的心情，完全可以推想出当时那种宏大、热闹、喜庆的场面。

当年八月，近千名贵州生员齐聚省城贵州城，参加贵州首次乡试，那场面究竟有多壮观，我们没法目睹，但近千生员角逐 25 个“解额”（贵州首科举人名录见附表 1-1），那竞争该有多激烈？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是贵州古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贵州科举文化的里程碑。传统儒学教育，在贵州，在贵阳，经过艰难的“厚积”，终于以科举的形式“薄发”了。科举，在贵州这片高原上游荡了近千年才找到了父母，又用了一百七十多年，终于从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少年，终于可以借贵州学子手中的狼毫，在神州大地上，跟中原跟江南这些“千岁老人”，同台起舞了。

只是明末清初的战火把王杏主持修建的这个贡院毁了，在今天的贵阳都司路上，已没有一星半点的遗存了。清朝平定西南后，贵州巡抚在今贵阳太平街



甲秀楼（2024 年摄）

和省府西路之间，又建了一个更大的贡院，贵阳就有了第二条“贡院巷”。只是随着科举时代的落幕，贡院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江东之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贵州巡抚，任职期间，在贵阳城南门外的南明河中那块叫“鳌矶”的礁石上，修建了“甲秀楼”。

甲秀楼，取意“科甲挺秀”，但是，明朝贵州的科举还谈不上繁荣，只有109位进士，贵阳也只占了30个名额（明朝贵阳辖区进士名录见附表1-2）。

贵州独立乡试后，贵阳也出过一些科举出身的名人，比如：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马士英（约1591—1646），南明弘光朝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明史·马士英传》：

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人杨文骢（1596—1646），南明隆武朝浙闽总督。在率众抗击清军的战斗中，杨文骢负重伤被俘，守义不屈，惨遭杀害，全家三十余口也同时遇难。

两人都被清朝康熙年间的大才子孔尚任写进了传奇剧《桃花扇》，两个抗清殉国的英雄，到了孔大才子的笔下，马士英成了“误国大奸臣”，杨文骢成了“玩世公子哥”，真是笔可杀人啊！

儒学教育发展起来了，但是贵阳“科甲挺秀”，贵州“万马如龙”，却还要等到下一个朝代——清朝。

## 附表

1-1 明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贵州首科举人名录

名次	姓名	应试身份	所治经书	科举成绩及影响
1	浦仲良	乌撒卫学生	《礼记》	贵州解元第一人
2	莫 侔	清平卫学生	《诗》	
3	陈嘉兆	思南府学生	《书》	
4	刘时举	铜仁府学生	《易》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5	王 炯	清平卫学生	《春秋》	进士
6	李文弼	普定卫学生	《诗》	
7	陈嘉略	安庄卫学生	《书》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8	黎 宇	宣慰司学生	《易》	
9	姚大英	乌撒卫学生	《春秋》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10	闻 贤	永宁宣抚司学增广生	《诗》	进士
11	狄应期	兴隆卫学生	《书》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12	王 珮	宣慰司学增广生	《易》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13	胡志学	永宁宣抚司学生	《诗》	
14	刘志美	普定卫学生	《书》	
15	蒋宗鲁	普安州学增广生	《易》	进士,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16	桑育贤	永宁宣抚司学生	《礼记》	
17	潘维岳	宣慰司学生	《诗》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18	胡 资	安庄卫学生	《书》	
19	雷鸣阳	永宁宣抚司学增广生	《易》	

续表

名次	姓名	应试身份	所治经书	科举成绩及影响
20	姜潮	思州府学训导	《诗》	
21	项文纪	普定卫学增广生	《书》	
22	张友仁	宣慰司学生	《易》	
23	张鹤年	普安州学生	《诗》	
24	潘静深	普安州学生	《易》	
25	陆天衢	都匀府学生	《诗》	[乾隆]《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 1-2 明朝贵阳辖区进士名录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1	秦颢	正统七年壬戌科	三甲二名	云南左参政
2	易贵	景泰五年甲戌科	三甲二名	辰州府知府
3	黎逊	天顺元年丁丑科	三甲四十八名	长沙知府
4	钟震	天顺元年	三甲一百三名	工部主事
5	俞玘	成化八年壬辰科	二甲九十九名	主事
6	徐节	成化八年进士	三甲一百三十六名	山西巡抚
7	朱璧	成化二十年甲辰科	三甲十四名	都察院经历
8	郭珠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	二甲一百零五名	按察司僉事
9	詹恩	弘治十二年己未科	三甲三十五名	大理寺副
10	汤昇	正德十六年辛巳科	三甲二百零七名	巩昌知府
11	汤训	正德十六年		同知
12	刘秉仁	嘉靖二十七年丁未科	三甲一百十七名	鄖阳巡抚
13	陈治安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		南京工部主事
14	姚世熙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	三甲一百二十七名	太仆寺卿
15	汪若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	三甲二十一名	大理寺评事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16	许一德	隆庆五年辛未科	三甲六十六名	云南副使
17	马文卿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	三甲二百三十六名	巡按广东
18	丘禾实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	三甲九十四名	右春坊右庶子
19	杨师孔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	三甲一百零七名	浙江左参政
20	王尊德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	三甲一百十七名	两广总督
21	潘润民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	三甲一百一十一名	河南参政
22	刘述祖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	三甲一名	御史
23	张慎言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	三甲八十名	知县
24	徐卿伯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	三甲二百二十一名	四川参议
25	马士英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	二甲十九名	东阁大学士
26	汤景明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	三甲一百三十三名	广东参政
27	姚咨俊	崇祯七年甲戌科	三甲二百一十名	知县
28	周祚新	崇祯十年丁丑科	三甲九十六名	主事
29	张一甲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	二甲二名	不详
30	苏国澜	崇祯十六年癸未科	二甲四十八名	御史

## 第二章 从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

明清更迭，烽火熄灭，灰烬入土……

有明朝各级官学奠定的基础，有业已成型的儒学教育传统，有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引，有龙冈等书院自由讲学之风的开启和发扬，还有贵州独立乡试的促进，传统儒学教育在清朝的贵州蓬勃发展，走向繁荣。在贵阳这座高原小城和贵阳府广阔辖区里，各级传统官学在发展中转型，形成了贵山、正本、正习等引领贵阳文化教育的书院式新型官学；传统书院走向衰落后，庭训、私塾类家庭、家族教育又遍地开花；社学、义学等普及式乡村文化教育也一度繁荣，在普及教化、移风易俗、改变文化落后现状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促进了贵阳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引领着高原贵州全面、快速地融入中华文明之中。

在贵州儒学繁荣、科举兴盛的时段里，大清帝国却国事日蹙，风华不再；亘古长新的中华文明，正遭遇最严峻、最凌厉的挑战；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的中华民族，正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凌辱中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正用血泪书写自己的百年屈辱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滚滚烽烟中，在遍地血泪里，立志富民强国的中国人，终于“放眼看世界”了，终于开始探索“师夷长技以制夷”了，终于开展了一场立足于“变器”以强国的洋务运动。然而，光绪二十年（1894）那场甲午战争，“天朝大国”惨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彻底粉碎了这场“变器”强国的“洋务梦想”，国家、民族都到了生死关头。为赅

续国脉，为拯救国运，为捍卫文明，“变法”已势在必行。

变法，变法，从哪里开始？从教育开始！刑部侍郎李端棻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上了《请推广学校折》，高高擎起了“变科举，兴学堂”这面教育转型的大旗，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序幕，开启了用“教育”为民族重生、国运重启铺路的艰苦历程。为什么从教育开始？教育不仅培育人才，更培育思想。有了有思想的人才，才能奠定变法图强的基础。传统儒学教育虽然仍在赓续国脉，但已撑不起泱泱大国的国运了，因为一千多年的科举文化已让它不断失速，在这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当口，它竟然完全丧失了动力。要挽救亡国灭种的趋势，传统儒学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已势在必行。

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在竖起教育转型大旗的同时，也明确了教育转型的具体措施：一是“变科举”，即以改变人才选拔制度来实现教育目标的转型；二是“兴学堂”，将实施传统儒学教育的各种官学、书院改革成新式学堂，以实现传统学制向新式学制的转型；三是开设天文、舆地（地理）、算学、格致（理化）、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外交）、外语等课程，以实现传统儒学课程向“新学”课程的转型；四是创设“藏书楼”“仪器院”等“五纬”，使教育形态多样化，以促进传统儒学教育模式向新式教育模式的转型。

教育转型，因无先例，需要摸索，需要试验。李端棻举荐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就把贵阳作为近代新式教育的试验田，他创设了官书局，改革了学古书院，创办了经世学堂和经济特科，为推进清末的近代教育转型积累了经验。作为试验田的贵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领跑者，西南高原上的这片“万古蛮荒”之地，终于跻身中华文明大舞台之上，站到了前列。后来林绍年到贵州做了十个月的巡抚，他创办蚕桑学堂开启实业教育，促成了贵州学子留洋看世界，为发展贵州教育做了重要贡献。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只是光绪皇帝太着急，为变法创造社会基础的教育转型大旗才竖起，一切实际行动都还没有开始，自然也就不会有成功的“戊戌变法”了。变法失败了，李端棻被流放新疆了，“教育变革”

却成了变法仅存的硕果。京师大学堂开办了，科举废止了，贵州也陆续开办了各种新学堂。年老体弱的李端棻遇赦回到了家乡，没有了“教育强国”的机会，他就做起了“教育兴省”的实事，着力推动贵阳教育转型和发展……后世用“文起八代之衰”评价韩愈，今天，是不是可以用“教起千年之衰”评价贵阳人李端棻呢？

遥想清代传统儒学教育的繁荣壮观，有当时闻名黔中的贵阳三书院，有“科甲挺秀”留存于今的贵阳三条状元街（见链接1），可以领略传统儒学“万马如龙出贵州”（见链接2）的盛况；徜徉南明河畔、甲秀楼头，寻觅李端棻的足迹，可以想象站在潮头的一代人杰，他正高擎着“变科举，兴学堂”那面大旗，近代教育转型的巨浪正一浪高过一浪，一艘艘刷上“××学堂”船号的船只正乘风破浪……

## 一、清代贵阳三书院

### 贵山书院

2004年12月的一天，贵阳天气湿冷，街上行人稀少，但是在贵山街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却挤满了人，吵得不可开交。原来，房开商开发拆迁，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六块石碑，镌刻有明嘉靖和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文明书院、贵山书院几次重建的过程及贵州首批25位举人的名单。为了搬运方便，工人打算直接敲碎处理，周围的老住户们听说后，自发联合起来，与开发者发生了对峙，最终抢回石雕、石础等物品19件。一块石碑已被工人打碎并拉走，而其他5座碑则在众人的保护下，没有受损。为了保护石碑，老住户们轮流在工地上烧起火堆守夜看护。12月13日，当地30多名老住户联名致信文物部门，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古迹加以保护。这件事情被当时的媒体报道后，文物管理部门介入，最终保全了文物。如果先贤们有灵，也会感到欣慰吧。

这块工地就是明代阳明书院、清代贵山书院的旧址，是贵阳的文脉所在。陈法曾在这里讲学，首倡书院教育教学的“十规”；赵以炯曾在这里读书，以“云贵第一文状元”的傲人成绩为传统儒学教育写上亮丽的一笔。书院在清末“新政”中改为贵州大学堂，成为贵州近代教育的一个启动点。这些石碑，是极为珍贵的文物，是贵阳文教历史的一个印证。

时间回到230年前，清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谕旨各省，在省会建立官方书院。这是清代正式建立省级学府的标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巡抚元展成在清初各督抚重修、扩建的阳明书院的基础上，再度扩建，增建学舍五十间，购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千余卷，又设置

学田作为生员膏火来源，取名为“贵山书院”，并每年给银一千两，用于书院开支。

乾隆、嘉庆时期，随着一大批名师的入驻讲学，贵山书院所中举人、进士人数年年攀升，形成了书院发展的新高峰。在一众名师中，贵州安平（今平坝区）人陈法的贡献最大。陈法任贵山书院山长近二十年，他常常亲临讲舍，宣讲理学正宗大义。他明确提出教人育才目的在于：“不过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谨乎视听言动之则，而求之遗经，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践其实，去乎外诱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强调做人为学绝不可“为富贵利达得失荣辱所牵引”；反复申诫道德修养必须“全乎仁、义、礼、智”，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修其“庄敬涵养之素”，如此方可“不致猖狂妄行”，最终培养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经邦济世之英才。他还亲自编写书院讲义，用自己的著作教育学生做实用之人。当时，全国书院均以“八股时文”为标准教学内容，学生沉湎于科举应试，并不关心时务。面对如此现实，陈法编写讲义，希望引导学生经世致用。他还制定贵山书院的院规，规范书院教学管理。乾隆十九年（1754），他亲手制定《贵山书院学规》九条和《贵山书院学约》十四条，详细规定贵山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原则及读书之法、考查之法、奖惩之法等，从而将书院一切有关教学活动，全部纳入规范管理之中。

陈法痛陈科举俗学之弊，明确奖惩制度，严明学规纪律；坚持以教养为先，杜绝俗学时文，返归理学正宗，学以致用。他的规定很人性化，充满了对学生的关爱。如《贵山书院学规》有一条：“读书勤苦，工毕杯酒自劳，亦所不禁；但不得喧呼、沉醉，亦不得引入闲人聚谈共饮，有一于此，断不姑容。”居然允许学生饮酒！这在那个时代的书院，简直不敢想象。他主持贵山书院，待遇是很丰厚的，但是他并不是为了钱财。相反，他把自己的收入捐出来，增加学生的生活费。由于黔省边远闭塞，书院图籍稀缺，陈法又数次派人前往京师购置内版图书贮于院中，供师生披览研读。《安平县志》载：“（陈法）掌教贵山书院，十年所得修脯，一无所取，为置书院膏火，数遣人往京师购置内版书

贍院中。”经过陈法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贵山书院成为贵州藏书最为丰富的书院，是为西南地区最出名的书院之一。

继陈法之后，福建福清（今福清市）人张甄陶和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艾茂先后出任贵山书院山长。他们学问渊博，尽心教育，对贵州文教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三人被后人尊为“贵山三先生”（见链接3）。

在贵山三先生的相继主持下，贵山书院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省府书院，所培养的人才兴盛勃发，出现了“俊杰之士，比于中州”的兴旺局面。贵山书院历经40余位山长，他们和贵山三先生一样，秉承务实求真的教学思想，为贵州文教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贵州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贵山书院辉煌的办学成就，造就了许多贵州人才。乾隆六十年（1795年），著名诗人、散文家洪亮吉任贵州学政，时值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当他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27人的喜讯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诗中有云：“贵山储人才，两岁隼及册。”“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其意为贵州的人才兴起，将会赶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以产宣纸闻名）、歙县（徽州所属，以产墨闻名）。贵山书院培养出了赵以炯这样问鼎科举的状元，其他优秀学生在各行各业也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州巡抚邓华熙奉旨将贵山书院改设为贵州大学堂。

## 正本书院

清嘉庆五年（1800）初冬的一天，贵阳知府一大早就到巡抚衙门请见巡抚大人。原来是巡抚常明交给他的两处工程竣工了，他来请巡抚大人去验收。常明听他报告完，就派人去请其他官员，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去验收。不多久，人都齐了，都坐了各自的轿子，去了贵阳城北门。

众人出北门又走了一段路，才看到了他们要验收的工程。当时的贵阳城已

经扩建过了，北门外还有六广门，这工程就在北门和六广门之间，是一座书院。这书院是常明带头捐资兴建的，他当时是以贵州布政使代理巡抚职务。看着眼前这座高大轩敞的书院，众人都请求常明给书院题名。常明看看众人，也不推辞，就在早已铺开的宣纸上挥毫落墨，写下了“正本书院”四个大字，然后又接着写出一副对联：

正人心以变风俗

本经术而为文章

这副对联，把对教育的理解和办书院的作用概括得简洁明了，而且准确、深刻，真是言简意赅。众人原本有一点看笑话的心思，见了常明的字和对联，都赶紧收起了那份心思，一个劲儿地说起了赞誉之词……

他们都以为常明没多少文化，也就存了那份心思。

常明的全名是佟佳·常明，满洲镶红旗人，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名由笔帖式起步的武将，因为立了军功，才由知州、知府、道员一步步升任贵州布政使的。别看他是个武将，他却非常重视教育，他一到贵阳上任，就觉得贵阳作为省城，竟然只有一个贵山书院，这是不能很好地发展教育推进教化的。他立即带头捐资，在贵阳北城和南城兴办了两所书院，北城的叫正本书院（亦称“北书院”），南城的叫正习书院（亦称“南书院”）。常明还将公款银 6000 两，存于粮道库房，收取利息来作为书院师生的教育学习费用，保证书院的长期运转。此后，贵阳三书院鼎足而立，文风大盛，科甲兴旺。

不久常明离任去职，之前的公款被接任的巡抚伊桑阿全部贪污，用作嫁女儿的资费。于是南、北两书院顿感经济危机，运转无以为继，不得已只得从贵山书院的经费中，划拨一半以充南、北书院之用。结果是三所书院都感到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和师生的生活质量。

嘉庆六年（1801）七月，伊桑阿被时任云南巡抚的初彭龄弹劾告发，朝廷命云贵总督觉罗琅玕查处、审理此案。在勘问核实后，将伊桑阿革职查办，绳之以法，三所书院才得以勉强正常运行。

正本书院又称北书院，在今天的中华北路一带。书院在原贵筑县丞办公楼的基础上建成，规制相对完备，有头门七间，左为门役房，右为书办房。门内讲堂三间，堂之左右斋舍各十间，堂内客厅三间，厅后为山长住房，后为尹公祠，专门祭祀尹珍，其他一切后勤生活设施，也非常完备。嘉庆五年（1800）建成后，经历了伊桑阿贪污书院经费一事，发展大受影响。

嘉庆二十四年（1819），粮储道倭臣布见书院讲堂、学舍、墙垣等因日久多呈倾圮之状，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带头号召捐款，将所得捐款交给贵筑县令，用作书院整修。在大家的努力下，书院一个月就焕然一新了。

同治八年（1869），贵州巡抚曾璧光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

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严寅亮曾主讲正本书院。严寅亮（1854—1933），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字碧岑，号弼丞，别号剩广、剩庵、阳坡山民、阳坡居士。严寅亮幼年入塾读书，学识超群，尤好书法，常临六朝唐宋诸家法帖，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字，14岁便能提笔书匾联。同治十年（1871），严寅亮在思南府考中秀才，入思南府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寅亮从印江来到省城贵阳主讲正本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根据书院改革诏令，正本书院改为贵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阳府中学堂迁至次南门外雪涯洞，并改名为贵阳中学堂。贵阳府中学堂搬出后，正本书院的原址上改办了巡警学堂，民国期间为贵阳市北区警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云岩区公安局办公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阳中学堂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由于德楷、唐尔镛任监督，主持校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贵阳中学堂迁至南明河两江口新校址（今筑城广场贵阳一中旧址）。



观山湖贵阳一中校内新建“正本书院”（2020年摄）

## 正习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冬，书院开学的日子又到了。这天，贵阳城里的南书院比较特别，因为新任贵州学政严修亲自主持了南书院的这次开学。在一众生员集齐之后，他宣布聘请西南大儒雷廷珍担任书院山长，并将书院更名为经世学堂。

严修宣布完了之后，就请雷廷珍宣布经世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学堂除讲授传统儒家经典外，增设了天文、舆地、算学、格致（理化）和外文等课程。

一众生员听后，有的目瞪口呆，有的面露惊喜，有的想找人私语却又不敢失礼……他们进南书院读书，大多是想听先生们讲经典，做八股，然后考举人，

考进士，没想到从这一天起，还要学“西学”……

贵阳的传统书院的改革，从这一天开始了。

正习书院又称南书院，在今天的护国路一带。修建之初，书院有门头三间，门右侧有司房五间，讲堂三间。堂后有纪念尹珍的祠堂三间，祠堂左右各有斋房五间，又有西斋房六间，书办房一间，山长房十间，厨房两间。正习书院虽然规模没有贵山书院大，但是已是非常完备。嘉庆二十四年（1819），粮储道倭臣布加以修葺，光绪初年，正习学院改为“学古书院”。

光绪六年（1880），贵州巡抚岑毓英再次对书院进行整修，增加敬业楼三间，购买各种图书收藏。当时是著名学者莫庭芝为山长，主持教学。莫庭芝是“西南巨儒”莫友芝的弟弟，他学问渊博，道德高尚，是遵义“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被时人称为“黔中文坛祭酒”。莫庭芝主持书院期间，学者慕名而至，“远近宗师者数十年，所裁成茂学之士甚众”。

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人严修任贵州学政，他主张洋务改革，倡议“变通书院”，实施“教育救国”，培育新式人才。他选中学古书院为试点，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并设有外文、微积分等学科，培养懂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的人才。他亲自制定《学古书院肄业条约》，对办学做出了明确规范。他还邀请了西南地区大学者雷廷珍担任书院的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以取经世致用之意，成为贵州省第一家新式学堂。

经世学堂大胆探索，迈出了贵阳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著名的有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大书画家姚华，曾任贵州第一任教育厅长的周恭寿，曾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任可澄，达德学校的创始人黄禄贞等。其他优秀学生，在各行各业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取消，经世学堂改为贵州官立蚕桑学堂，寓意教育脱胎换骨、蝶变，更加凸显经世致用功能。宣统元年（1909），

周恭寿出任贵州教育总会副会长，以贵州咨议代表身份赴北京、上海参加请愿召开国会之机，参观各地新学，认为“黔之振兴，教育为大”。周恭寿返黔后，奉陈石林提学使令，在官立模范小学堂（1906年创办，附设高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9所）的基础上设置贵阳官立中学堂，校址在顺城街南书院。<sup>①</sup>周恭寿任监督，先办预科，次年招第一期正科生，学制4年，分文、实科。辛亥革命期间，贵阳官立中学堂继续扩建，先后修建一排砖木结构的楼房，作为教室、教师办公室及学生宿舍，又从这排楼房向东延伸修建了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共四个教室，还在炎帝宫正殿东侧修建了阶梯教室和理化仪器室，更名为官立中学。先办预科，补习英文、算术。凡在官立小学堂毕业而未学习过英文或中文、算术不及格者，都先入预科，补习一年再选正科。宣统二年（1910），奉令分办文、实两科，并招考第一期正科生和第二期预科生。后因校址颇显偏窄，亟待扩充，辟火药局一部分和炎帝宫另建校舍。炎帝宫作为新校址，自1911年开始兴建，到1923年3月竣工，前后历时十二年。炎帝宫当时称为“新校”，对街相距不过200米的南书院称为“旧校”。

从正习书院到学古书院，再到经世学堂和蚕桑学堂，最后演变成贵阳官立中学堂，这所书院从与贵山、正本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到成为贵州的新式教育改革先锋学校，在贵阳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身影。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 二、高擎教育转型旗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年八月下旬，京师北京，秋风落叶，满目凄凉。十余天前，“百日维新”夭折了，皇帝被禁足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出走，谭嗣同、杨深秀、林旭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天午后，又一须发皆已灰白的老者，项戴木枷，被两个差役押着，从菜市口走过。看那行刑之处，仍有殷殷血迹，实在触目惊心，老者悲愤已极，泣不成声。他好不容易才止住哽咽，悲愤地吟道：

怕听中秋月有声，  
要从菜市哭忠贞。  
幸予被遣为迁客，  
匹马秋风出帝京。

这老者叫李端棻，“百日维新”时的礼部尚书，因“滥保匪人”而发配新疆，今天被押解离京……

李端棻，字苾园，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家住贵阳城北长春巷（《李湛轩自叙年谱》）。同治二年（1863）成进士，入翰林院，后出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历官云南学政、监察



李端棻

御史、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廩总督，戊戌变法期间特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

## 变科举，兴学堂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如此泱泱大国竟会惨败于区区岛国日本之手，真是奇耻大辱。惨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仅靠“变器”的洋务运动不足以使中国富强，必须仿俄国、日本实行“变法”。在国势危急之际，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上《请推广学校折》，集中反映了维新派“变法以教育为先，教育以学校为本”的思想。

《请推广学校折》开宗明义写道：“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强调“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把教育同国家兴亡密切联系起来，指出教育是“治国之道，富强之本”。他认为中国“教之道未竟”，科举已成“利禄之路”，必须“变科举，兴学堂”，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讲求“经世致用”，开设天文、舆地、算学、格致（理化）、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外交）、外语诸学，培养“奇才异能之士”。推广学校，自京师至各省府州皆设学堂，使之“偏于率土”，颇具“普及教育”之意。他认为，教育之法，“匪限于一途”，应把教育推广到社会，设藏书楼（公共图书馆）使天下人有书可读，创仪器院（科学馆）供人试验，开译书局翻译外国图书，广立报馆使人们知天下大事，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官员）出国考察，实际上是一种“大教育”的理论。

以往关于教育的认识，或支离破碎，或流于空谈，而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光绪皇帝采纳并成为政府决策。光绪帝谕内阁：“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著该衙门议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复：“兴学诚自强本计，请由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课程，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办自强学堂，将十府一直隶州书院改设学堂，李端棻保举的严修在贵州创办经世学堂，熊希龄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孙家鼐奉诏命

筹办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虽以“百日维新”失败告终，但教育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变科举，兴学堂”的潮流滚滚向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强调“变科举、兴学堂、奖励游学者为根本大计”。八国联军之役后，慈禧太后为了挽救宗庙社稷，宣布预备立宪，实行“新政”，仍然继续办学。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除科举，自明年始停止乡试、会试。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升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力推广学校，派留学生出国，以《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确立了近代教育体制。清末，全国共办学堂42694所，学生130余万人，留学生增至一万两千人。民国将学堂改称学校，一直延续至今。

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不是一种个人性的教育主张，而是那一时期维新派的共同思想，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所以能迅速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并作为变法的一项根本内容而加以实施。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教育变革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所以清末实施“新政”，在教育方面依旧沿用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的教育变革主张和相关措施。

### “一经五纬”教育主张

《请推广学校折》中明确指出：“窃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李端棻认为，造成经世致用人才缺乏的主因有：一是教学内容的偏差。洋务运动中设立的同文馆，学习西方的文化、语言，却没有学习治国理政之道和经世致用之学。二是学业广而不精。学习内容宽泛，没有专业性，不专也就不精。三是重理论轻实践。不重游历、实践，只是在纸堆中去求索，不可能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四是读书只求登科。读书求荣华富贵，不是真正为了钻研技术和学问。五是培养人才数量有限。新式学堂大都设在京师，而且数量较少，在培养人才方面远远不够。针对这些情况，李端棻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教育改革主张。

“一经”指开设学堂的“三级”体制。一是府、县学堂为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要做到生源广阔，课程基础、广泛、简明、平易，修业期限3年。二是省级学堂为人才培养做好承上启下，入学须考核选拔，课程学业要精，要掌握一定的技能。三是京师学堂为人才培养做好最后把关，严控入学资格，要专业化培养，保证毕业生的待遇和荣誉。

“五纬”包括：一是设立藏书楼。不仅方便了学生学习查阅，更能保留珍藏古今中外所有的珍贵资料，对于专业及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创立仪器院。李端棻认为创立仪器院的首要原因在于“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余诸学，率皆类是”。此等仪器皆耗费不小，如果仅凭学生一人之力，是不能购进的，没有这些仪器设备，专业也无从谈起。三是开设译书局。李端棻认为开设译书局的主要目的在于“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如果要发展进步，就必须抛却成见，吸收各家所长，达到知己知彼。李端棻对译书局的职能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即分别对西方的政治、时局、教育、工商等方面进行翻译，并且以廉价发售，让学者增广见闻，开拓才智。四是广立报馆。“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这是李端棻认为必须设立报馆的原因。设立报馆还需达到一个标准，就是能让民众参与国家乃至世界的格局变化之中，便于激发国民的团结意识和民族意识。广设报馆，利用新闻的力量，可以打破全国的消息闭塞，是对全国信息的壅弊开出的一剂良方。五是选派游历。自洋务运动以来，也有学生被选中，派遣游历各国，但是收效甚微。李端棻认为导致其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之前选派游历的都是职官，而并非学生，在国内没有经过学习训练，在国外也不知如何学习，所以，游历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但是，若将学堂中的学生选派游历，两者的弊病都可以避免。对于游历的方式，李端棻建议分为两种，一是游历各国，主要探查各国的学校、工厂等；二是游历各省，主要察验各地的矿质、商务等方面。

光绪皇帝阅后，交由有关部门审议通过，降旨允准李端棻的折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帝下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各省、府、州、县之书院改为学堂。变法虽然失败，新政被取消，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下来。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下令兴办学堂，主要内容与《请推广学校折》一致。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考试，原有的各级官学和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传统儒学教育走进历史，新式教育走上前台。

贵阳紧跟时代步伐，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不久后，学古书院改名为经世学堂，成为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

### 李端棻教育实践

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被流放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获赦返乡。李端棻回贵州后，受聘主讲经世学堂，他宣扬民主、民权等内容的课程受到了守旧儒生的反对。

李端棻明白，教育改革最艰巨、最根本的障碍不在于清廷，而在于清廷继承且操纵下的古代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普通守旧儒生见识有限，他们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离了儒学精神的精髓，自然也就不会反省。事实上，不是儒学遏制了古代王朝的发展脚步，而是古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而扼住了儒学的咽喉，利用儒学的正统性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罢了。当封建王朝被迫打开禁锢思想的闸门时，早已习惯了旧式教育模式的诸多儒生大多画地为牢了，更何况普通民众。李端棻曾是阅历丰富的中央大员，他见识广博，思维开阔，其爱国之忧、家国格局，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绝不是普通儒生一时一刻所能理解的。

当然，李端棻是不反对儒学的。他只是反对专钻帖括、不研格致、不重政治的学习方式和教育方式，这一点在其《请推广学校折》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维新派在新式学堂的课程安排中，也并未将儒学课程剔除出去。这无疑是要培养具备儒学精神和西学学习能力的儒学人才。需要清楚的一点是，传承儒学并不是支持“腐儒”，对儒学的理性认识是体现在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和

对儒学精神的真正体悟中的。李端棻在《赠何季纲表弟》中写道：

书田难得兆丰年，通变聊将子母权。  
 霸主事功惟足食，圣门货殖亦称贤。  
 治生岂曰非儒者，择术何妨法计然。  
 欲救国贫先自救，萌芽商学要精研。

在李端棻的认知里，精研商学是自救治国之道，亦是通向儒家圣门的正途。深思其背后深意，岂非在表达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即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1902年，于德楷（二排左四）、乐嘉藻（三排右五）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于次南门外丁公祠，图为当年教职员合影。前排右一为李端棻

在贵阳，他对于社会基层教育的感知非常深厚，对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如果说，为官之时，他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上呈《请推广学校折》是以高层的身份从大方向上进行教育改革引导，那么，他回贵阳之后，为经世学堂设立课程、撰写《普通学说》、牵头建立中学等，则是将改革的方法具体化，结合家乡教育形势进行的细化实践。可见，李端棻在教育心理、教育思想和教育行动上真正开始臻于成熟。

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令复李端棻礼部尚书衔。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支持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派 151 名学生留学日本。同一年，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呈请将贵阳府中学堂移到次南门外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再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sup>①</sup>民国年间，这所学堂又改为贵州公学、私立南明中学、贵州省立第二中学、省立贵阳高级中学，成为贵阳一中的“五源”之一。除了支持兴办学堂，李端棻与于德楷等“以奖掖后进，改革风尚为己任”，还提倡学习外语，同时出资赞助修建资善堂书局，购置大量图书报刊供民众阅览，其中包括梁启超的《时务报》。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李端棻离开了这个世界。

斯人已逝，功业千秋。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 页。

### 三、教育改革初试水

光绪二十年（1894）盛夏的一天，在湘黔交界的山间驿道上，十余人牵着八九匹骡马，冒着毒辣辣的日头，正向西迤邐而行。为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衣着朴素，但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种气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做官的人。那八九匹骡马都驮着两个箱子，看那骡马的吃力劲儿，就知道箱子里的物件肯定不轻……这行人其实早被山匪盯上了，山匪只是在等踩点喽啰的报告……但最终山匪都没有下手，因为踩点的喽啰一路尾随，终于搞清楚了，那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是新任贵州学政，那十几个箱子里，除了官服和换洗衣物，全都是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位新任贵州学政叫严修。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直隶天津人，生于咸丰十年（1860），5岁入私塾，8岁入府学，18岁补廪生，21岁中举，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经李端棻保举出任贵州学政。



严修

#### 贵州官书局设立

光绪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而朝中旧臣因循守旧，皆听命于慈禧太后。由于无人可用，遂于光绪二十年（1894）下诏“求贤”。令下数日，大臣多持观

望态度，不肯贸然举荐，而仓场侍郎李端棻率先保举了十六名英俊之士，第一名就是翰林院编修严修。

严修到贵州上任，未携家眷，只带了几个幕宾随从，还有14箱书。到任后，他深感贵州文化落后，书籍欠缺，读书风气未兴，未及一月便仿天津书局之例，开设贵州官书局，设址于资善堂（今慈善巷）。聘贵州名宿绥阳举人雷廷珍为董事，以天津书局所编《各省官书目》为蓝本，广征图书。读梁启超《西学目录表》和《读西学书法》，茅塞顿开，认为“泰西之学，俱为当务之急”，于是印制《数量精蕴》《几何原本》《算学启蒙》等自然科学书籍，又刊印《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海国图志》《适可斋纪行》等政治、历史书籍，代销梁启超编辑的《时务报》。自此之后，贵阳风气渐开，读书看报蔚然成风。严修不仅把14箱书和另购的中西图书全部捐赠给官书局，还多次为官书局捐资，以致负债数千金。贵州官书局有图书“凡书三十四种，为册九千有奇”，分三大类：一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二是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三是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图书。

贵州官书局的设立，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通道，搭建了偏远贵州与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开风气之先地区的桥梁，以至气息相通，一改过去“见闻不宏”之陋，疏通了近代新思潮在贵州传播的渠道，也促进了贵州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 学古书院改革

严修重视观风劝学，改革科场弊端。下车伊始，就巡视了“上游<sup>①</sup>五棚”（安顺、兴义、大定、遵义、贵阳）和“下游八棚”（平越、镇远、石阡、思南、铜仁、思州、黎平、都匀），了解官学、书院及科举考试情况。他深入民间查访人才，得知某家幼童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文章诗词有才气，便将他们的表现记入《蟬

<sup>①</sup> 清代及民国初年，贵州所辖地域分为上游、下游两大片区。

香馆使黔日记》。通过考察，看到文笔出色的学生不少，即使与其故乡津门学生相比，也所差无几，唯一不足的是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导致贵州形成“士无恒产，家鲜藏书，闻见不宏，志局亦陋”之士风。为改变这一现状，严修到任后即着手教育改革。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二，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学，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类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学堂教育首次普及、推广、发展的蓝图之一，清廷因此开始创办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学堂，李端棻也因此擢升为主管全国教育的礼部尚书。作为其弟子的严修，面对学务变革，可谓得风气之先。他采取“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的办法，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32字“箴规”为办学方针，变革贵阳学古书院，从而揭开了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帷幕。

他亲自与堂长雷廷珍拟订了改革章程十一条，明确提出：“书院改革，事同创始。”章程对学堂的教育教学管理、学生品德修行、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具体是对学生的礼法、待人处世、学习、节假日、作息、起居、请假、奖惩等项做了明确规定，还要求学生做省身日记、读书札记，并规定每月由堂长调日记、札记及考勤簿，核勤惰，定优劣。最后，由学政复核，勤者酌奖，惰者初次批评，再则罚半月饷，三则开除。改革后的学古书院继承发扬了古代书院的儒家教育传统，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 经世学堂创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即选拔各府州高才生四十名入学古书院。学古书院源于正习书院，俗称南书院。《贵阳府志·城郭图记》载：“东南保之

街巷凡十九，曰顺城街，南起大街南门口，北接双槐树街，街之左有仓后街口、大田坝横巷口、大田坝巷口、正习书院、火药局巷口。”即今贵阳二十一中对门。改革学古书院，开设经史、算学、格致（理化）、外语、时务等课程，因所学知识皆可“经世致用”，次年改称“经世学堂”。以雷廷珍为堂长兼经名讲席，严修自任算学讲席，中西学并重。当时贵州算学人才奇缺，数学在贵州被称为“绝学”，为此，严修曾高薪对外聘请算学教席，但因贵州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直到开学，也没有人愿意应聘，严修只好自己亲至书院执教。后遇“颇习洋文，通算法”的贵筑举人郭竹居，才得以解决学古书院算学教席一事。在郭竹居的影响下，学古书院以算学闻名于省内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严修非常重视数学和英文的教育，贵州数学教育发轫于此，为促进贵州近代自然科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英文教育则为贵州人睁眼看世界开了一扇窗。数学、格致、英文等教育课程的设置，一扫古代学子埋头于八股，皓首穷经的科举之风，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

经世学堂的创办，是李端棻、张之洞、严修对近代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体现在：一是坚决贯彻崇实学、育真才的办学宗旨，这是办好一座学堂的根本所在。二是对学堂设置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学堂开设的课程，以教经史、数学为主，并兼习时务，突破了过去书院只教经史、不学数学的格局，适应了当时维新思想的要求。在科举考试尚在进行的年代，这种对书院教学内容及教材的改变，本身就是对旧式教育的一种突破。三是以自己的思想之变转换成学校之变，率先在贵州创办以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为主的经世学堂。学古书院的改革是一个渐变过程。甲午战败后，身在贵州的严修，深切感到洋务运动提倡的“重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的重任，只有通过“重教”、培育人才才能救亡图存，因此，改革旧式教育已刻不容缓。为加速新思潮的传播，他捐银购书订报，让学生广为阅读。并对学堂教学进行了进一步改造，亲自拟出32字学堂箴规，学堂按此要求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之后，逐渐发生了质的蜕变，原来的旧式书院影子渐次消失，新式学堂的形象

定格下来。

贵州经世学堂是贵州近代第一个新式学堂。经世学堂的创办，无论是创办时间，还是教育成效，抑或是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甚至是课程设置、教育方法、教材内容、教育管理等方面，均可谓是近代教育的开端。

贵州经世学堂的开办，在全国领先。比湖南熊希龄所办的时务学堂早半年。经世学堂培养了贵州第一代学兼中西的学生，内中有不少人后来留学日本。出类拔萃之士有创办贵州公立师范学堂的乐嘉藻，名声冠绝燕京的姚华，创办“算会”和“达德学校”的黄禄贞，贵州省教育会会长、首任教育厅长周恭寿，创办“科学会”和乐群小学的彭述文，还有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革命先烈钟昌祚。

钟昌祚（1870—1912），一名元黄，贵州开州（今开阳）人。家境贫寒，15岁入开州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古书院，立志拯救国家危亡。后转入贵州武备学堂，毕业后任兴义管带刘官礼靖边营哨官。三十一年（1905）被选派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回国后在北京西警分厅任警官，不久回贵州，受聘为开阳劝学所总董、开阳高等小学堂堂长。三十三年（1907）张百麟等30余人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组织贵州自治学社，推钟昌祚为社长。同年冬，经平刚向孙中山



钟昌祚

介绍，中国同盟会承认贵州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随后在全省各县建立分会，社员达十万之众。自治学社创办《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宣传革命主张，又成立法政学堂，以钟昌祚为堂长。钟昌祚本着自治学社“以平民为基础”的精神，在贵阳开办黔垣疏通沟洫事务所、贫民工厂、慈善会、幼女救护所、劝业女工厂，收容乞丐、游民200余人。宣统三年（1911），钟昌祚以《西南日报》代表身份参加北京报界联合会，后又到上海拜会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钟昌祚便电告张百麟等迅速策划起义。11月

3日晚，贵州起义成功，次日建立贵州大汉军政府。宪政预备会借口贵州“公口”林立，要求滇军入黔平定“匪乱”，钟昌祚走海路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请求蔡锷不要干涉贵州党争，但蔡锷已派唐继尧率领滇军入黔。钟昌祚从昆明到达安顺，被刘显世部所捕。临刑前，钟昌祚盘地而坐，愤言“我恨不死于革命之前，而死于民国成立之后”，英勇就义。

### 经济特科创设

甲午战败，严修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又谓：“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他所说的“经济”并非经济门类，而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包括内政、交涉（外交）、理财（财政）、经武（军事）、格致（理化）、考工（工业制造）六门，目的在于启用讲求实际的“旷出特达之士”。“专科”是针对科举而言，认为“以稽古为荣”的考试“无补时用”，应以“变今为切要”选拔“百才绝艺”的专门人才。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奏响了时代的强音，呼唤新一代人才的涌现，核心是“破常格以搜才”。针对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用人弊端，提出“录用不拘资格”，无论是官司还是布衣，也无论学历高低，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凡有“非常人才”的人“均准保送与试”，合格者“皆比于正途出身，不得畸轻畸重”。他认为天下之大，何处无人，主张“去取无限额数”，考试“无限疆界”，果有特达之士，“虽十拔其五，亦不为过”。他洞察科举考试弊端，认为单凭考试成绩不足以识才，必须看其实际才能，各级官员应认真“搜访”，查其真才实学。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材”的主张，具有超前意识。与李端棻“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精神完全一致。光绪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次年开了一次“经济特科”。

在科举日渐没落，而政府又未找到替代良策时，该建议可谓是为改革科举

制度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给学习新学和西学者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科举与新式学堂之间的联系，使特科与新式教育保持了一种沟通，把社会上提倡多年的西学与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结合起来，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对清末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严修任满回京，到日本东京、神户考察教育，回到天津后创办小学堂、工艺学堂、直隶客籍学堂、北洋法政学堂。清政府实行“新政”，任命严修为学部侍郎。严修协助张之洞大力推广学校，派学生留学日本。中华民国建立后，严修返回天津，与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设立“范孙奖学金”。新文化运动中，周恩来在南开组织“觉悟社”，得严修资助到欧洲勤工俭学。1919年严修将南开学校改为南开大学，该校成为我国著名的综合大学，严修被尊为“南开校父”。1929年，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

## 四、留学潮的兴起

甲午战败，大清朝野震动，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思考日本崛起的根由，于是发现日人留学西方并促成了“明治维新”，使蕞尔岛国一跃而起，成了东方强国。这一事实，证明了“留学”的重要性，这也是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选派游历”这一“纬”的缘由。在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清政府才做出了派员留学的决定。而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战败赔款早已让清政府财政枯竭，派员留学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再因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广派游学谕》等鼓励留学的政策，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了科举，于是出现了清末留学日本的热潮。贵州虽然偏远闭塞，但有时任巡抚林绍年的力挺，贵州学子也赶上这波留日的热潮。

### 发展教育思人才

林绍年用了两个月，巡察了贵州各府，着重察看了各府所办学堂的情况，一回到省城贵阳，就召集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省级官员会议。在讲完如何发展贵州经济来解决民生问题之后，他说：治理贵州，除尽地利发展各种产业之外，开启民智至关紧要，本抚查勘了各地的学堂，学堂是有了，但教习严重不足，不只不足，甚至不胜其责。就说这贵州大学堂吧，真可谓“空悬高等之名，而无中学之实”。故此，本抚以为，抓紧整顿学堂，要从多方寻求教习做起。

这事如何做，各位大人都说说吧！

官员们议论了一阵，却拿不出可行的办法来。办学是学政的主责，学政沉默了很久，才建议道：抚台大人，卑职以为在贡院办一个师范传习所，让各州府推荐二三生员来培训。

林绍年听了，说道：这个可行，但还不够。眼下各省都在做官派出洋游学的事，我们贵州也要做。当然，费用肯定是问题，本抚向朝廷争取一些官费，各州府也要想法筹措，还可以自费官助，多想点办法，派一些贵州生员去习师范，让他们回国后做师范教习，就可以培养更多的教习……

林绍年（1845—1916），字赞虞，福建闽侯人。他出任贵州巡抚之前，是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离贵州后，改任广西巡抚，以后充任军机大臣、学部侍郎，官至弼德院顾问大臣。



林绍年

林绍年做贵州巡抚仅有 10 个月，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任，次年九月离任，虽然时间短促，但他不负使命，日夜操劳，一心为贵州的发展谋出路。他一反以往驻黔封疆大员以“平乱”为治黔要务的做法，提出了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治黔方略”：发展经济。他认为“贵州问题”关键在于太穷，反映在财政上是“岁入钱粮不及他省一郡之多”，反映在民生方面则是“生计过艰”，难以糊口。面对贵州的困境，林绍年知难而上，担当起巡抚应尽的责任。他冷静分析了省情，确定了“使地无不尽之利，人无不业之身”的治黔方针，也就是说，要让大家有事可做，有饭可吃。这颗为国为民之心，便是他努力为贵州谋福利的推动力。他没有贵州“仅足敷衍，奚由自强”那种悲观情绪，而是从大处着眼，将贵州的优势概括为“地居中土，寒暑均适，五谷皆宜，富有矿产”，而贵州的问题在于“弃地利而不用”，

在于官员的态度消极，“倡率不力”。在这10个月中，他努力为贵州开辟财源。他支持安顺知府瞿鸿锡开发矿产创办丰泰公司，奏请设立制造局、习艺所和劝工所，请日本教习研究“艾粉”的用途、销路和精良制造方法，考察了桐油、漆树、茶叶的生产，主张大力发展蚕桑，等等。

在做这些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贵州不知如何利用“地利”，根源是“民智未开”，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教育是“本中之本”，应当把教育提到首要地位。在这10个月中，他竭尽全力抓教育，继承严修开办经世学堂的宗旨，讲求实用。他开办了蚕桑学堂、将弁学堂和客籍学堂。在视察贵州各地办学情况后，他深感贵州师资奇缺，将贡院改设师范传习所，选拔生员120人进行培训。他采纳李端棻、唐尔镛等人意见，开办公立贵阳中学堂。贵州高等学堂“空悬高等之名，而无中学之实”的现状使他深感忧虑，若不赶快派人出国留学，质量难以提高，所以认定“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

林绍年把振兴贵州的希望寄托在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上，认为“振兴庶务，全赖人才”。在人才培养上，他认为，“有下学之基础，方有上达之阶梯；有及格之人才，方有循序之进步”，“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他看清形势，抓住机遇，连续上了《选派学生出洋片》《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出洋考察片》《黔省秋冬两季咨送学生出洋片》三奏，最终分三批派151名贵州人出国游历、留学。

贵州财政入不敷出，要送人到国外留学、考察，却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林绍年毕竟是个“有心人”，采取多渠道咨送的办法，或由府州筹款，或由地方人士资助，并鼓励自费留学。林绍年在10个月中送出三批留学生，一任之举，百年受益。一年之后，留学生陆续归来，给贵州带来了新气象，教育勃然而兴。到了清末，全省办起了高等、中等及初等小学堂655所，其中，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讲习所10所，还开办了农林学堂、矿业学堂、法政学堂、陆军小学堂、高等巡警学堂等。留学生是贵州第一代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推动了近代文化、教育、科技、实业的发展，推动了辛亥革命，其

中涌现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

林绍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离开贵州，宣统二年（1910）辞世，谥号“文直”。

### 清末贵州留日概况

清末贵州官员、学子留学日本，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批次有规模地留学日本，出现在林绍年出任贵州巡抚的10个月里。

光绪二十六年（1900），贵阳人杜钟岷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遵义人黎渊由四川公派抵达日本学习。其后四年，先后有高士光、萧协臣、夏同龢等31人或自费或绅商资助留学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贵州巡抚林绍年上任后，先后上《请选派留学生出洋片》等三奏，成功组织选派三批共150余名贵州官员、学子考察、留学日本。

第一批64人，官费生有廖杭、周恭寿、钟昌祚、万勳忠、尹笃生等51人，自费生有刘显治、刘钟俊等13人。其中31人学习速成师范，29人学习专门学科，2人考察学务，另有随宦子弟2人，由廖杭、周恭寿护送。

第二批14人，为考察人员，有知府吴嘉瑞、陈鸿年，通判闵世荣、李绶，知县刘华琼、罗万华、周篆训，教职吴鼐、宋葆昌、季熙照、李立成，教员黄禄贞，另有直隶知州谢祖禹，知州李大森。

第三批73人，有邓光济、吴绪华、傅良弼、张鸿藻等50名官费生，其中8人学习完全师范，37人学习速成师范，5人学习专门学科；有刘崇濮、吴祖信、刘慎铨、周启滨等23名自费生，所学不详。

清末贵州派遣的留日学生，目的是为家乡兴办学堂培养师资，所以这151人中有76人学习师范，他们大部分都是贵阳师范学堂的学生。当时贵州省规定，不论官费自费，留学人员“卒业回黔，照章现在本省各属各尽义务”。因此这些学生归国后，没有忘记贵州的教育，他们在贵州教育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留学政策的实施，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体制的突破。戊戌维新变法以来，开学堂、育人才，不再单纯为“科举”而教育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留学热潮由是而兴，除在日本期间学习师范或其他专门学科外，学习并吸收西方教育理念和新方法也成为他们在留学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一时期的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后都直接投身贵州的新式教育事业，在教育实践中大胆探索，积极开拓，充分利用自己的西学新知，培育新人才，成为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关键力量。他们中间有贵州首任教育厅长兼省立贵州大学校长周恭寿，商务印书馆负责审订全国大学、中学物理教科书的周昌寿，贵州最早的法学家吴绪华，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数学教授周步瑛，开创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的尹笃生，著《普通应用伦理学》（逻辑学）的王延直，贵州农林教育开创者之一的万勳忠，贵州早期经济学家刘显治，彝族诗人余达父，留学归国任贵州实业司长的黄禄贞，以及开办贵州省立医院的邓光济，等等。



周恭寿

周恭寿（1876—1950），字铭久。贵州麻哈州人。严修在《蟬香馆使黔日记》中写道：

“麻哈文童周恭寿叔侄写作俱佳，为全郡所弗及。恭寿气宇轩昂，颇不寒俭。其叔亦魁梧，性近爽直，皆美才也。”因其才俊而入经世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任贵州大学堂教员。三十一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派周恭寿带队赴日本留学、考察，入宏学院，两年后毕业回国，继任教职。次年贵阳设立官立高等小学堂及九所初等小学堂，以周恭寿任总堂长。

宣统元年（1909）当选贵州咨议局副议长，后兼任贵阳官立中学监督，主持出版《贵州教育官报》。辛亥革命后，贵阳官立两等小学堂改名为模范小学，贵阳官立中学堂改名为模范中学，周恭寿任两校校长。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任命周恭寿为贵州教育厅长，将全省划分

为八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省立中学，模范中学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南明中学改为省立第二中学。1928年受命创办省立贵州大学，周恭寿任校长，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科，有学生300余人。周西成死后，省立贵州大学自然撤销。此后，周恭寿不再担任公职，到上海依靠其弟周昌寿为生。

清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原本是期望这些学生学成后，能够成为维系其统治的支柱和中坚力量，孰料这些留学生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者。如贵州留日归来的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之一的吴鼐，为辛亥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贵州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同盟会员于德坤、张锦林、胡肇安、朱雨三、杨荃诚、周仲良、张友栋等，他们与国内的革命志士一道积极推动了贵州辛亥革命的进程。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11年11月6日贵州就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在全国排名第六（前五个省分别是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和云南）。护国起义期间贵州也积极响应，与云南联手出征，史称“滇黔起义”。这些事例都说明留日活动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接受了新思想、新理念的将领和士兵，为贵州政治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绍年在任贵州巡抚期间，在改革贵州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推动贵州近代社会转型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与他的“开启民智”“开启官智”社会治理理念密不可分。在他心中，学习西方实业技术，培养新式人才的有效途径就是留学，“一俟出洋学生回黔，以其学次等兴办”，贵州实业何愁不兴？他认为要打破贵州的封闭状态，把贵州引向世界潮流，必须发展留学生教育，同时，他还认为留学能够开启学生心智，这些留学生学成回来后也可以成为推动贵州发展的主力军。因此，在贵州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推动了留学事务，为贵州培养新式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 五、新式学堂的发展

光绪三十年（1904）初春的某一天，傍晚。

贵州省城贵阳学政署关了衙门，署里的几个人这才从座位上站起，伸了伸懒腰。

除了乡试之年的八月，学政署平常很冷清，这天却格外热闹，从清早卯时开衙后，就一波接着一波地来人，把学政大人和他的四个幕友、四个书办忙得不可开交。贵州是穷省，贵州学政更是清水衙门，所以这位学政大人上任时，没敢向别省的学政看齐，把幕友和书办都减了一半，即使这样，他都还担心养不起。今天他才觉得，人手少了，办起事来真要累死人的。

这天为啥这么忙？朝廷前不久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从京师到地方都要办学堂，不仅官办，还允许私人兴办，这办学堂之风一下子就刮了起来，但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要到学政署来备案。这不，从五天前开始，学政署这一向门可罗雀的冷清衙门，从早到晚，人来人往，有各府、州、县官办学堂的，也有要开办私人学堂的，都是来备案的……

向来习惯了清闲，一下子忙成这样，这几个人还真有点不适应。

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后，经戊戌变法、庚子国变，到辛亥革命（1911）前，十余年间，欧风东渐，新式教育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从京师到各地方，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办，掀起中国古代儒学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的风暴。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法定近代学制系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以改革贵阳学古书院为起点,贵州近代教育转型已悄然起步,后经以林绍年为代表的驻黔官员、贵州各地士绅学子的艰苦努力,新式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贵州通志》统计,自1902年到1910年,贵州出现了683所新式学堂,其中高等小学有108所,初等小学有547所,中学堂有6所,师范学堂有2所,简易师范学堂有3所,师范传习所有5所,实业学堂有3所,高等性质的学堂有6所,此外还出现了具有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

在这期间,贵阳也迎来近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有识之士,如黄禄贞、黄齐生、凌秋鹗、张恣、彭述文、平刚、肖协臣、徐绍彝、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张百麟、白铁肩等,投身教育事业,纷纷创办学堂。乐群、达德、正谊、时敏等男子小学堂率先创办,资善堂、达德、广益、自奋、崇德、光懿、蕴真、培德等女子小学堂陆续出现,贵阳公立师范学堂、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官立中学堂、官立模范小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接踵而立,武备学堂(1901,贵州巡抚邓



张百麟

华熙、贵阳知府严雋熙)、贵州大学堂(1902)、贵州高等学堂(1904)、高等预备科(1905)、简易师范学堂(1906,岑春煊)、贵州法政学堂(1906,贵州巡抚庞鸿书)、高等巡警学堂(1906)、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07,庞鸿书)、贵州公立法政学堂(1909,又名西南政法学堂,钟昌祚)、贵州公立宪群法政学堂(1910,任可澄、华之鸿)等高等学堂相继开办,此外还兴办了一批实业学堂,主要有:官立蚕桑学堂(1905,林绍年)、官立农林学堂(1908,庞鸿书)、官立矿业中学堂(1909,提学使陈骧)等。私人办学之风盛行,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并驾齐驱,是这一时期贵阳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

贵阳清末兴办的小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合并设立的称为两等小学堂。那时的小学堂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类。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官立模范高等小学堂，附设官立初等第一至第九小学堂9所，以周恭寿为总堂长，隶属提学使署，由官府拨款办理。官立模范高等小学堂机构人员设置大致遵照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办理，设堂长、董事、司事各1人。附设的初等小学堂只设教习，但各初等小学堂的教习人数各不一样。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的贵筑官立两等小学堂机构设置大致相同。设置人员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堂长，主持全学堂教育，督率教习、董事及司事进行教务和学堂行政事宜，一般还得兼充正教习。堂长之下设教习、董事和司事。教习，教学生之功课；董事，管理笔墨收支等项事务；司事，登记账目，照料杂务。私立初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办学经费由学堂创办人或共进会、理事会（后称董事会）筹措，机构人员设置同于官立，但人员不足，只得变通办理，除堂长设有专人担任外（多数堂长还得兼正教习），其余董事、司事职务多为堂长或教习分别兼任。私立小学堂也隶属提学使署，省教育会协助政府每年发给补助费，但它比官立小学堂有较多的办学自主权。一般事情堂长做主，重大事情由理事会议决。

下面就三所学堂的兴办情况，对清末贵阳新式学堂的办学情况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 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

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的兴办应属偶然。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与贵州武备学堂相邻，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中旬，两学堂日籍教习共同庆祝日军击败俄军攻占辽阳<sup>①</sup>，强邀师范学堂学生与饮，遭到拒绝后，双方发生冲突，以致师范学堂停课。次年初，李端棻、于德楷等人委托主持学堂事务的学堂帮办乐

<sup>①</sup>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嘉藻张罗学堂复课的事。复课的事尚未办妥，而巡抚林绍年正组织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考试选出的留学生大部分是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在读学生，学生人数骤减，一时无法复课。

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商议后，决定在学堂雪涯洞来仙阁校舍改设“贵阳师范教育讲习会”，乐嘉藻和李裕增任会长，其余先生任会员，讲习师范教育。学堂原定各门课程，分别由两会长讲授，乐嘉藻讲文科各门，李裕增讲理科各门，仍聘高山公通等日籍教习兼些授课任务。乐嘉藻召集学堂所余学生 20 多人，宣布了这个决定，就开始了“贵阳师范教育讲习会”将近一年的教学活动。

乐嘉藻（1867—1944），字彩澄，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京参加会试，参与“公车上书”。二十三年（1897）被选拔为高才生，入经世学堂。二十八年（1902）与李端棻、于德楷创办贵州公立师范学堂，成为贵州最早的师范学堂，在全国领先。宣统元年（1909）当选贵州教育总会会长，被选为贵州咨议局议长，让位于谭西庚。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被推为枢密员、立法院长，辞职北上天津，任天津商品陈列所所长。1915 年美国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北洋政府令天津商品陈列所负责征集全国各地



乐嘉藻

产品，由乐嘉藻护送产品参赛，贵州的茅台酒、玉屏箫笛获奖。乐嘉藻编著的《中国建筑史》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同为中国古建研究的瑰宝。

在“贵阳师范教育讲习会”开办过程中，乐嘉藻与唐尔镛商定，呈请贵州提学使陈骧在雪涯洞来仙阁创办“贵州官立贵阳师范传习所”。在李端棻的帮助下，经巡抚林绍年批准，陈骧同意将“贵阳师范教育讲习会”改设为修业期为 3 个月的“贵州官立贵阳师范传习所”，任唐尔镛为堂长（校长）。后因办



唐尔镛

学地点过窄，修业期太短，唐尔镛、乐嘉藻、任可澄和徐天叙等人呈请继任贵州巡抚庞鸿书同意后，将“贵州官立贵阳师范传习所”由雪涯洞来仙阁迁至贵阳贡院（今贵阳大十字附近），并改名“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将修业期改为半年。该所学员多为私塾教员，采取短期培训形式，讲习师范专业课。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招收各县生员，培养中师教习。曾先后结业两班，为贵州新式教育培养了第一批师资。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学部已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各省须设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一所，后又改为各省应办一所优级师范完全科学堂（相当于大学程度的）。但贵州条件未备，又急需中学教师，故按清廷学部规定，仿照大学专科例，先办一所优级师范选科学堂。

因贵阳贡院办学点环境狭小，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的修业期仍旧太短。光緒三十三年（1907），唐尔镛、乐嘉藻、任可澄和徐天叙等人商议后，决定将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迁往贵山书院（今省府路一带），并改为修业期1年的“贵阳官立师范简易科”。正好赶上贵州决定筹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贵州巡抚庞鸿书决定，将“贵阳官立师范简易科”改办成“贵州官立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委任唐尔镛、华之鸿为学堂正、副监督，聘任任可澄为教务长，聘任杨覃生、陈廷芬、王延直等为教习，并将学堂设在次南门外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原址，即丁文诚公祠、黔军昭忠祠、雪涯洞、来仙阁。将已在此处办学的通省公立中学堂，迁往南明河对岸的新址。

这所脱胎于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几经周折后，回到原址，演变成了“贵州官立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到宣统三年（1911）改为“贵州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5

年又易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

## 贵州官立蚕桑学堂

贵州官立蚕桑学堂是贵州的第一所实业学堂。

实业教育，不属于中国古代教育门类，在今天也是人们不太清楚的一个概念，其实它类似于今天的职业教育，做的就是职业知识、职业技能传授这种专门教育。清朝的实业教育出现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当时兴办实业学堂，就是把实业教育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

贵州身处内地，偏远闭塞，所以一直没有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任贵州巡抚林绍年在考察了贵州的自然条件后，认为贵州适合发展蚕桑产业，就于当年四月上奏朝廷：

黔省贫瘠为天下最，现在生齿日繁，若不为开浚利源，将来不免冻馁。于是农桑之利，自古并重，然科学不明，利益未著，小民不知其失，官府劝诱之有概弗信。今非及时改良，示以的利，众情仍不免阻碍。今宜电至浙省聘定教习，随带蚕种，养蚕丁人，兼购仪器、蚕种，克日来黔，主于种桑养蚕，用中国之老法，参西洋之新理，因黔省之天时地利，互相考证，以期宜于实用。

他这份奏折的大致意思就是：贵州是天下最贫瘠的地方，如今人口日益增多，如果不及早为百姓谋划生计，以后他们就只能在这里受冻挨饿。种地和植桑的好处，自古以来就被重视，但是人们并不清楚蚕桑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以致蚕桑产业的好处并不突出，百姓自然不知道他们因此错失了生财之道，即使官府做了鼓励引导，他们一般都不相信。如今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让百姓看到这种好处，仍然不可能发展这种有利的产业。现在应该致电浙江，在那里聘请教师，并让他们带领会养蚕的人，购买仪器和蚕种，限期前来贵州，专门栽桑养蚕，用中原传统的方法结合西洋的技术，借助贵州的环境，相互验证，

从而找到最合适的蚕桑产业发展之路。

林绍年既是为贵州谋划产业发展，也是为朝廷着想，建议于省城设立蚕桑学堂，所以朝廷很快就核准了他的奏折，同意在贵州兴办蚕桑学堂。得到朝廷批复，他就组织修缮了原经世学堂的校舍，创办了贵州的第一所实业学堂——贵州官立蚕桑学堂。贵州按察使全懋绩出任学堂总理，由总理委派监督、文案、收支、稽查各一员，一切经费由善后局按月支拨，又聘请了浙江蚕桑学堂毕业生担任专职教习，讲授专业课程。与此同时，他下令各府州县选派学生入学学习。贵州官立蚕桑学堂分堂内、堂外两种办学形式，堂内学生正取40名，备取20名，以理论学习为主，开设养蚕、制种、缫丝、栽桑等主要课程，辅助课程则有种植、理化和算学，两年毕业。堂外学生不限定额，有自己的实验场，学习养蚕、缫丝等实际操作技能，学生由各府州县差额选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享受公费待遇，半年毕业。

贵州官立蚕桑学堂为贵州各府厅州县培养了专业技术教学人才。在林绍年的提倡和官立蚕桑学堂的示范下，全省各府州县相继办起了不少蚕桑学堂，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兴义府创办蚕桑讲习班，聘请官立蚕桑学堂毕业生担任专业课教员，教授植桑、养蚕及缫丝等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

1908年5月，贵州巡抚庞鸿书创办贵州官立农林学堂，学堂监督查衡仲，学监丁绍棠。1912年，贵州官立农林学堂改称贵州省立农林学堂，设蚕科、农科、森林科。1913年冬，贵阳蚕桑学堂与农林学堂合并，仍以农林学堂名。1916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甲种农业学校。学校开设农科、林科、蚕科、蚕别科。1927年后停办。校长先后为陈维藩、易尚廉，熊继成、刘勋（代）、龙继平。

除上述三所实业学堂外，清末贵阳还兴办过贵州官立矿业中学堂、蚕桑女学堂、商业简易小学堂、商业讲习所、法政学堂等实业学堂或职业教育机构。辛亥革命后，贵阳的实业学堂仅余农林学堂一所了。

## 光懿女子小学堂

中国封建时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享受文化教育是男性的专利，除了某些特定阶层或特殊家庭，女性基本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在清末传统儒学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的大潮中，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办女学仍持保守态度。但是，女子教育已成为新式教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与发展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仅在贵阳，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齐生在达德学堂加办女子小学堂后，就先后创办了资善堂女子初等小学堂、广益女学堂、自奋女子学堂。次年，达德女子两等小学堂创办后，贵阳近代教育史上首位女教师董赵德莹就站上了讲台，广益女学堂的监督和教员也都是女性。

女子学堂不断出现，女子教育蓬勃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的补充版——《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学堂分初高两等，学制各四年，所有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每州县必须设立女子师范一所，初办可由官府筹设，允许民办，学制四年。接着，女子职业教育也获批准，并在全国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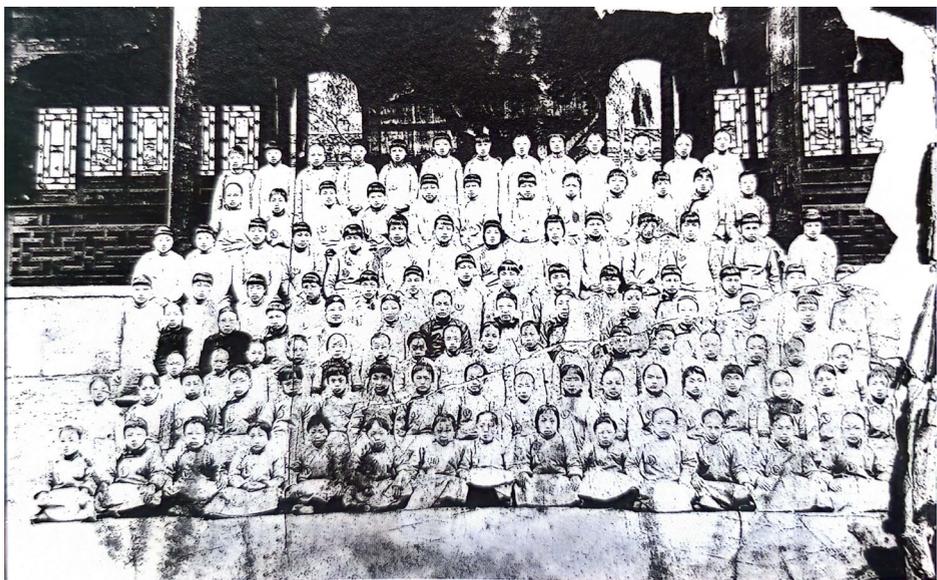
清末贵阳有一所“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在一众女子学堂中最为出名。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创办者叫白铁肩。铁肩，让人自然想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来，自然会以为白铁肩是个刚健的男子。想起这句话是对的，这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想成一个刚健男子，就错了，这是个柔弱女子。白铁肩，是一个本名叫罗光懿的女子，一个在父亲的私塾里启蒙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的女子，



白铁肩

一个在成长过程中还读过《列女传》等诸多典籍的女子，一个一生倾慕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子。她十九岁与父亲的弟子贵阳举人白静庵成婚，遂随夫姓，取名“铁肩”。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白铁肩在老东门倪家巷住宅开办私塾，起初只是想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在这兴学堂、启民智的浪潮中，她却看到了女孩子无学上、无书读的境况，让她对这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激活了她的“铁肩担道义”情怀，“创办学堂，让女子上学读书”就成了她内心最强烈的呐喊，她把让女子读书、用知识帮助女子自立作为自己最真实的铁肩道义。她与谭佛侠、黄烈诚等女友商议后，没有创办经费，她们不惜变卖嫁妆、首饰。经过一年多的筹措，她们以白铁肩原有私塾为基础，租用双槐树（今南明区护国路）民房创办“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白铁肩自任堂长。学堂以白铁肩的闺名“光懿”命名，旨在彰显她们的办学目的。光绪



贵州自治学社骨干白铁肩创办的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学生合影

三十四年（1908）春天，学堂正式开学，开设了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史地和修身、习字、手工等课程。首届学生 50 多人，分为预科、一年级和复式班等 3 个班就读。

光懿女学开学不久，就发生了学堂创始人之一的谭佛侠女士突然“病故”的大事。谭佛侠正值盛年，建校伊始，全力以赴，不辞劳苦，精力尤盛，怎会突然辞世？白铁肩急奔谭家吊唁，才知谭佛侠“病故”的隐情。原来谭佛侠参与创办学堂等社会活动，均是瞒着封建家庭中思想观念极为保守的翁姑的。时间一长，翁姑渐有所闻，不仅严厉痛斥，横加阻拦，甚至将她软禁家中，严禁外出。谭佛侠多次婉言解释，却被翁姑视作违抗尊长，大逆不道。万般无奈下，谭佛侠决心以死抗争，就悬梁自尽了。白铁肩知道详情后，悲痛万分，更加痛恨封建礼教的罪恶，她在学堂为谭佛侠举行规模宏大的追悼会，除学堂全部师生外，还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悼念。白铁肩悲愤陈词：谭佛侠女士是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争取妇女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与家庭封建礼教抗争而死。所以，光懿女学必须坚持，妇女与男子永远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必须挣脱家庭封建礼教的束缚，立足社会，做一个能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自由国民。

这次追悼会在贵阳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唤醒女性自立自强意识、追求平等自由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白铁肩是妇女教育的先驱，她不仅说了，也坚持做了。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在白铁肩和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

宣统二年（1910），学堂学生增至 200 余人，遂迁至六座碑晋禄寺（今民生路）继续办学。1915 年增办师范讲习班，开设国语、数学、书法、教育、管理等课程，为社会培养新学师资。后有省立贵阳师范学校为社会培养师资，光懿学校才于 1921 年停办师范讲习班。1924 年办初中班，次年停办。1927 年白铁肩卸任，杨竹芬继任校长。后因多种原因，光懿学校停办。

1936 年，白铁肩病逝家中，享年六十五岁。

## 链接

### 1. 贵阳三条状元街

明清传统儒学教育在贵阳是以科举文化盛况收官的。

说到科举文化，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首先要问的是：某某省出过状元吗？如果没有，就会问：出过榜眼，出过探花吗？如果都没有，才会问到有名的进士，有名的举人。而贵州，这片“万古蛮荒”的高原，这个科举文化起步最晚的省，在明清科举时代，不仅是后起之秀，而且取得了“三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除这名探花出在遵义府之外，三位状元都出在省城贵阳府，给今天的贵阳留下了三条状元街。

南明河畔曹状元街



曹状元街街景  
(2024年摄)

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年二月。

京城外丰台大营大校场。

康熙癸未科会试。

第一天，举行武科会试第一场：马射。

第十一个上场的武举是个约莫20岁的后生，主考发令后，后生高声答着“曹维城得令”，然后快步后退，退到牵马士兵的身边，接过缰绳，一踩马镫，翻身上马，干净利落。鼓声响起，鞭子一扬，马已在驰道上疾奔。只见他左手拿弓，右手掣箭，张弓搭箭，引弓如月，扭身之间，嗖的一声，一支狼牙箭应声飞向三十五步<sup>①</sup>远的毡靶，接着，又是嗖嗖两声，鼓声未息，他已完成了一驰。接着，同样快速地完成了二驰、三驰。

三通鼓毕，三驰结束，报靶声传遍校场：曹维城，四中！

所有武举考完马射，曹维城四中，名列第一。

第二天，第三天，举行武科会试第二场：技勇。

技勇包括步射、舞刀、挽弓和掇石等四个小项，所以分两天进行。

……

会试结束，曹维城综合排名第五，成了一名武贡生，取得了殿试的资格。

文贡、武贡同一天举行了殿试，都完成一篇“策论”。

三月初一，朝廷发了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的文、武榜。曹维城，武榜第一名，贵州科举史上产生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武状元。

贵阳人，知道“曹状元街”的人可能不少，而知道曹状元名字的，恐怕不会多，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他是位武状元。

科举时代，既有文举，也有武举。隋唐以来，虽然历朝历代文、武都按规

<sup>①</sup> 步，古代表示距离的长度单位。古人把一只脚移动一次叫“跬”，计作“半步”；两只脚各移动一次才叫“步”，如果以今天的所谓标准步幅0.75米来计算，古人说的“一步”就是1.5米，“三十五步”，应该是52米左右。成语“百步穿杨”中的“百步”，应该是150米左右。

矩开科取士，但武科举时兴时废，而且武举人才往往不被重用，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由武举而出将入相的人物仅有唐朝的郭子仪一人而已。而且中国历朝历代大抵上是重文轻武的，特别是北宋赵匡胤以武将（太尉）身份夺得后周天下后，他尤其害怕武将效仿他的行为。重文抑武就成了稳固皇权的基本国策，在此影响下，重文轻武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所以，学文之人考取进士夺得状元，是“大魁天下”，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习武之人考取武进士夺得武状元，大抵都是默无声息，天下不知了。

人们都以为考取文进士很难，其实，考取武进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会试了“武场”，还要殿试“文场”。武科跟文科在“策论”上的差别就是，武科用历代军事理论来答题，文科用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对经典著作的注释来答题。

《大清会典》对武科举的会试有记载：

首日马射。树的各距三十五步，纵马三次，发九矢，中三矢者为合格。二三日技勇。步射，五十步，发三矢，中二矢者为合格。舞刀，必前后胸舞花，刀尖不拂地，为合格；刀重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挽弓，挽弓三，每挽必满，为合格；弓分八力<sup>①</sup>、十力、十二力。掇石，去地，过膝，上胸，为合格；石重三百斤。

武举会试，就是考核这些未来武将的冲锋陷阵能力。冷兵器时代，箭和刀是主要武器，武将首先要能上阵杀敌，这就必须具有高超的武艺和搏杀的勇气，所以要考查武将的技能、体能和勇气。马射和步射考查的是远距离击杀技能，包括运动射击和固定位射击；舞刀考查的是近身搏杀技能；挽弓和掇石考查的是体能。完成这些项目都需要力量和勇气，所以武科的会试是对未来武将的冲

<sup>①</sup> 力，指弓的强度，也就是开弓需要的力量。“一力”等于十斤，如果古人的“斤”与今天的“斤”等值，“一力”就是5千克。

锋陷阵能力的综合考核。

会试合格了，成了武贡生，就取得了殿试资格。

但武举人要考上武进士，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朝廷举行武科举考试。清王朝入主中原，连年征战近半个世纪，扑灭残明和中原抵抗势力，平定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击灭噶尔丹的准噶尔蒙古分裂势力，收复台湾……多年未开科武举，因此康熙四十二年的这场武举“盛筵”就显得颇具深意了。这次武科进士大考，不仅标志清王朝走向安定，经济趋于繁荣，而且是炫耀武力、选拔人才的绝好机会。曹维城赶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并且凭能力拿到了这个武状元。



曹状元街（2024年摄）



曹维城

曹维城（1683—？），字价人，贵州贵阳府人氏，家往常平仓（今曹状元街），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贵州乡试考中武举人。次年20岁的曹维城考取状元后，被任命为御前带刀侍卫，后来升任云南副将。按传统的说法，曹家是“行伍”人家，就是世代从军当兵的人家。其实，如果把曹维城的父亲曹元肃、曹维城和曹维城的儿子曹石排成一列：

曹元肃，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武进士，从二品副将。

曹维城，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武状元，从二品副将。

曹石，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武进士，从二品副将。

如此看来，曹家不仅是行伍人家，更是“武举世家”。

只是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就已是太平盛世，武状元也难免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不到四十岁，他就辞官返乡，一直住在常平仓。他的兴趣也转到诗文方面，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吴中蕃、周渔璜、朱文、潘德征等人都有交情，这些人经常出入曹状元府宅，共同谈诗论画，文酒相娱。朱文写有一首赠给曹维城的诗：

我爱曹公子，风流多蕴藉。二十夺魁头，三十称诗伯。  
长剑倚青天，高门列画戟。叱咤生风云，六诏流惠泽。  
富贵不骄人，功名垂竹帛。玩世余青眼，襟怀原自白。  
广交天下士，美酒能招客。好景不独赏，良辰各须惜。

曹维城虽是武状元出身，做到二品副将，但没有武夫骄横跋扈的作风，更没有豪门显宦的傲气。他性情豁达豪迈，俊雅斯文，待人谦和有礼，真诚好客，赢得了社会赞誉。遗憾的是，曹维城的诗、文、画作品大都散佚了。

据说，整个清代贵州一共产生过 25 个武进士，除了曹家祖孙三代，其他人还真难找到相关记载。

### 青岩古镇赵状元街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发榜那天，已在京中任职监察御史的贵阳人李端棻，兴冲冲地出了家门，他想去看看这一科贵阳府中进士的情况。

等他挤进看榜的人群，举头看那黄榜，看到第一列文字，他忙掏出汗巾子揩了一回眼睛，再看第二遍，终于看清了，也终于相信了自己的眼睛：

一甲一名 赵以炯 贵州贵阳府人氏

他听见旁边的人在议论，尽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有个贵州贵阳府？

贵州贵阳府是江南哪个省的？

状元不都是江南人？这个贵州贵阳府究竟是江南哪个省的呢？

……

有人说：晓得云南、贵州不？贵阳府是贵州的省城呢！

于是那人遭到了质问：那个万古蛮荒会出状元？

又一人说：那是老皇历啰！这一科，贵阳府不只出了状元，还有十个进士呢！有一个还是这赵状元的兄弟呢！

……

李端棻轻轻一笑，顺着黄榜看了一遍，数了一遍，就急忙回家了。回到家，一进门，就直奔书房，在书桌上铺开宣纸，笔走龙蛇，写下一副对联来：

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写完停笔，反复欣赏一回，还自言自语道：看来这刘伯温还真是神人啊！  
等墨干了，李端棻就卷了对联，带着贺仪，出门给赵家兄弟道贺去了……

当时早有电报了，丙戌科皇榜一出，大清八大总督衙门和各省的巡抚衙门，也就半天，全收到了消息。夺得榜眼、探花的省份，总督、巡抚都面有喜气，其余的只是看了看本省进士登第人数，也就撂在一边不管了，反正接下来的事都由学政去办。在这些督抚中，最兴高采烈的莫过于云贵总督岑毓英和贵州巡抚潘蔚。

潘蔚忙不迭地给顶头上司岑毓英发去电报道喜，虽然他知道岑毓英已经得到消息，这对他来说也是应有之仪。岑毓英当然也给潘蔚回了一封道贺电报，说这是云贵二省破天荒的大事，是天大之喜，须在昆明和贵阳张灯结彩共同庆贺。

于是，云贵两省都在省城组织庆贺。

岑、潘二督抚说“破天荒”“天大之喜”，也确实不是虚言。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已经实行快一千三百年了，这云贵二省参与科举也差不多五百年了，但从来都是看中原、江南的才子夺走“三鼎甲”，从来都没有云贵什么事。没想到，这贵州科甲起步最晚，只用了三百多年，竟然就出了个文状元，破了这“云贵无状元”的天荒，能说不是“天大之喜”？

除云贵官场大肆庆贺之外，贵州学子、士绅和贵州籍的官场人物都争相庆贺，那种情形，如同这状元是他们自己考中的一样。三年后，时任大清驻日本公使的贵州名贤黎庶昌，还写了一篇《赠赵殿撰序》，其中写道：

自顺治甲申迄于今上，凡二百四十五年，举状元者九十八人，不为不多。东南大省，县至数人；而西南边徼之地，至乃合数行省，旷数百岁而

不得一与，又何其难也！光绪丙戌科，吾黔贵阳赵君仲莹实始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中外尤以为异。士在黔闻者，相与引觞称庆，有若荣宠之被其身……夫黔，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气郁积蓄久，而于仲莹发之。

由此可见，赵以炯大魁天下，在西南高原上产生了多大的轰动。

对赵以炯兄弟而言，拿下科举功名，不是难事，但中一个状元，却是意外之喜。

赵以炯中了状元，贵阳也就有了第二条状元街。这条赵状元街，是贵阳的三条状元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条。

赵家住在贵阳城南六十里的青岩堡。



青岩堡（2010年摄）

青岩堡是贵阳城南的门户，是明代贵阳向南去广西的驿道的必经之地，在洪武年间，贵州卫就在这个地方设屯驻军，到天启年间又夯筑土城，再后来又 将土城墙改建成了石墙，成了一座有四道城门的小城，城中有四条大街和若干小巷。赵家住的那条街巷原先可能叫上院街，因为与它相连的另一段叫下院街，只是街上出了赵状元，而且赵家成了状元府，所以那段街现在叫作状元街，赵家是 1 号门牌。

据说，赵家第一代人是康熙年间为避战乱迁入青岩堡的，是个经商人家，后来发了家，就逐渐演变成了商读人家，到赵以炯的高祖辈，就开始走科举仕途了。



赵状元街（2024 年摄）

在青岩古镇诸多古建筑中，除了赵状元府，尤为有名的是赵公专祠。赵公专祠的主人赵国澍，就是赵以炯的父亲。赵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已是世宦书香人家，但赵国澍生逢乱世，同治年间，虽然身为书生，但他却因保境、安民、剿匪有功，以文职管理武事，总管贵州团练事务，在他三十七岁时，因征剿灯花教何得胜部，阵亡于徐家堰（今贵阳乌当区徐家堰）。朝廷追封他为太常寺卿，赏骑都尉，准世袭，并降旨建了赵公专祠。

赵国澍与其妻陈氏（赵三太）共生育了六个儿女，四男二女，分别取名以兰、以焕、以炯、以燿、以炳、以冷。赵以炯就是赵国澍的二儿子。

赵以炯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1857），字仲莹，又字鹤林。他跟父亲赵国澍相处的时间不多。赵国澍忙于办团练，常日里都以保境、安民、剿匪为务，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养育儿女，他阵亡那年，赵以炯才六岁，还寄养在外祖父陈振家里。

赵以炯的母亲赵三太陈氏，也出身书香人家。陈家住在南明河甲秀楼旁，那一带是贵阳宿儒名贤聚居地，她父亲陈振，她的三个兄弟，虽然功名不显，但也是学人名士。出身这样的家庭，赵三太陈氏知书识礼，也为人要强，赵国澍阵亡后，她一人承担了养育六个儿女的重任。

她将六岁的赵以炯接回家里，亲自养育。赵以炯七岁时，跟弟弟赵以炳一同发蒙就学。赵家和陈家都是书香人家，这样的生活环境，使赵以炯兄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他们兄弟又都聪明好学，单就学业而言，完全没有什么难度。兄弟俩先后师从过吴竹堂、顾伯芑、高扬华等先生，到光绪二年（1876），又一同入贵阳贵山书院，师从前任贵州学政韦伯谦，并受到黄芷衡的熏陶。三年后，光绪五年（1879）贵州乡试，赵以炯、赵以炳同科中举，赵以炯是第十名，赵以炳考进前五名，夺得“经魁”。中举后，他们仍在贵山书院师从黄芷衡、莫芷升（庭芝）等先生。直到三弟赵以燿乡试中举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赵以炯和赵以燿进京参加会试、殿试，兄弟同举进士，赵以炯夺得“大魁天下”的状元，赵以燿则获三甲第十名进士。又过了三年，他



赵以炯状元故居（2024年摄）

们的大哥赵以煥在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考中进士。

光绪五年到十五年（1879—1889年）的十年间，赵家兄弟四人创造了贵州科举史上“一门二进士一状元一经魁”的佳话，他们的母亲赵三太陈氏也以“教子有方”名闻贵阳。

所以说，赵以炯兄弟，拿下科举功名，不是难事。

赵以炯状元夺魁，看似意外，也不意外。他性格坚韧，勤学苦读，学识超人。赵以炯孩童时作过一首《咏刺梨》：

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

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

这四句诗，出自还是孩童的赵以炯之手，其过人才华，其远大志向，已现于笔端了。

光绪八年（1882），赵以炯入京应试壬午科落第后返乡苦读，某日在家中楼上自吟一诗：

一上上到赵家楼，目击江翰气横秋。  
眼前若无三山堵，看破江南十二州。

虽遭遇挫折，却依然豪气不减。抱负远大，性格坚韧，夺魁状元也就不意外了。

《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收录了许多状元的策论，并有很中肯的评价，其中是这样评价赵以炯的“对策”的：

今读赵状元对策，其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之处的确不亚于别的状元策。

赵以炯以厚实功底为贵州争得了荣誉，用才智和博学改变了士林中长期存在的“黔地无人”这种看法。

赵以炯中状元后，授职为翰林院修撰。光绪十四年（1888）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提督广西学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回京出任礼部会试顺天同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赵以炯回籍丁忧，在学古书



赵以炯

院做主讲。丁忧期满入京复职，后因感仕途艰难而辞官返乡在青岩讲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赵以炯病故，终年四十九岁，葬于青岩镇南约三公里的摆早村岔河寨状元坡。

世传这位赵状元并没有多少成就，其实他是“戊戌变法”的幕后人物之一。赵以炯虽然是传统儒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科举状元，但他并不守旧。“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广西讲学为变法造势的时候，正值赵以炯出任广西学政。如果赵以炯是个守旧人物，康有为在广西不要说讲学，恐怕连个立锥之地都不会有。后来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签名的举人，广西有99人，位列第一；贵州有95人，仅次于广西。如果赵以炯不是暗中支持，而是出面阻挠，广西要拿这个“第一”也是困难的。赵以炯与“戊戌变法”领袖人物李端棻是同乡，也是忘年之交，李端棻的变法主张，赵以炯都是支持的，只是李在台前，赵在幕后。赵以炯出身于贵山书院，是贵阳文化教育发展的受益者。正是如此，他也积极反哺家乡的文化教育，回籍丁忧期间他主讲学古书院，辞官之后又在青岩讲学，直到去世。由此可见，他对贵阳文化教育是有积极贡献的。

赵以炯登上“云贵第一状元”的宝座，破了西南无状元的“天荒”，这也是明清两代贵州儒学教育蓬勃发展的结果。从明初到清末，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还有许多事的促进，贵州才有了“万马如龙出贵州”的科举盛况，才把刘基那句“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 贵阳城北夏状元街

对这一科进京会试、殿试的举人来说，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因为他们谁也没想到，光绪皇帝会在今天，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毅然决然地发布了《定国是诏》，向天下人宣布大清朝从今天起变法了。变法，就是要改变祖宗成法，实施新政。他们都记得，两年前刑部侍郎李端棻就上了《请推广学校折》，喊出了“变科举，兴学堂”，但朝廷一直没有动静，所以今年他们还是照常进京参加了会试、殿试。可到现在殿试后的进士榜还没发，这节骨眼上，皇上却变

发了，会不会就在这科举上动手呢？进士榜还发不发呢？

夏同龢躺在客栈的小木床上，也在想这两个问题，不过，他还在想自己的那篇策论。皇上给的策论题目是“求才、经武、绥远、理财”，他完全是用儒家经典来写这篇策论的，当时还觉得文思缜密，有理有据，行文流畅，可现在，怎么想都觉得太保守了。皇上要变法，他却长篇大论地论述恪守祖宗成法……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一科是没希望了：唉，怕是三甲都进不去了！



夏同龢

叹了一口气，他大瞪着双眼，看着黑漆漆的空间，问自己道：等下一科？还会有下一科吗？

他想着想着，又安慰自己道：才十二出头，换条路，我也走得出去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年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帷幕。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戊戌科进士榜照旧发了。这一科荣登榜首的状元郎，是24岁的夏同龢，他是时隔12年后贵州出的第二个状元。

夏同龢（1874—1925），字用清，清朝麻哈州（今贵州麻江县）高枳村人。因为夏同龢幼年、乡试备考和会试备考时都住在贵阳城北的夏家老宅中，所以，夏同龢也被称作“贵阳的第二个文状元”。

麻哈高枳堡夏氏，是明朝洪武年间由江苏南京随戍边大军来到贵州的，属于世袭军职人家，清朝中叶才发展成书香世宦人家。不过，高枳堡夏氏科举功名一直都不显眼，没人中过进士。夏同龢是夏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而且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的状元，立即就天下扬名了。

殿试时，光绪皇帝给出的策论题目是“求才、经武、绥远、理财”，而夏同龢那篇两千余字的策论，是完全依据儒家经典来做的，相当保守，但行文逻辑缜密，而且提出“法则治”的理念，稳健、慎重地指出要使国家振兴，最重要的是因时制宜制定出有效的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如不能贯彻执行，变法只能是一纸空文。所以，光绪皇帝还是“御笔钦点”了夏同龢的状元。时年24岁的夏同龢，获赐状元鼎帽、披翎、朝带等物，入翰林院，授职修撰。世间也传，夏状元与光绪帝师翁同龢同名，光绪皇帝才点了他做状元。所以说，对饱学之士而言，考进士取功名不难，当状元却难免偶然。因为南宋文天祥，明朝第一个状元吴伯宗，清朝末代科举状元刘春霖，都有过类似的传言。

不过，夏同龢不是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而是一个放眼世界的状元郎，是个敢于舍弃四品官职自费留学的状元郎。在翰林院任职的六年里，夏同龢逐渐认识到了传统儒家思想在现实中的乏力，无助于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于光绪三十年（1904）春上奏朝廷，申请自费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获准后，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他能顺应时代潮流，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申请留学，足见其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夏同龢的留学，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近代理念的主动接受，是士绅阶层实现近代化整体转变的开始，也预示着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即将走到终点。继他之后，骆成骧和刘春霖这两位状元也留学日本。

夏同龢留学期间，形成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力自强”的思想，并将自己的事业定位为广兴法政学堂，使普通民众都能拥有法律知识，使所有的民众都能依法办事，以此谋求国家的富强。为实现法政救国理想，夏同龢编写出版了《行政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书籍。夏同龢回国后，创办广东官立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并出任监督（校长），同时还曾兼任两广师范学堂监督，并兼任广东地方自治讲习所所长，努力普及法政教育，以教育家的责任感担当起了推动广东民众思想近代化的使命。

夏同龢是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

生，从专制帝制到走向共和，他始终积极入仕，与时俱进，完成了一次次蜕变、一次次转身。透过夏同龢的一生，我们可以明白个人应该如何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化教育思潮正在涌动，最终形成了滔天的时代洪流，以大无畏的精神，破旧立新，引领着中华文化教育走进一个新的时代。

夏同龢自高中状元后，仅在 1912 年回贵阳喷水池附近的夏家老宅住过一小段时间，而后就在全国各地奔走，总想为国家做点什么。但在民国初期那种动荡的时局中，一切都难如所愿。1920 年定居北京劈柴胡同后，除参加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外，就很少在政治场合中露面了。1925 年，因心脏病在北京住所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安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贵阳城北



夏状元街街景（2023 年摄）

那座也被人们称作“状元府”的夏家老宅，就再也没人照料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它就由“状元府”变成了普通民居，再后来被拆除了。今天的“夏状元街”也就只是贵阳的一个文化地标，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与夏状元相关的遗迹了。

## 2. 万马如龙出贵州

清代四川诗人赵熙有一首《南望》，这样写道：

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  
君看缥缈碁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

这首诗本来描述的是川黔之间的交往，套用过来形容明清时期贵州的科举文化盛况，也颇为恰当。综合多版《贵州通志》和贵州各地的方志信息，在明清两代，贵州在科场上表现大为可观，一共产生过 6000 多名举人和 700 多名进士，而且主要集中在清朝。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历史里，产生了差不多 5000 名举人、600 名进士（不包含武举人和武进士），真是“万马如龙出贵州”啊！这些举人、进士分布在贵州行省全域，包括 12 府、1 直隶州和 2 直隶厅。

贵阳，也是在清朝才迎来了科举的“井喷”时代。“点上出彩，面上丰收”，用来形容清代贵阳府的科举成果，并不为过。在“点”上，有曹维城、赵以炯、夏同龢文武三状元；在“面”上，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贵阳府考取了 1190 名举人，262 名进士（见附表 2-1、2-2）。

这一时期，贵阳还形成一些有名的科举文化家族，留下了不少科举美谈。如何梦熊家族的“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花杰家族的“父子三进士”，李端棻家族的“一门四进士”，赵以炯家族的“一状元二进士一经魁”……

在清代贵阳府的举人、进士中，还有不少出名的政治、学术人物，这里略举一二。



桐莖书屋（2024年摄）



周起渭

康熙二十六年（1687）贵州乡试解元、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进士周起渭（1665—1714），清初官员，著名学者、诗人、《康熙字典》第三纂修官，还参编过康熙《贵州通志》。周起渭，字渔璜，号桐莖，青岩骑龙村人，后人称“骑龙才子周渔璜”。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二十七年（1847）进士黄彭年（1824—1890），清朝官吏、学者、藏书家。黄彭年著述颇丰，纂修的《畿辅通志》300卷，是一流的地方志；还著有《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等，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擅长诗文，著有《陶楼诗文集》和《紫泥日记》等。《清史稿》中有《黄彭年传》，获评如下：

彭年廉明刚毅，博学多通。所至，以陶成士类为国储才为己任。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

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姚华（1879—1930），字重光，号茫父，

世称“弗堂先生”。光绪十七年（1891）入经世学堂，三十年（1904）赐进士出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不久被送往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从此定居北京。曾在中华大学、国民大学、朝阳大学执教。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5年创办京华美术学校，开创中国美术教育。姚氏本于经史，旁通诸子百家，尤精音韵训诂、金石文字，对词曲有精深研究，著有《书适》《曲海一勺》《蓑猗室曲话》《说戏剧》等书，集为《弗堂类稿》一书。他对于京剧改革多有灼见，著名京剧演员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对他推崇备至。在近百年国画中，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堪称大家。姚氏论画“意在笔先，胸无古人，目无今人，不囿一格”，山水画山外浮山，水外绕水，墨点如蹄痕化鼓声；画笈尤为精湛，寥寥数笔，潇洒不俗；琉璃厂的铜刻，有赖于画家姚茫父、陈师曾，经他们题画，倍加名贵；颖拓是姚华的一大绝技，摩挲碑版、古籍，别出心裁、妙趣横生，实为艺园盛开的一朵奇葩。书法得力于古文、金石，篆、隶、楷、草皆有研究，尤精小楷。姚华的诗名扬海内三十余年，“向学者莫不知有弗堂先生”，姚华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改写成五言韵文，传达了泰戈尔“那时的一点极微妙但极真实的灵机”。姚华以诗、书、画闻名于世，“名声冠绝燕京”。鲁迅论北京笈谱时写道：

北京画坛民国四、五年进入陈师曾、姚茫父时代，又与陈师曾、张樾丞被后世收藏界誉为“近代铜刻三大家”。

姚华传世画作有《观瀑图》《重九登高图》扇面，还有《中国图谱源流考》《题画一得三笔》等著作。

……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当赵以炯以传统儒学登顶科举文化之峰的时候，当夏同龢告别传统儒学和科举文化的时候，贵阳也告别了传统儒学和科举文化，蜕变成了中国文化教育

近代化的引领者。

### 3. 贵山书院三先生

#### 经世致用的全才先生——陈法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又字圣泉，晚号定斋，学者称“定斋先生”，贵州安平县（今平坝区）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法以乡试第二名考中举人，同年秋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做庶吉士，继续深造，时年22岁。陈法先在京城任职，先后担任过顺天乡试同考官、京师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等职务，后出任直隶顺天府知府。雍正十一年（1733），因撤毁佛寺道观来改建义学的事，四十二岁的陈法称病辞官回到贵州。乾隆元年（1736），又被朝廷起用，担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后来被提拔为道员，负责治理黄河、淮河的水患。乾隆十一年（1746），黄河决口，河道总督白钟山遭到弹劾，陈法上疏朝廷替白钟山辩白，结果他自己也被流放充军，当时他五十五岁。乾隆十四年（1749），陈法奉旨返回京城后，大学士陈弘谋还向朝廷举荐了他，但陈法已无意官场，决意返回贵州，在家乡做教育。乾隆十七年（1752），陈法受聘出任贵山书院山长，主讲贵山书院近二十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陈法在家里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陈法作为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水利、诗文、教育等诸多方面。著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犹存集》《敬和堂文集》《内心斋诗稿》《河干问答》等书。他还善书画，其书法造诣尤高。现贵州省博物馆存有他的手迹《临圣教序》和《塞外记程稿》。

陈法是贵州唯一有学术著作入选《四库全书》的人。《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套丛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计三万六千多册、七万九千余卷，总字数近八亿。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华

裝錄其每爻皆本卦名而言語勢然也程子以為惠 雖非常之事是矣如水火凶荒之事此下之望益于 上而上宜益下之時也三處下卦之上在上卦之下 當求上以益下者也程子以為守令雖當時未有其 官然其位似之矣夫當凶事而益于下必有愛民之 誠心視閭閻之疾苦若痲痺之在身然後能周悉民 隨行之懇惻而有條理所謂有孚也今拯災救患上 有恤民之意而奉行者不善草率苟簡罔上病民皆	欽定四庫全書 易 易 易	无愛民之誠意故也既有其誠矣又當酌乎損益之 宜酌盈濟虛寡多益寡適得均平而无偏枯之病則 患澤普矣又或有所瞻顧而民隱于上聞此尤罪 之大者故曰告公所以通達民隱也夫其所以不告 者慮上之不從而反獲罪也不知未有至誠而不動 者苟其反覆委曲達其誠意為民請命上之人未有 不聽從者也故曰用圭圭者所執以通信也聖人于 此一爻于凶事用益之道委曲詳盡如此直盡乎禮
--	-----------------------	---

陈法《易笺》是贵州唯一入选  
《四库全书》的个人著作

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涉及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问领域，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藪”的美誉，被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朝廷下令各地进献图书。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无书可献。但他没想到，山东巡抚进献了陈法所著《易笺》八卷，因学术水平高，被《四库全书》编辑者评价为“其辨最为明晰”，成为贵州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个人著作。

《易笺》是陈法在流放时写作、主持贵山书院时定稿的，因用作书院教材而得以远近传播。陈法把自己研究易学的成果教授学子，其目的正如其在《易笺·自序》中所说：“《易》之为教，虽曰精微，然道不外乎人伦日用。《易》所言者人事耳。术数之家，支离破碎，非圣人之本意。故其言简严，又因象数难明，

诸家因文解义，未能犁然有当于人心，余之病此久矣！”他认为《易》是用来指导人的社会活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大旨以为《易》专言人事，故象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这是对周易的一种新解读，代表明清时期贵州易学的最高水平。

陈法是著名的水利学家。他并不是普通的儒家学者，只会在四书五经中琢磨辞章，他非常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任山东运河道、江南庐凤道、淮扬海道时，与黄河、淮河、运河打交道，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以亲身体会著成《河干问答》一书。《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此书先论南徙与二渎交流之害；次论河不能分与分黄导淮之难，并论河决之由，补偏救弊不易；继而论河道变通其利二十二、运道变通其说三；复论漕运调剂之宜；终之以辨惑论。其载记由汉至清各类河论，精华荟萃，渊博详明，诚为可取。”《水利百科》高度评价《河干问答》，说其是清代治河中非主流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对黄河夺淮之害有深刻论述，并提出了黄淮分流、黄河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等主张；反对潘季驯、靳辅等人的‘黄淮合流’‘筑堤束水’和‘蓄清刷黄’说，并首先提出‘沙见清水而沉’的论点，对黄河高浓度含沙水流特性有独创性认识”。他提出的改漕运为海运的建议，到光绪年间也得到实施。乾隆十一年（1746），他被发配到边疆戍守军台，条件极为艰苦，他却处之泰然。军台土屋落成后，他赋诗“客至休嫌屋打头，拮据厦屋等绸缪。材从雪窖枯余得，土是龙堆劫后留”。见当地无水井，“民取水于百数十里外”，陈法亲自踏勘，“指地凿井，得泉甚甘，远近赖之”，百姓取名“陈公井”。

在陈法的主持下，贵山书院人才辈出。同时，陈法还非常注重家风的培养，在他的影响之下，安平陈氏家族出现了“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的盛况，成为贵州清代著名的文化世家之一。在他去世的时候，大学士陈宏谋作挽联一副：“四海即今称长者，千秋原自有真儒。”又作《祭圣泉先生文》曰：“先生之学，浑金璞玉；先生之学，布帛菽粟；所重者在志行之异于恒蹊，而不在少年科第。”为纪念陈法对贵山书院的重大贡献，陈法弟子将陈法与王阳明合

祀于贵山书院，并组织“陈公会”，每年八月二十四日——陈法的生日——都在贵山书院举办大型祭祀和纪念活动，以缅怀先师功德，数十年不断。

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联合贵州巡抚高溥、布政使祁真、按察使何金、学政许乃普、安顺知府庆林、安平知县刘祖宪等一同上疏，请求将陈法入祀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旁的贵州乡贤祠，即“尹道真祠”，陈法与王阳明继续受到贵州学人的崇拜和敬仰，直到民国才终止祭祀。

#### 来自福建的理学先生——张甄陶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号惕庵，福建福清人，桐城派大师方苞的学生。乾隆十年（1745）庚午科，张甄陶考中进士，排二甲第十五名，被选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继续深造，学习期满被授予编修<sup>①</sup>之职。乾隆十五年（1750）代理广东香山县知县。他勤政爱民，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乾隆十六年（1751）任鹤山知县，并代理新会县知县，还在陶鲁故宅创建冈州书院。十八年（1753）任高要知县。十九年（1754）任揭阳知县，建“升平人瑞”百岁坊。不久，张甄陶母亲去世，他从揭阳徒步送母亲灵柩返回福建福清，当时人们称他是“仁人孝子”。守孝期满后，被朝廷起用担任云南昆明知县。后因得罪上司，被上司找个借口革了职。于是他就主持云南五华书院，日常认真教学，课余读书写作。

张甄陶主讲五华书院五年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刘藻从云南调任贵州巡抚，“因贵州文风稍逊”，二十九年（1764）擢云贵总督后向乾隆上书：“滇省五华书院山长张甄陶，自主讲席以来，迄今五载，实能尽心训迪，著有成效，请令为贵山书院山长。”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贵州巡抚方世俊派人去云南接张甄陶到贵阳后，却接到谕旨说张甄陶丁艰<sup>②</sup>虽将服阙<sup>③</sup>，不宜延聘。因

① 编修，古代官职，任职翰林院。

② 丁艰，指给父亲或母亲守孝。

③ 服阙，指守孝期满。

为正是前一年，谕令凡丁忧在籍官员，不得聘为书院山长。方世俊连忙上奏，说张甄陶在云南期间，闻丁忧是二十八年（1763）九月初二，至三十年（1765）十二月初二已经服阙，而且诸生“踊跃赴学”，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张甄陶又不是现任官员，又受到士子欢迎，希望能准张甄陶仍留黔主讲。乾隆批“知道了”。这样，张甄陶才正式接替安平陈法主讲贵山书院。

张甄陶主持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著有成效”，虽然并非仅攻举业，但是在三次乡试中，书院肄业诸生仍然考取正榜25名，副榜3名。“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乾隆三十七年（1772）贵州巡抚李湖奏称，张甄陶“年满克著成效，请照五华书院掌教孙见龙例，议叙八品职衔”。吏部议准，谕旨从之。总督刘藻疏荐，诏加国子监司业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题奏礼部叙议的只有贵山书院张甄陶，紫阳书院廖鸿章、沈德潜、彭启丰，敷文书院齐如南和岳麓书院罗典、欧阳厚均。

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张甄陶病归福州，主讲鳌峰书院四年后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他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是理学研究上，成就很大。有《正学堂经解》《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注说》《四书翼注论文》《杜诗评注集成》《松翠堂文集》《惕庵杂录》《学政实录》等传世。

#### 两次掌院的史学先生——艾茂

艾茂（1722—1800），字凤岳，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少年时就读于麻哈三台书院，十四岁应童子试考了第一名，得到贵州督学邹一桂赠诗“两序温文归大雅，五经讲诵逊神童”。乾隆六年（1741）辛酉科乡试，十九岁的艾茂考中副榜。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科乡试，以第一名考取举人。第二年（1751）参加辛未科会试，排二百二十三名，殿试排三甲八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选翰林院做庶吉士，继续深造，学习期满，被授予检讨<sup>①</sup>之职。乾隆

<sup>①</sup> 检讨，古代官职，任职翰林院。

十八年（1753）年任国史馆纂修官。编纂史书是一项严谨的工作，艾茂并不是信笔写来，而是注重严谨钻研。

不轻下笔，同修者见其濡滞，或轻之。及出，有班马笔意，则大服。茂曰：“史须信今传后，宁任淹迟，何敢妄矜敏捷也？”

艾茂从不轻易动笔，同僚以为他是文才欠缺，有人因此看不起他。等他写了之后，大家一看，居然有司马迁、班固的写史特点，不由得大为佩服。艾茂说写史要把真相留给后人，宁可慢点，不能为了表现才思敏捷而信笔乱写。

第二年他又兼任了《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二十二年（1757），艾茂在北京的国史馆已有六年了，从贵州麻江，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他赶回了家乡，为母亲守孝。守孝期满，贵州巡抚周人骥聘任艾茂为贵山书院山长，这是他第一次执教贵山书院。在他的主持下，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和二十五年（1760）会试中有不少贵州中试者是出自贵山书院的。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京城传来调令，艾茂只得辞去贵山书院山长职务，再次进入翰林院。当时，正好从翰林院保送御史，当权者有意举荐艾茂，同事们也都认为，艾茂“文足以行远，才足以有为”，“以公之科甲，任取一途足以致通显”。但是艾茂淡泊名利，并不积极争取做官，被保送御史后不久，乾隆二十九年（1764），艾茂以父亲年高七十为由，要求回乡孝养，在家乡麻江“自辟园林，孝养其中”。从此，不再回到官场。

在家奉养老父亲期间，艾茂应邀与谢廷薰纂修《独山州志》，全书二十余万字，体例完备，严谨翔实。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修毕。书中留存手工绘制独山州全貌图、独山州城图、三脚屯城图、学宫图、州署图、守备署图、独山司图、独山十二景等大量图片资料，并且每张图均配有文字说明，对了解昔日独山地貌和当时建筑形制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写成如此专业志书，这与他在国史馆修史的经历分不开，奠定了他史学家的地位。

父亲去世后，艾茂过完守孝期，应云南巡抚的礼聘，主讲云南五华书院。在五华书院五年期间，艾茂开云南文教之风，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乾隆四十八年（1783），应贵州巡抚李本之邀，艾茂再次出任贵山书院山长。这次他主持贵山书院近十年。艾茂教人必先“器识”，“陶铸士类，多以文章经济显”。在他的主持下，贵山书院人才辈出，如曾任淇县知县的天柱人宋仁溥，曾任玉田知县的都匀人刘启秀，举人都匀墨冲人萧凤翔，曾任镇远教谕的犹西樵，曾任杭嘉湖道的开阳人何懋轩（何学林），曾任江西布政使的贵阳人花杰，曾任广州知府的贵阳人高廷瑶，曾任铜仁府教授的安龙人李琼英，“皆有文有行”。因其功绩，由贵州巡抚奏请朝廷，加侍讲衔。

乾隆五十七年（1792），艾茂辞教还乡，在都春园、筠筍庄设有书斋，都春园书室藏书最多。他研读《周易》，认为“六合之远，一身之近，瞬息之倾，动静之交……无乎不有，故《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乾隆五十九年（1794），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时任贵州学政洪亮吉到麻哈州城拜访艾茂，对艾茂的学识、思想及淡泊名利的境界非常钦佩。他为艾茂写了《都春园序》《宝珠堂记》，并题诗说：“朝衫脱罢卧云烟，自构园林乐静便。生意不芟闲草木，逸情何异古神仙。”生动地勾勒出了艾茂飘洒自如的儒雅风姿。

嘉庆五年（1800）九月初二日，艾茂病逝家中，葬于城南五里飞凤山。他的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好友，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余年的罗典（1719—1808）对他的学术和人格最为欣赏。当罗典得知艾茂逝去的消息时，亲自为他写了墓志铭，并伤感地说：“今我为公铭，后孰为我铭哉？”

## 附表

2-1 清朝贵阳进士简明统计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	徐必远	顺治七年己丑科	三甲三名	广西桂平道	
2	刘在铨	康熙九年庚戌科	三甲一百一十名	知县	
3	王承祥	康熙九年庚戌科	三甲一百八十名	广西提学副使	
4	徐必遴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三甲二十九名	散馆改主事	
5	王承祜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三甲十三名	顺天府丞	
6	蒋宏澍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不详	庶吉士	
7	周起渭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二十八名	詹事府詹事、江南乡试主考	纂修《康熙字典》
8	田慕芳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六十七名	知县	
9	王嗣衍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	二甲十四名	常州知府	
10	周俊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三甲二百十二名	庶吉士	
11	濮起熊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	三甲一百十七名	庶吉士	
12	王瓚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	三甲十三名	刑部给事中	
13	包祚永	雍正五年丁未科	二甲三十五名	广东监察御史	
14	何锦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不详	湖州归安知县	
15	姜毓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三甲二百二十一名	知县	
16	任元灏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三甲二百三十六名	平远知县	
17	尹祖伊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三甲二百七十名	云南富民县知县	
18	赵楷	雍正八年庚戌科	三甲二百八十三名	广西灌阳知县	
19	龙鹏程	乾隆元年丙辰科	二甲五十名	工部主事	
20	蒋允焄	乾隆二年恩科	二甲五十名	福建按察使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21	龙乐川	乾隆二年恩科	不详	江南五河知县	
22	王觉莲	乾隆四年己未科	二甲四十五名	左庶子	
23	帅 桂	乾隆四年己未科	三甲一百十二名	不详	
24	彭学麟	乾隆四年己未科	三甲一百四十九名	知县	
25	尹德裕	乾隆七年壬戌科	三甲八十三名	湖南武陵知县	
26	王世仕	乾隆七年壬戌科	三甲八十七名	不详	
27	熊元龙	乾隆七年壬戌科	三甲一百零一名	主事	
28	马 璩	乾隆七年壬戌科	三甲二百名	不详	
29	龙 湛	乾隆七年壬戌科	三甲一百九十名	不详	
30	何德新	乾隆十年乙丑科	三甲十一名	湖南永州知府	
31	罗正先	乾隆十年乙丑科	三甲一百四十八名	教授	
32	陈致中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	三甲八十五名	教授	
33	朱 授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一百二十六名	浙江龙泉县知县	
34	杨 炎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一百六十二名	湖北保康县知县	
35	卢 珏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三甲五十三名	洗马	
36	黄之相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三甲一百三十九名	不详	
37	墙 嶷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	三甲一百六十九名	四川奉节知县	
38	潘宪武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	三甲十六名	湖北咸宁知县	
39	何德峻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	二甲四十八名	编修	
40	王霖霖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	三甲八十名	四川长乐县知县	
41	刘具斌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	三甲八十二名	湖北应山县知县	
42	张彦加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	特赏进士	国子监博士衔	
43	李良栋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不详	翰林院检讨	
44	何 泌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三甲二十五名	编修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45	王国元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三甲二十八名	广西南宁知府	
46	何学林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	三甲三十一名	江苏江安粮道	
47	花杰	嘉庆四年己未科	二甲三十五名	广西巡抚	
48	白犹龙	嘉庆四年己未科	特赏进士	翰林院检讨	
49	黄中位	嘉庆六年辛酉恩科	三甲十一名	东川知府	
50	周际歧	嘉庆六年辛酉恩科	三甲五十名	泰州知府	
51	黄鹤	嘉庆六年辛酉恩科	三甲一百二十九名	知县	
52	何应杰	嘉庆七年壬戌科	二甲十六名	编修	
53	翟锦观	嘉庆十年乙丑科	二甲六十一名	云南按察使	
54	焦承炜	嘉庆十年乙丑科	三甲七十五名	知县	
55	苏廷棻	嘉庆十年乙丑科	三甲一百四十一名	湖南安化知县	
56	夏国培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二甲一百零三名	江西道监察御史	
57	王翔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三甲一百三十三名	山东郓城知县	
58	周淳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不详	河间知府	
59	李嗣邨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三甲三十八名	福建淡水同知	
60	周际钊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三甲四十五名	刑部山东司主事	
61	杨士云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三甲四十八名	山东兰山知县	
62	贺士清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三甲一百二十四名	不详	
63	刘燧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三甲一百三十三名	山西石楼知县	
64	刘炜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二甲四十二名	散馆任主事	
65	傅潢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五名	全州知州	
66	袁如凯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二十六名	广西怀集知县	
67	曹人杰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五十七名	江西上饶知县	
68	陈炳极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二甲六十三名	济南同知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69	殷齐贤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三甲二十三名	不详	
70	黄梓春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三甲八十一名	永春知州	
71	张日晷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二甲四十二名	云南巡抚	
72	魏 鸿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二甲六十七名	户部郎中	
73	刘荣熙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二甲三十四名	浙江嘉兴知府	
74	花咏春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二甲五十六名	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	
75	杨 焯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三甲五十六名	山东东平知府	
76	周 涛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二甲五十六名	河间知府	
77	周 景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二甲八十二名	江苏常州镇江道	
78	李泰交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二甲九十名	左中允	
79	周际铨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三甲九十七名	陕西麟游知县	
80	彭宗岱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二甲八十名	江西饶州知府	
81	孙谦豫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二甲八十二名	山西沁水知县	
82	毛凤仪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三甲十八名	奉天盖平知县	
83	姚廷清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三甲二十八名	直隶晋州知州	
84	寇秉钧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三甲四十一名	山东益都知县	
85	王 玥	道光六年丙戌科	二甲二十三名	苏松太道	
86	卢人珣	道光六年丙戌科	三甲十五名	四川永宁知县	
87	刘沛霖	道光六年丙戌科	三甲一百十二名	署普洱知府	
88	何荣章	道光九年己丑科	二甲七十三名	直隶清河知县	
89	周际云	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	三甲四十九名	吏部文选司主事	
90	花讷春	道光十三年癸巳科	二甲三十二名	礼部员外郎	
91	杨 培	道光十三年癸巳科	二甲七十四名	四川布政使	
92	周 颢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二甲四十三名	云南盐法道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93	黄辅辰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三甲二名	陕西凤邠盐 法道	入《清史 稿·循吏传》
94	王毓濂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三甲七十名	湖北沔阳知县	
95	郭超凡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三甲一百零五名	广东琼州知府	
96	陈守中	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	三甲九名	湖南零陵知县	
97	石赞清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	三甲二十四名	工部右侍郎	
98	萧时馥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二甲五十二名	散馆授编修	
99	杨春和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三甲四十四名	直隶新河知县	
100	朱 镇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三甲四十九名	直隶衡水知县	
101	熊灿奎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三甲七十三名	四川安县知县	
102	夏承煜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 科	二甲十九名	广东知县	
103	徐良梅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 科	三甲六十名	广东知县	
104	孙 濂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 科	三甲八十名	按察使	
105	张见田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	二甲九十六名	甘肃知县	
106	萧时馨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	三甲十名	户部主事改四川 龙安知府	
107	袁思鞅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	三甲二十九名	江西万安知县	
108	李朝仪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三十二名	顺天府尹	
109	张秉堃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三十七名	四川知县	《清史稿》 有传
110	黄辅相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四十二名	广西知县	
111	周 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七十五名	正定知县	
112	车汝震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八十一名	顺天府邳县知县	
113	董炳章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 科	三甲九十六名	四川知县	
114	黄彭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二甲三十七名	江苏布政使署巡 抚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15	车汝建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二甲一百零三名	陕西凤县知县	
116	张希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二甲一百零八名	直隶知县	
117	敖国琦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三甲五十二名	江南知县	
118	沈善昌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二甲四十八名	不详	
119	寇嘉相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二甲八十二名	散馆授编修	
120	杨先泽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三甲七十八名	不详	
121	谢金浩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	二甲九十一名	散馆改河南镇平知县	
122	高天宠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	二甲一百零六名	河南确山知县	
123	濮尚暄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	三甲九十六名	广西罗城知县	
124	张 焯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	三甲九十八名	河南即用知县	
125	傅寿彤	咸丰三年癸丑科	三甲七名	河南按察使	
126	张师亮	咸丰六年丙辰科	三甲五名	江西南昌知县	
127	周 鹤	咸丰六年丙辰科	三甲八十三名	监察御史, 广西桂平道	
128	陈鸿作	咸丰九年己未科	二甲六十七名	不详	
129	赵继学	咸丰九年己未科	三甲二十名	不详	
130	吴岱章	咸丰九年己未科	三甲六十二名	户部主事	
131	严仲泽	咸丰九年己未科	不详	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	
132	何亮清	咸丰十年庚辰恩科	二甲二十八名	四川知县	
133	何 鼎	咸丰十年庚辰恩科	二甲七十六名	叶县知县	
134	何庆恩	咸丰十年庚辰恩科	三甲七十四名	福建候选知县	
135	周 麟	咸丰十年庚辰恩科	三甲七十五名	礼部主事	
136	杨先棻	同治元年壬戌科	二甲六十九名	散馆授编修	
137	胡日暄	同治二年癸亥恩科	三甲二十七名	贵州黎平府教授	
138	李端棻	同治二年癸亥恩科	二甲四十二名	礼部尚书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39	张杰	同治四年乙丑科	三甲八十名	山东知县，直隶州知州	
140	刘琪枝	同治四年己丑科	三甲一百三十九名	四川知县	
141	李振南	同治七年戊辰科	二甲六名	江南道监察御史	
142	张世煥	同治七年戊辰科	二甲一百八十名	主事，四川嘉定知府	
143	李宗邨	同治七年戊辰科	三甲七十名	浙江、江西知县	
144	袁思干	同治七年戊辰科	三甲八十五名	湖南沅江知县	
145	谭培塿	同治七年戊辰科	三甲一百二十六名	四川雅安知县	
146	熊景钊	同治十年辛未科	二甲三十二名	四川道监察御史	
147	罗文彬	同治十年辛未科	二甲三十二名	云南永昌知府	
148	寇本城	同治十年辛未科	二甲四十六名	散馆授编修	
149	黄杰	同治十年辛未科	二甲九十三名	广东肇庆知府	
150	黄卓元	同治十年辛未科	不详	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151	钱登云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二甲九十四名	云南知府	
152	唐登瀛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二甲一百二十二名	四川知县	
153	赵宗鼎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八名	直隶后补道	
154	王培心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三十一名	署顺宁、永昌府知府	
155	萧射斗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一百六十三名	不详	
156	袁韵春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三甲一百六十七名	四川知县	
157	黄国瑾	光绪二年丙子恩科	二甲二十四名	散馆授编修	
158	张主敬	光绪二年丙子恩科	二甲四十七名	直隶河间知县	
159	乐理莹	光绪二年丙子恩科	二甲一百十五名	山东昌邑知县	
160	唐选皋	光绪二年丙子恩科	三甲十六名	四川荣县、名山县知县	
161	许泽新	光绪三年丁丑科	二甲三十四名	典礼院学士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62	杨调元	光绪三年丁丑科	二甲四十三名	陕西渭南知县	《清史稿》有传
163	陈 灿	光绪三年丁丑科	二甲一百十七名	云南布政使	
164	陈 馨	光绪三年丁丑科	三甲一名	户部主事	
165	李天锡	光绪三年丁丑科	三甲一百六十七名	顺天府西路同知	有政声
166	陈夔麟	光绪六年庚辰科	二甲十一名	广东布政使	
167	谢延泽	光绪六年庚辰科	二甲一百零八名	广西同知	
168	余熙春	光绪六年庚辰科	三甲三名	散馆授检讨	
169	刘奎辰	光绪六年庚辰科	三甲五十名	河南知县	
170	刘文锦	光绪六年庚辰科	三甲八十一名	云南保山知县	
171	陈泽春	光绪六年庚辰科	三甲九十八名	陕西洋县知县	
172	陈后琨	光绪九年癸未科	二甲五十五名	散馆改湖南清泉知县	
173	胡治铨	光绪九年癸未科	二甲七十一名	四川西阳直隶州知州	
174	戚朝卿	光绪九年癸未科	三甲十三名	直隶知县、湖南常德知府	
175	李世祥	光绪九年癸未科	三甲十八名	礼部员外郎	
176	赵湘洲	光绪九年癸未科	三甲一百一十一名	工部主事	
177	赵以炯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一甲一名	翰林院编修	
178	李端渠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二甲四十一名	陕西宝鸡知县	
179	李锡龄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二甲七十名	内阁中书、云南个旧同知	
180	柴作舟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二甲九十三名	四川知县，升道员	
181	陈 田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二甲一百零五名	户科掌印给事中	
182	陈夔龙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三甲五名	直隶总督	
183	赵以燿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三甲十名	中书	
184	史继泽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三甲九十四名	广东直隶州知州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85	赵建光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不详	宜章知县	
186	邓维琪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二甲四十三名	四川后补道	
187	孔繁昌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二甲八十四名	山西临县知县	
188	文明钦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三甲四十三名	山西右玉知县	
189	徐培光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三甲五十六名	湖北蕲水知县	
190	黄土廉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三甲八十四名	不详	
191	张正基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三甲一百三十名	湖南攸县知县	
192	李立元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三名	四川宁远府知府	
193	杨廷椿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四十一名	云南知县	
194	陈仲澹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一百零四名	广西怀远知县	
195	陈启绪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一百三十一名	湖南知县	
196	熊济文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一百十二名	四川宁远府知府	
197	胡成立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一百二十名	礼部主事, 广西知州	
198	王鹤松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三甲一百四十名	黎平府教授	
199	花 铭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三甲一百四十二名	云南新平知县	
200	罗 镛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三甲一百五十四名	河南项城知县	
201	寇宗俊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二甲四十九名	云南云龙州知州	
202	陈 瑜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三十一名	天津海关道	
203	谭子俊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四十一名	福建侯官知县	
204	许文森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九十九名	直隶知县	
205	刘钟琼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一百十六名	广西知县	
206	李仲涛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一百三十九名	不详	
207	黄土俊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三甲一百六十六名	兵部主事	
208	李允廉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三甲一百零七名	四川知县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209	杨鸿勋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三甲一百五十七名	内阁中书	
210	韩绍徽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三甲一百六十四名	礼部主事	
211	郑玉麟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三甲一百七十六名	云南知县	
212	聂延祜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二甲三十三名	广西桂平知县	
213	胡嗣芬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二甲七十四名	散馆改河南夏邑县知县	
214	马汝骥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二甲九十九名	东川道	
215	周之麟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三甲六十三名	刑部宥恤司主事	
216	丁良佐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三甲一百六十二名	广西贺县知县	
217	白子钊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三甲一百八十一名	兴义府教授	
218	夏同龢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一甲一名	翰林院修撰	
219	张杰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二甲一百二十三名	刑部主事	
220	李瑞荣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九名	广东廉州知府	
221	朱沧鳌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七十七名	官主事、四川知县	
222	黄钟杰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一百五十名	官直隶知县	
223	朱荣先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三甲一百八十六名	四川知县	
224	唐端铜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二甲七名	河南财政监理，四品御銜	
225	李维钰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二甲一百二十四名	直隶知府	
226	陈国祥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二甲一百三十一名	编修、民国众议院副议长	
227	萧开瀛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三甲四十名	授刑部主事，改四川知州	
228	曾肇嘉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三甲八十二名	山西太谷知县	
229	丁树齐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三甲一百二十九名	山东长清知府	
230	胡嗣瑗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二甲二名	散馆授编修，官至内阁阁丞	
231	王庆麟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二甲三十四名	散馆授检讨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232	刘钟俊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二甲七十八名	主事、湖南攸县知县	
233	戴宝辉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二甲一百二名	江苏庆云知县	
234	邢 端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二甲一百三十八名	学堂监督、民国工商司长	有著作
235	姚 华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三甲九名	邮传主事，民国议员	书画名家
236	袁永廉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三甲二十三名	山西财政副监理	
237	熊范舆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三甲三十九名	知府、民国省公署秘书长	
238	孙 鸾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三甲七十六名	湖南保靖县知县	

注：本表所列人物是今天贵阳市辖区范围内的清朝进士。

2-2 今已划出的清朝贵阳府辖区进士简明统计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	唐 墩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三甲一百二十三名	知县	贵定县
2	万 里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	三甲九十九名	封司员外郎	贵定县
3	王 训	乾隆十年乙丑科	三甲二百十二名	四川南部知县	贵定县
4	王政义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三甲六十四名	知县	贵定县
5	尹 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	三甲七十六名	知县	贵定县
6	安佩莲	嘉庆七年壬戌科	三甲五十八名	长沙知府	贵定县
7	周锡龄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五十名	福建漳浦知县	贵定县
8	李 端	同治十年辛未科	二甲一百十五名	编修	贵定县
9	周 儒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	三甲一百七十二名	广东连州知州	龙里县
10	孙如璧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	三甲一百五十七名	河北新河知县	定番州
11	杨如溥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	三甲一百四十六名	教授	定番州
12	林发森	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	三甲六十八名	湖南安福知县	定番州

续表

序号	姓名	科次	名次	终官	备注
13	程仁圻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	三甲五十一名	广东布政使	广顺州
14	张彦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三甲一百十五名	徽宁国知县	广顺州
15	金鼎寿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三甲二十五名	广德知州	广顺州
16	金鼎梅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三甲一百三十一名	铜仁府教授	广顺州
17	金鼎铭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三甲八十七名	思南府教授	广顺州
18	但明伦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	二甲四十九名	两淮盐运使	广顺州
19	邹峰杰	道光三年癸未科	三甲一百二十九名	广西凌云知县	广顺州
20	金鼎年	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	三甲七十五名	陕西靖边知县	广顺州
21	但钟良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	三甲七名	检讨	广顺州
22	赵以焕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二甲二十三名	江苏丹徒知县	广顺州
23	赵鸿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三甲五十八名	知县	广顺州
24	赵家蕙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三甲五十二名	四川温江知县	广顺州

注：定番州（今惠水）、广顺州（今长顺）、贵定县、龙里县清朝属贵阳府辖区。

## 第三章 近代教育发展

1912年的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大清成了历史。

推动教育转型，是清末唯一实在的“新政”。仿佛一夜之间，神州大地上的学堂都变成了学校。这看似简单的“更名”，其实记录了兴教路上一段段无法抹去的艰辛。清末贵阳出现了87所各级各类的学堂，有的更名后，折戟沉沙，消失了；有的如达德学校、贵州公学、省立模范中学、省立贵州师范学校……挺过了岁月的煎熬，破茧成蝶获得了新生。

当时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国家在战乱的泥泞中挣扎，人民在战乱的泥泞中挣扎，文化教育也在战乱的泥泞中挣扎。趁你病，要你命，从1931年起，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一次次事变，最终演变成全面侵华战争，占我河山、掠我资源、奴役我四万万同胞，妄图使泱泱中华“亡国灭种”。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寇妄图彻底毁灭我中华民族，他们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日语，篡改历史，企图以此消灭中国文化，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让中国人忘记祖国，效忠天皇，归顺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中国29万所小学，损失超过12万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超过2000所；108所大学，能维持下来的只有83所。随着战争的蔓延，许多城市相继被日军侵占，沦陷区的学校，大多被摧毁。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为了保护文化，为了赅续国脉，为了维护文化教育事业，避免学校和文化机构落入日

寇之手，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文化西迁”开始了。在纷飞的战火中，在城市即将沦陷前，一所所学校，一个个学术机构，放弃校园，撤出城市，踏上西迁的征途。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含着眼泪，扛着行李，扶老携幼，汇入西迁的洪流。学校、学术机构组织人工，昼夜不停地搬运大量图书、仪器、文物……风尘仆仆，艰苦卓绝，向西南转移，向西北转移……文化大搬迁，最悲壮的历史，最奋发的精神，最不屈的精神。

向西，向西，去大后方，去还能安放一张书桌的大后方。四川、贵州、云南，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还能在战乱中安放一张书桌的大后方。迁往云南的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大，迁往贵州的大学本科拟组成“西南第二联大”，却途中生变，最终未成。虽然如此，在“文化西迁”的大潮中，许多大学、中学仍然迁到了贵州。国立浙江大学迁到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中正医学院迁到镇宁，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到榕江。贵阳，这个西南腹地的省城，迁来了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战前，贵州没有高等教育，省会贵阳也没有大学。这些大学先后迁入贵州，迁到贵阳，它们开设有文、理、商、法、经济、农业、师范等 40 多个系，不仅让贵州人在贵州就可以考进名牌大学，更全面提升了贵州的高等教育水平，并推动教学、科研的发展。内迁的院校在贵阳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育了大批文化精英。在这些大学的助推下，贵州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也在贵阳相继建立，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也得到发展，乡村教育、民族教育、国民社会教育也短暂兴起，贵州特别是贵阳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西迁”，不仅保护了大量的人才和文物，也促成了贵阳教育体系形成，掀起“抗战文化”浪潮，促进了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西迁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和英雄人物，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这段历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全民族团

结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化保护和传承行动，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西迁虽然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抗战胜利后，内迁贵州的学校陆续迁出，流亡贵州的知识分子大量离开，贵州（贵阳）的文化教育发展几近停滞，而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独裁统治，使国家很快陷入内战，深处西南腹地的贵州也难以避免战争的摧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贵州加强军事部署、加紧经济搜刮的同时，加强思想控制，疯狂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使贵州的文化教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州（贵阳）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大量流失，多处于停办或时停时办状态。1949年11月，贵阳解放，经人民政府接管而获得新生的学校已为数不多了。

下面讲述的是20世纪前半叶贵阳文化教育发展的故事。

## 一、从学堂到学校

岁月易逝，世事沧桑。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倡导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等，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的转型。1912年至1913年，改学堂为学校，取消“忠君、尊儒”的教育宗旨，按日本教育体制规定：小学为7年、中学为6年、大学为3至5年（包括预科1年）。1922年教育部参照欧美体制规定：小学为6年（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6年（初中、高中各3年），大学为3至4年（专科3年、本科4年），师范6年（初等师范、中等师范各3年）。这一教育体制延续至今。

清末“新政”推动的教育转型，神州大地上究竟出现过多少学堂，我们没有掌握数据；而贵州呢？《贵州通志》数据显示，一共出现过683所新式学堂，其中初、高等小学堂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类学堂10所，实业学堂3所，带有高等性质的学堂6所……仅在贵阳就出现过87所各级各类的学堂。进入民国，这些学堂在一夜之间都改成了“学校”，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更名”，其实每一所学堂在变成学校的路上，都留下了一段无法抹去的艰辛故事。

在贵阳，有几所学校，就充分演绎了这一破茧成蝶的过程。

### 从达德学堂到达德学校

筑城大十字往南，有一个老建筑群，也许那红瓦青砖的格调与现代都市不太协调，但那里的一块基石，一面墙壁，一根廊柱，甚至一片屋瓦，都是一段历史。它，就是达德学校旧址。



达德学校旧址（2024年摄）

### 从算学馆到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一个傍晚。贵阳城，忠烈官后院。一群热血青年，一直在激烈争论。

他们是黄禄贞、凌秋鹗、董伯平、贾一民、李仲公等 18 人。

他们争论一个名称：算学馆。

世危时艰，风雨如晦。

屈辱的反思：甲午战争，战败；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事变，惨败。

痛苦的求索：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肯定的答案：在教育变革，“要拿教育改造社会”！

明确的定位：办新教育，育新人才！

他们说到了经世学堂，说到了严修，严修说过“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想起了严修做过的事，为解决“贵州算学人才奇缺”问题，不惜开出岁俸 300 金、程仪 150 金的高薪，电请张之洞从两湖书院代聘算学教习。所以，他们想办一个机构，既能将“西学中用”落到实处，又能得到朝廷许可。

好！算学馆！

黄禄贞（1871—1935），字干夫。严修在《蟬香馆使黔日记》中写道：“普定黄生禄贞，气平静，与人无争，心思栗密，尝与己意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又以纸为地球，界画如法。其于格致之学，性犹近也。惜无名师为之前导，又无仪器书图以资其用，使久于津沪楚鄂之区，所造远矣。”严修惜其才而将其取入经世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禄贞邀集凌秋鹗、贾渔卿、聂竹书等人，在城南忠烈宫创设“算学馆”，研究数学及格致等学。



黄禄贞

二十九年（1903）在此基础上成立“达德书社”，有社员 34 人。三十年（1904）改私立小学堂，以黄禄贞为校长。次年更名达德两等小学堂，以“智、仁、勇”为校训。达德是贵州最早建立的学校，重教育、讲科学，宣扬民主、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妇女解放，倡导白话文，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名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禄贞奉贵州巡抚林绍年委派赴日本考察实业，回省后任提学使署实业科长，历任贵州实业司长、下游矿务总办，创办劝工局、农事试验场、女工讲习所、商品陈列所及贵阳梦草公园。

据记载，算学馆，康熙年间设于畅春园之蒙养斋，选拔精于算术的官员司其事，教八旗世家子弟学习算法，也就是只为皇家或重臣子弟做教育服务。算

学带有“西学”元素，是朝廷和守旧者的忌讳，学习算学就是离经叛道，所以一直被严格控制，不允许民间开设。雍正至道光的百余年间，一直如此。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朝廷才放宽了对算学馆的限制，但民间开设算学馆也是戊戌变法以后的事。

黄禄贞听说邻省湖南的浏阳已经开设了算学馆，所以他想用“算学馆”给他们这个研究团体命名。这可以一举三得，一是可解决贵州算学人才奇缺问题；二是可利用算学包含的西方数学元素，研究西方科学，推进科学文化教育；三是可避免朝廷非难。

贵州贵阳的算学馆，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团体，就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了。黄禄贞、凌秋鹗等人，在传统算术馆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改革，除研究算学外，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学等列为主要课程，将《时务三字经》《天文歌略》《地球韵言》《启悟要津》等作为教本，由黄禄贞主讲，凌秋鹗担任数学老师。他们提倡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去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当时，算学馆处于草创阶段，设备简陋，章程粗疏，但他们钻研讨论，相互切磋，不稍懈怠。

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他们也深深地感到，算学馆在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方面还是有很大局限：一是传播的形式比较单一，二是传播的内容不成体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凌秋鹗、黄禄贞又集合三十余人，在“算学馆”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达德书社”。“达德”语出《礼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达德，是对用教育培育“智、仁、勇”精神的倡导，是一群热血青年胸怀天下苍生的教育大志。

书社成立后，订购了大量京沪新书刊，书社成为当时贵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园地。但是，不管是算学馆还是达德书社，其教育和宣传的组织形式，还相对松散和随意，既不定型也不系统。

光绪三十年（1904）初，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



民国初年贵州达德学堂学生合影

黄禄贞、凌秋鹗等人，紧跟时代的步伐，就在达德书社基础上创办了“国立小学堂”，次年更名“达德学堂”。公推黄禄贞为堂长（校长），凌秋鹗为总董。当时贵阳仅有两所新式小学堂，一所是“寻常小学堂”，另一所就是“达德学堂”。

达德学堂，不仅传授西方科学知识，而且秘密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刊，如《民报》《国粹学报》《革命军》《黄帝魂》等，他们宣传进步思想，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科学。这在当时的贵州，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 学堂蝶变成学校

辛亥革命后，达德学堂正式改称达德学校。

学校以培养“智、仁、勇”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宗旨，以好学、力行、知耻<sup>①</sup>为校训。“智、仁、勇”“好学、力行、知耻”是古训，达德学校作了新的诠释，赋予了新的内容，逐渐形成了既有时代感，又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仁”，是道德思想要求。达德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新道德、新思想，做敢于同封建道德、守旧思想对立的人。在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方面，学校教师更是身体力行，亲做表率。

“智”，是学习内容要求。达德学校要求学生学习、掌握于救国、强国有用的科学知识，因而反对只重文科的旧式教育传统，提倡文理并进，以振兴国家。学校开设了生物、生理卫生等新式课程，重视英语课，认为它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必备工具，小学从四年级起就开设英语。学校建起仪器室，专门筹资从日本购买新式教具，如地球仪、天秤、放大镜、解剖图、几何量具等十几箱。这些仪器运达贵阳时，学校专门举办展览会，在贵阳引起极大轰动。

早在1906年，黄禄贞到日本考察回来时就说过，日本有一庆应义塾，是世界著名的学校，所出人才为一时俊秀，开日本维新之局。他希望把达德学校办成庆应那样的学校。在1917年的达德学校日记里，有董事凌秋鹗的一段谈话：“近阅天津南开学校纪事，所经之艰苦困难，皆与吾校相似，以创办诸人百折不懈，勇猛进取，始有今日。现其学生将近千人，所分学级有中学、师范等部，校中附设之学会不计其数，即出版之报纸亦不下四五种，其发展犹日进无已，可为吾国之庆应义塾。甚愿本校同人勉为继起，勿让他人独步也。”

为了将达德办成庆应义塾和南开那样的学校，学校按陶行知先生的教导，极为重视学生的成长和身心健康，竭力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设月测验和中心训练周，着力培养学生的好思想品德。由凌秋鹗和黄齐生分别提出了“三完教育”和“三面向计划”，并在学校贯彻执行。

“三完教育”：教科书必须教完，练习本必须改完，各种实验必须考完。

<sup>①</sup> 出自《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三面向计划”：由学校教育推广到社会教育，由普通教育推广到职业教育，由城市教育推广到乡村教育。

学校还特别注意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提倡“今天事，今天了。不拖沓，不欠账”。学生学习，着重课堂讲授，课堂消化；学生作业，着重课堂做，面对学生课堂改，使学生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改。

达德学校后又增办中学，1925年又增设女中部。

从算学馆到书社、学堂，再到达德学校，几经变迁，历尽沧桑。达德教育的理念、课程、管理等，在探索中至臻完善。达德学校的历程，是清末民初教育转型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代新式学校从孕育、发展到成熟的过程。

### 历经风雨立潮头

达德学校自算术馆建立开始，即以培育新思想、培养新人才为宗旨，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校训，不但重视知识传授，也重视师生思想教育。

学校办学初期，新思想新潮流不断涌现，各种时尚和进步报刊先后输入贵州，对达德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校在教育思想、学制、活动等多方面，都站在时代前列，以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指导办学，开创了贵州近现代教育史上诸多第一。

**第一个开办女学的学校。**1904年，黄禄贞的二弟黄齐生应邀到私立小学堂协助办学，从此投身教育事业。在黄齐生的大力倡导下，1905年，达德学校冲破社会偏见，第一个在贵州开办女学。为了女学的顺利开办，达德学校专门聘请董赵德莹为女小教师，负责对女学生的教学和管理。董赵德莹是贵州省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黄齐生提倡妇女解放，女生进校后，他倡导、开展了“天足运动”，让自己的女儿黄素昭和外甥女王若芬带头不缠足，并动员女教师董赵德莹投入实际行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全校推行并普及贵阳社会，在贵州掀起一阵妇女解放运动之风。1909年，《申报》报道称：贵阳风气渐开，女



1905年达德学堂倡办女子班，聘请贵州省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前排左起第五）任教

学林立，其中达德女学堂学生130余人。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举行，除贵州茅台酒获得金奖外，贵州贵阳达德女学的女子手工也在展会上获得金奖。

第一个组织演出话剧的学校。黄齐生积极主张改良旧戏，曾自编自导不少新戏，如《大埠桥》《维新梦》《亡国恨》《共和鉴》等，新戏内容多采自国内和国外有积极意义的事件，编写成剧本，借以宣传新思想和教育群众。当时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是用煤油汽灯照明演出。黄齐生先生和凌秋鹗先生利用换景的时间，在幕前介绍和分析剧情，进行宣传和教育，每年演出一次，每次演出，轰动全城，人们都蜂拥来看，效果很好，有“达德戏班子”的称号。《大埠桥》（即《何腾蛟》），是当时影响较大、最受欢迎的话剧之一。该剧叙述了明朝大将何腾蛟与清军作战，寡不敌众被俘，清廷劝降不从，吊死在大埠桥的故事，歌颂了国家民族英雄的坚强意志。1918年由学校包伯弘、周杏村等改编为话剧演出的还有《九命奇冤》《林则徐》《孔雀东南飞》《奢香》。《奢香》



黄齐生编演话剧《亡国恨》剧照

叙述明初彝族妇女奢香，为促进民族团结而努力的故事，反映了民族平等和团结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倡导白话文教学的学校。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达德学校顶住社会压力，在贵阳首倡白话文教学，1920年创办了《达德学校学生白话文成绩周刊》。

第一个派毕业生留学的学校。从1917年起学校陆续派优秀毕业生到日本留学，后又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在当时，作为一所中小学，能放眼世界办学，在贵州开选派学生留学的先河，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些留学生回贵州后，不仅带来了西方新的科学知识，还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贵州；其中不少留学生甚至回达德任教，使达德教学水平大有提高。此外，达德学校还派毕业生



1910年12月，达德学校首次派毕业生赴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师生相送到油榨街农林学堂时合影

赴上海等地的大学学习深造，为学校培养师资力量。

革命传统是达德学校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智、仁、勇”的达德精神浸润下，一批批爱家报国的达德师生，“达济天下，敢为人先”，或在探索求真的学术道路上，或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征途中，谱写着一篇篇绚丽的华章。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涌现出了像黄齐生、王若飞、袁咨桐、李策等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王若飞（1896—1946），原名运生，后更名度，字若飞，贵州安顺人。1905年，失去父亲、艰难度日的王若飞，在舅舅黄禄贞、黄齐生的接济之下，

从安顺来到贵阳就读于达德学校。那时他才9岁，一直到16岁，他都和舅舅黄齐生住在学校里。齐生先生那时任教职。若飞的为学做人的基础，可以说是在这几年中奠定的，尤其是黄齐生先生的作风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达德的教师们以史为鉴，宣传民族革命思想，王若飞总是积极参加并聆听，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何腾蛟等人的爱国行动慷慨悲歌。他还在学校“通俗演剧会”参加过演出《大埠桥》《维新梦》等，在心中铭刻下“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思想。他还常常秘密阅读当时禁阅的激进书报杂志，



王若飞

例如《民报》《新民丛报》《黄帝魂》《革命军》等，主动追求民主、立宪、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王若飞在达德时期，正是辛亥革命前夜，达德学校的创办者们，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满封建专制，极力追求新的出路，这也不难解释王若飞后来走上革命之路的原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若飞响应辛亥革命号召，参加贵阳学生队稽查城防。1918年王若飞跟随舅舅黄齐生领导的达德学校校友赴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日本排斥中国留学生，于是他和舅舅及贵州留学生30余人，毅然回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王若飞在法国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李富春、罗迈、聂荣臻等同志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3年春，他成为从旅法、旅德党团员中抽出的骨干（共12人）之一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与江苏省省委常委等职。1928年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王若飞是签字代表之一。1946年初，王若飞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第三次国共谈判，与国民

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王若飞在谈判桌上，言辞犀利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驳斥他们的反共谬论，同时广泛接触各界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影响。1946年4月初，由于国民党严重阻挠破坏各项决议的实施，王若飞、秦邦宪于4月8日冒恶劣天气从重庆乘飞机，赶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飞机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及同机的叶挺夫妇、邓发、黄齐生等13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八”事件。



袁咨桐

袁咨桐（1914—1930），1924年入贵阳达德小学，受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爱国爱民思想的影响，1927年黄先生以“接近共匪嫌疑”的罪名遭军阀通缉，带着他逃往四川。1929年又来南京，入晓庄师范小学部读书。受到晓庄师范中共地下支部的帮助教育，加入共青团。入团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阅读革命书籍，向同学和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还创作了剧本《玫瑰花》，向人们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930年初，升入晓庄附属劳山中学并担任地下团支部书记，参加了晓庄学生声援和记工厂工人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当年5月和8月袁咨桐两次被捕，9月17日被敌人枪杀于雨花台，年仅16岁。

##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

时光回溯，那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早春。

空间重置，贵阳城，北书院。

情景再现，一所名为“贵阳府中学堂”的学校正式开课授业了。

北书院，建于嘉庆五年（1800），名称就嵌在它的门联里：

正人心以变风俗

本经术而为文章

北书院本名“正本书院”，与贵山书院、正习书院合称清代贵阳三大书院。

岁月的风雨侵蚀着门联上漂亮的字体，世事的艰难遮蔽了书院里辉煌的儒学。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愈演愈烈的蚕食鲸吞，亡国灭种的警钟响起，近代社会维新变革浪潮迅猛而来，传统书院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在贵阳，正本书院改成了贵阳府中学堂，成了贵阳最早的新式学堂。

三年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会同四川候补知府于德楷、内阁中书唐尔镛与任可澄、前仁怀厅训导华之鸿等社会贤达，向贵州巡抚林绍年联名递呈，请求创设新式学堂，将贵阳府中学堂从北书院迁往次南门外雪涯洞。林绍年批准后，学堂更名“贵阳中学堂”<sup>①</sup>，由时任贵阳知府严雋熙总理其事，任于德楷、唐尔镛为学堂监督，学堂学制5年，分文、实科，按毕业成绩等第由学部给予学生拔贡、岁贡等奖励。次年三月正式招生开学，招收学生54名。时隔不久，继任贵阳知府倪惟钦照会：“奉学务公所批改本学堂为贵州省官立



任可澄

通省中学堂。”面向全省招生，扩大办学规模。但原有校舍狭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等经实地考察，在南明河对岸选定了新校址，以私人捐款修建新校舍。学堂并非官费兴建，却定名为“官立”，名实不符。于是，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孙世杰、姚景崇、景方楨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第一班毕业生合影

等教职员，联名递呈提学使陈荣昌，请“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此呈获贵州巡抚庞鸿书、贵阳知府倪惟钦批准，并报学部备案。是年（1906），学校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新校舍全部建成，学堂由雪涯洞迁到两江口新校舍，面向全省招生。

这是一所全新的学堂，此前贵阳城的学校往往都是利用过去的祠堂、庙宇来做校舍，而它则完全是按照近代学校标准建设的。不仅有多间普通教室，还辟有一间专门的“理化讲堂”做专门教室（阶梯教室）。此外，为满足学校师生在校工作、生活、学习日常所需，它还建有大礼堂、大操场、自修室、理化器械室、藏书楼、阅览室、7间食堂（兼室内运动场）、48间学生宿舍和18间教职工宿舍，还有浴室、理发室等，一应俱全。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所真正能称“新”的新式

学堂，不仅校舍新，而且课程新，它开设了国文、外语、物理、化学、算学、地理、历史、博物、美术、体操、法制、理财、读经讲经、修身品行等课程，这些都是传统儒学没有的课程。学堂的教习有任可澄、李裕增、孙世杰、景方桢、黄禄贞、孟光炯、姚广崇、蔡岳和“外教”落合兼光，他们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充满蓬勃朝气。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是清末贵州规模最大、校舍设备最好、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堂。首批入学 54 人，两年后，在校学生就达到了 300 人。

在贵阳，近代新式教育就从这里起步了。

其后，还有不少名人在这里任过教，如王延直、严寅亮、尹笃生、凌秋鹗、王和叔、杨恩元、向义、周步瑛……

辛亥革命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数易其名，1912 年改名贵州公学，1913 年改名私立南明中学，1923 年改名贵州省立第二中学。



贵州省立第二中学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1930年，在周西成创办的贵州大学原址上设立贵阳高级中学

1928年，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撤销贵州省立第二中学，并在其校址设立省立贵州大学；1931年1月，停办省立贵州大学，改办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50年，并入贵阳一中，成为一中的“五源”之一。

良师咸集，桃李芬芳。从这所由清末的学堂蝶变而来的学校里，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逸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乐森瑛，著名物理学家张永立，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一级教授罗登义，教育家罗绳武……

周逸群（1896—1931），字立凤，1896年生于贵州省铜仁县（现为铜仁市）城关镇，祖籍湖北省蒲圻（今赤壁市）新店镇益阳桥。家境富裕，父母早亡。在族叔周自炳的照料下，自幼用功学习，1914年考入贵阳南明中学。他爱读中外史书，有自己的见解，写有《诸葛亮辅汉于蜀论》《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登在校刊《南明杂志》上，博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周逸群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拥护贵州独立，被誉为“有抱负的青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宣传家、活动家，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1年5月，他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五岁。

秦元勋（1923—2008），数学家，贵阳人。在达德学校从幼儿园上到初中，后在贵阳高中及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上高中，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4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玛丽塔学院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48年回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研室副主任、科学普及处处长，中国核工业部（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执行副所长，中国核学会计算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他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的功臣之一，也是我国核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 从贵阳官立中学堂到省立贵阳中学

宣统元年（1909），周恭寿出任贵州教育总会副会长，借以贵州咨议代表身份赴北京、上海参加请愿召开国会之机，参观各地新学，认为“黔之振兴，教育为大”。返黔后，周恭寿奉陈石林提学使令，在官立模范小学堂的基础上设置贵阳官立中学堂，校址设在顺城街南书院。周恭寿任监督，先办预科，次年招第一期正科生，学制4年，分文、实科。<sup>①</sup>辛亥革命期间，贵阳官立中学堂继续扩建，先后修建一排砖木结构的楼房，作为教室、办公室及学生宿舍，又从这排楼房向东延伸修建了砖木结构的两层共四个教室的楼房，还修建阶梯教室及理化仪器室于炎帝宫正殿东侧，更名为官立中学。先办预科，补习英文、算术。凡在官立小学堂毕业而未学习过英文，或中文、算术不及格者，都先入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贵州省立模范中学



1913年成立的贵州省立模范中学  
及其第一期毕业生、教员及官员

预科，补习一年再选正科。宣统二年（1910），奉令分办文、实两科，并招考第一期正科生和第二期预科生。后因校舍太狭窄，另以火药局一部分和炎帝宫另建校舍。工程自1911年开始，到1923年3月竣工，前后历时十二年。炎帝宫当时称为“新校”，对街相距200米的南书院称为“旧校”。

1913年，奉教育部命令，官立中学堂定名为贵州省立模范中学，周恭寿仍任校长。学校招收省内优秀学生，成为贵州当时名校。

该校毕业学生中，秦天真、徐健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负责过贵州党政工作；谢六逸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田君亮是贵州知名教育家。此外，还培养了很多学者、科学家，还有王发善、刘载铭等烈士。

1918年，模范中学扩建，丁照普任校长。1923年，袁祖铭主黔，在省内命名六所中学为省立中学，省政府将省立模范中学更名为贵州省立第一中学，私立南明中学为贵州省立第二中学。另外，遵义、安顺、都匀、瓮安各有一所省立中学。省立第一中学由王佩芬担任第一任校长。1926年，周西城主政贵州，



省立贵阳中学高中第 28 期毕业生

将省立第二中学改为贵州大学，“二中”编号不再存在，因此省立第一中学也于 1935 年将编号去掉，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中学，一直沿用至 1949 年贵阳解放。

1950 年，省立贵阳中学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一样，并入贵阳一中，也成为贵阳一中的“五源”之一。

### 从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到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

清末师范学堂，分官立和私立两类。官立是政府出资兴办，私立是民间捐资兴办。但是，私立的叫“公立”，因为不是一人出资，而要是多人共同出资，只是多寡不一，所以叫“公立”。

###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端棻于流放新疆途中遇赦返回家乡贵阳。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三人前往拜会李端棻，他们共同探讨了贵州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端棻依然坚持在《请推广学校折》中表达的思想，认为“时势多艰，需才孔亟”，培养人才是关键，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提振贵州文化，发展贵州教育。于德楷、乐嘉藻等人都认同李端棻的观点，同时也清楚，只有改革传统儒学教育，发展新式教育，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能谋发展的新型人才。眼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发展新式教育，而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也是做了回答的，那就是“兴学育才，尤在得师”，尽快培养“新学”师资。几人经过深入的探讨、交流，达成了共识：开办师范学堂，培养“新学”师资。于是，四人进一步商讨后决定，“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他们共同集资，在贵阳创办一所师范学堂。

其时，李端棻已年近古稀，但不顾年高体弱，不辞辛劳，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一道，为学堂选址，最终选中了贵阳次南门外两江口一带的雪涯洞、来仙阁、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等处风景优美，清静雅致，富有文化底蕴，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一带是官地，用来办学，能得到官府的支持；这一群老建筑用作学堂校舍，可以节省办学经费。于是，他们联名向贵州巡抚邓华熙递呈，申请创办师范学堂。邓华熙批准了他们的方案。

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四人就创办了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制四年，培养目标为初等、高等小学堂教习。公推于德楷为学堂总理，李端棻、乐嘉藻、李裕增三人为协理，年富力强的乐嘉藻主持学堂日常事务，重大事项由四人会议决定。

学堂按李端棻“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学堂”的主张，从在籍绅士中招募了管理和建设人员后，随即挂牌招收学生，第一期招收了30名学生。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自成立之年起，每年招收一届师范生。学堂教学秩序正常，

在全省的声誉日高，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师资。

学堂开办三年后，日俄战争中日本攻占我国辽阳，学堂聘用的日本教习置酒庆贺，强邀学生共饮被拒绝，遂恼羞成怒殴打学生，学堂将日本教习全部辞退，学堂也因缺数理化教习，只得暂时停课。后因停课期间，学堂学生大部分考取巡抚林绍年组织的留日选派生，以致学堂无法复课，最终停办。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是贵阳第一所师范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私立师范学堂。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乐嘉藻是出资最多的一人，他首捐银 5000 两，开办后，除收少量学费外，堂中一切经费，概由他自己一人负担。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停办后，为了不让教育资源闲置，经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原设于贵阳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入，改为贵阳中学堂。

#### 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贵州师资摇篮”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停办后，仍以学堂仅余的 20 多个学生组成“贵阳师范





尹笃生

教育讲习会”，恢复上课，后改办为“贵阳官立师范传习所”，几经周折后，回到雪涯洞原址。到宣统三年（1911）改为“贵州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称“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5年又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被被誉为“贵州师资摇篮”。

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尹笃生。尹笃生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习师范教育。他归国之时，正值辛亥革命，因为时局动荡，学生多返乡休学。他到校任职时，学校只有外县学生50余人，他到处动员学生返校，后仅得230人。学校设备是旧学堂旧物，大多残坏。尹校长因陋就简，解决教室、学生宿舍、食堂的困难，延聘教师，编印课程讲义，制定规章制度。尹校长定“诚、敬、勤、俭”四字为校训，即“诚则不欺，敬则不肆，勤则不嬉，俭则不侈”。尹校长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订立了训育标准：训练目标为养成中小学健全师资，同时训练国家健全的公民；训练任务为打破封建思想，有牺牲奋斗精神，能服从团体的精神，能遵守公共的秩序，有精确的观察，有系统的研究，有劳工身手，有健全体魄，有欣赏艺术的情趣，有爱好自然的兴趣。训练要求为革命化、纪律化、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训练范围为思想、行动、学习、生活、修养。训练方针为德、智、体、美。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是当时全国最早将“德、智、体、美”定为训育训练方针的学校。学校领导励精图治，学校校产校舍及实验器材、教学设施逐年增加，学校办学规模日趋扩大，成为贵州师范教育设施最完备、办学质量最好的学校。尹校长治理学校9年，积劳成疾，1920年去世。

1924年，政府委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第一期毕业生邵正祥为校长。邵正祥在校内创办平民学校，解决贫民儿童失学的问题，坚持办学18年，为贵阳贫困人家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贵阳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1924年，

奉教育部令，改为六年制师范学校，前3年不分科，后3年分科，在校学生200余人。1932年，朱厚锷被任命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民国教育部正式颁布《师范学校法》，规定师范学校学制为三年，招收初中毕业生。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自此学制定为三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1933年2月，朱厚锷辞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职务，专门从事教课和外校兼课。1933年初，陈维周被任命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陈维周任校长期间，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曾招收女生。1935年孙起孟被任命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学校改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办学中还开设一些附属机构、学校，如小学师范练习所、附属小学、平民学校、国语讲习所、中学部、初师部。抗日战争期间，应中小学初级教员的需求，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设有简易师范科，培养初小教师。1936年孙起孟因为思想进步受到国民党反动分子排挤，王亚功被任命为校长。1937年学校有师范生489人。

1939年，日军轰炸贵阳，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奉命疏散到清镇卫城。在卫城玉皇阁、黑神庙庙址兴建草房十余间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借四川会馆为学生宿舍。因交通不便，学生来源也受限制，学校招生困难，在校人数1940年比1937年减少289人，不到原来的一半。1944年，数学教师王经略被任命为校长。1945年邵正祥再次被任命为校长。

从抗日战争开始，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虽有众多博学多才、热心教育的教职工尽心尽力维持，但货币不断贬值，师生生活每况愈下。1943年师范生的伙食费由原来的6元增至40元，款额激增数倍，仍难维持生活，投考师范的人日减，且毕业后即使能获得一席教职，小学教员薪金微薄，又经常拖欠，生活不能保障，转行的人很多，中途辍学的也很多。1946年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迁回贵阳。1949年11月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0年与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合并，成立贵阳师范学校。2004年并入贵阳学院。

无论名称怎么变，它都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从建校到2004年共

办 108 期，毕业学生万余人，被誉为“贵州师资的摇篮”。民国时期曾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的著名教育家、数学家萧文灿就毕业于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此外还有教育家张敷荣、戴自庵也毕业于该校。

张敷荣（1904—1998），贵州普安人。193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四川大学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南师范学院（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教授，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位教学论博士，撰写、发表论著、译著、论文 70 余部（篇）。1991年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是民国年间贵州师范教育的代表，它的办学历程，既能反映师范教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艰难曲折，也能反映出贵州人发展教育与以教育发展贵州的巨大努力。民国时期的贵阳中等师范教育，累计毕业中师、幼师、简师学生约 4000 人，为那一时期的全省初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能提供的师资，推动着贵州教育不断向前发展。

## 二、女子教育在贵阳

中国封建时代，在儒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女子受教育的非常少。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女子几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以“三从四德”的行为规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标准和缠足陋习，将中国妇女从精神到形体禁锢起来。妇女无进塾读书的机会，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庭教育。妇女处于“盲其目、刖其足，樊笼其身，束缚其智慧”“徒以生命肢体委于男子”<sup>①</sup>的状态。女子无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之道。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社会改革的议事日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抨击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他们主张打破男尊女卑，发展女子教育，禁止残害妇女。光绪十八年（1892），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女子无学是中国“礼数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的社会根源，呼吁清政府“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大声疾呼：“天下积弱之本，则必妇人不学始。”在社会开明人士的努力下，光绪三十年（1904）初，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办女学仍持保守态度，但以家庭教育包含女子教育。

贵阳在女子教育方面紧跟时代，敢于争先。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齐生在贵阳达德学堂加办女子两等小学堂。达德女子两等小学堂创办后，聘请达德书社社员董伯平妹妹董赵德莹担任教师，她是贵阳近代教育史上首位女教师。随后，贵阳先后创办了资善堂女子初等小学堂和广益女学堂。广益女学堂建立后，

<sup>①</sup> 陈撷芬：《女子独立篇》，载《女学报》1903年第1期。

设监督一人，教员二人，都是妇女担任职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阳人张锐、王典彝等在白沙井创办自奋女子学堂，自奋女子学堂附设女子师范班、幼女救护所、中等女子职业学校女工讲习所教育女子。由于全国不断出现女子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在颁布了作为《奏定学堂章程》补充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学堂分初高两等，学制各四年，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规定每州县必设女子师范一所，初办可由官府筹设，允许民办，学制四年。接着，女子职业教育也经呈准而在各地展开。贵阳的女子教育在晚清新思想时期应运而生，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女子学校和许多优秀的女教育家，书写了女子教育的动人故事，成为贵阳教育史上绚烂美丽的篇章。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本来就不多的女子小学，大都处于艰难求存的状态，就是“私立光懿女学”这样名声很响的学校，也在开办 20 多年后停办了。存在时间最长的女子小学，可能是创办于 1912 年的“私立震旦女学”，它脱胎于公立贵阳模范两等小学校，走过艰难岁月，1949 年 11 月贵阳解放，它的师生被政府接收，调整到公立小学。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 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

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成立于 1931 年 8 月，初建时名为“贵州省立女子中学”，原址在忠烈街县学馆。

在这所女子中学成立以前，贵阳曾有过一所女子中学。1921 年，时任贵州临时省长的任可澄接受社会各方建议，将“公立贵阳模范两等小学校”拆分，以大坝子模范小学本部兴办女子师范学校。数年后，周西成入贵阳主政贵州，将女子师范学校加以修整，改办女子中学。周西成死后，这所女子中学又办成了女子师范学校。



20 世纪 20 年代的贵阳女学生

贵州省立女子中学算是民国时期由政府正式举办的一所女子中学，1935 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隶属于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学校于校长之下设有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等职务，还设有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经费稽核委员会、招生委员会等机构，是一所相当正规的中学。历任校长有杨印阶、陈应禧、杨寿珣、符诗镛、刘恒、朱厚锬、张玉麟、章孝友、薛吉萃等人。1939 年贵阳“二·四”轰炸后，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疏散到贵筑县花溪石头村办学，以茅草房为课堂，开辟农场进行生产。1944 年迁回原址，当时有高、初中 18 个班，学生 700 余人。1946 年，省教育厅在视察报告中称该校“各学科教学认真”。

抗战时期，在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建有党的地下支部，领导进步师生开

展革命活动。教师陈光型（党员）、学生刘家祥（党员）和杜蓉（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为革命烈士。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贵州省立贵阳女子中学。1950年，学校从忠烈街迁至文笔街，1968年改名“贵阳市第二中学”。

###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于1921年，是贵州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子中等专业学校，在民国时期，为贵州培养小学师资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1920年，贵阳只有一所男子师范学校，每年毕业的学生为数不多，不能满足全省各县需要，当时省内热心教育之士对此颇为关切。1921年，贵州省议会的一些议员在一次会议中动议，为奠定今后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满足各县需要，必须尽速培养小学师资。因此议会提请省政府创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向全省招生，毕业后可以分发回原籍任教。当时贵州临时省长任可澄认为可行，派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桂诗成主持筹建工作。

1921年，在拆分“公立贵阳模范两等小学校”后，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模范小学大坝子（今贵阳二中所在地）校舍正式成立，学制为五年。任可澄委派由日本留学回国的周步瑛出任校长，教员有王万杰、王延直、王起斌、陈昭令、孙云波等，当年5月1日开学授课。首届招生两班，学生90余人。

学校的组织架构为校长1人，教务主任1人，会计、庶务、文牍各1人，管理员（负责住校学生生活方面的管理）数人。第一任教务主任是肖协臣。学校男女工友若干人，分管守门、传达及教室、宿舍、厨房等勤杂工作。

1924年，学制变更，改五年制为六年制，前三年授普通课程，后三年分组进修。按规定，每届学生毕业之前，均须经过到小学实习，成绩及格才准毕业。1925年，为便于第一期学生实习，校长周步瑛于校内增办附属小学，以余志明为附小部主任，以第一期学生黄先锦、周佩葡、韦易、冷体琼、孟广运等为教员。

附小第一期招生三班。同年11月，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共58名。

在周步瑛离任前一年，为了加快师资培养以推进贵州教育的发展，学校专门开办两年制的特别班，专招外县女生，且不受是否婚配的限制。在当时，这是一项反封建和解放妇女的创举，实在是难能可贵。自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女师的毕业生每年源源不断走进贵州教育前线，在贵州各县成为小学教育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当时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1937年，教育厅改委女师第一期毕业生郭昌鹤任校长。郭氏仅半年即辞职，章孝友继任校长。1938年，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更名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学校迁往贵阳南郊青岩城南斗姆阁上课。其时房屋太少，不敷应用。同年9月，章氏辞职，王起斌继任校长。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期至第三期，肄业期限为五年，第一年为预科，后四年为本科。第四期起改为六年毕业，前三年为公共科，后三年分专科学习。公共科学习普通课程，分科后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教育必修课程，并安排有参观、实习时间。

第四期至第六期，后三年分科时，除学习教育必修课程外，还进行了专业学科分组，有以数学、理、化为主要科目的数理组；有以中外文学、中外史地为主要科目的文史地组；有以中西艺术，如自然、水彩写生等为主要科目的艺术组；还有以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学等为主要科目的博物组。

学校改制期间，取消了分科分组的学制，两级除学习普通课程外，均学习有关教育课程。初级师范毕业后，可直接升入中师。至于担任各科课程的教师，最初是由本校职员兼任，不敷时向校外聘请兼任教员，按任课时数致酬，后来才有专任教员的设置。但是在当时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教师每日收入有限，有时欠薪数月不发，教师生活清苦且无保障。因此，教师多在几个学校兼课，有的教师在各校兼的课多，顾此失彼，就采取在所兼课的学校轮流请假来应付。

女师创建后，由于对学生在生活上要求严格，所以学生在生活上能养成比

较朴素的作风。在首任校长周步瑛的倡导下，学生服饰一反时髦的习尚，规定一律须着学校规定的蓝衣（后改为芝麻布上衣）和青裙（后改为黑底白点土布裙），头上一律绾成双髻。无论达官贵人或富商的女子，绝对不容许有一个例外。偶有一二奇装异服的学生，轻者不许听课，重者开除。学生在校内外均须佩戴校徽，违者将予以处分。因此全校蔚然成风，学生不仅在求学时期崇尚朴质，而且即使在毕业后，也养成俭朴习惯。同时，在学习态度上，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刻苦学习，人人争取优良成绩，不愿甘于落后。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在小学教育方面也有良好表现，因而女师在社会上颇受好评。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1950年并入贵阳师范学校。

女师从1921年创立，到1950年并校，历届毕业的班次在30班以上。每班如平均以40人计算，共计培养学生在1200人以上。估计其中除百分之一的人继续升学，或因其他原因未直接参加教育工作外，至少有一千人走上了本省小教岗位，使当时小学师荒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当时，担任女师的教师，多数是有教学经验的人，他们都比较重视教学质量，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学生毕业后，都能胜任工作。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  
学校学生合影

### 三、“文化西迁”——贵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大好河山被占领，丰富资源被掠夺，四万万同胞被奴役，日寇妄图使我们“亡国灭种”。为了彻底征服我中华民族，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寇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习日语，企图以此消灭中国文化，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效忠他们的天皇。“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的学校遭受严重损失，29万所小学，损失超过12万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了超过2000所；108所大学，仅有83所还能维持。随着战争的蔓延，中国的许多城市相继被日军侵占。北京（时称北平）、天津陷落，上海、南京失守。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屠杀中国同胞30万人以上。为了不让文化教育遭到破坏、践踏，大批学校、文化机关纷纷内迁，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搬运大量图书、仪器、文物风尘仆仆地向西南、西北转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最充满奋发和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

西南是战乱中还可以安放书桌的一片乐土，许多大学、中学、军事院校迁到西南。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分别迁往重庆和贵阳。迁到贵州的大学共有8所（其中贵阳有3所），它们是：私立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国立浙江大学迁到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湘雅医学院由长沙迁到贵阳，国立中正医学院迁到镇宁，之江大学工学院迁到贵阳，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到榕江。贵阳本土的贵州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也在“文化西迁”大潮中建立起来（详见附表3-1）。

内迁的院校在贵阳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育

了大批文化精英。抗战前贵阳乃至贵州都没有大学，突然来了许多学校，贵州人就可以在贵州考进名牌大学。这些大学设立有文、理、商、法、经济、农业、师范等 40 多个系，全面提升了贵州高等教育水平，并推动教学、科研的发展。<sup>①</sup>

### 私立大夏大学——最早迁入贵州，办学时间最长的内迁大学

迁来最早，在贵州时间最长（1938—1946）的是原在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大夏大学是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创办于 1924 年，脱胎于厦门大学。

**创办** 1923 年，厦门大学因为个别教师教学质量不好，学生要求教学改革，学校当局处理不当，殴打侮辱学生，激起师生愤怒，事态愈演愈烈。学校不但不采纳学生意见，反而火上浇油，将支持学生的欧元怀等教授改聘。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 9 名教授愤然离校前往上海，300 多名学生也随之来到上海，决定在上海另建一所私立大学。欧元怀多方奔走，经费无着落时，得到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部长的贵州人王伯群支持。王伯群对厦大师生深表同情，捐资 2000 元作为开办经费，租借民房作校舍，登报招收学生，1924 年秋季正式开学；并邀请柏林工业大学化学博士马君武及政界要员吴稚晖等 7 人组成学校董事会。董事会推王伯群为董事长，马君武为校长，欧元怀为副校长。校名定为“大夏”，意在光大华夏之意，并隐含由厦门大学蜕变而来。



大夏大学校徽

<sup>①</sup> 史继忠：《文化西迁到贵州·滚滚的文化潮》，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6 页。

**发展**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命王伯群为交通部长，次年马君武改任北京工学院院长，经董事会决定，王伯群兼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主持校务。1930年，随着师生人数增加，学校校舍不能满足需求，学校决定另建新校舍，王伯群慷慨捐赠白银6.7万两，折合银圆10万多元作建校费用，加上30余万的贷款，建成教学楼24栋，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职工宿舍12栋及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理科实验室、医疗室、浴室、饭厅等建筑群。1931年，王伯群不再担任交通部长等职务，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为了壮大声势和贷款方便，聘请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立法院副院长兼江苏省主席叶楚傖、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为董事，又增补浙江银行董事长徐寄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总经理胡孟嘉，中国银行行长张公权，信成银行董事长王一亭为董事。《时事新报》《申时电讯报》《大晚报》及英文《大陆报》4家报社总经理张竹平等，上海文人虞洽卿、杜月笙等为校董，使大夏大学能在上海立足并不断发展壮大。学校很快发展成为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规模最大、风景优美的名牌大学，被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学校总面积达18000平方米，分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及师范学院专科，并办了800人规模的附属中学。

**西迁**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大夏大学开始西迁。起初，由大夏、复旦、光华、大同4所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后因为意见不合，光华、大同两校退出，改由大夏大学与复旦两校组成联合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牯岭。南京、武汉相继陷落，联合大学在江西庐山牯岭复课3个月，12月又被迫西迁重庆，但因校舍严重不足，复旦大学决定留在北碚，大夏大学决定迁往贵阳，导致联合大学解体，两校各自恢复原有校名。时任大夏大学的校长王伯群和董事长何应钦都是贵州人，在贵州政界影响很大，大夏迁贵阳得到贵州各界的支持。西迁既可打破贵州无高等教育的局面，又能带来诸多有利条件，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财政厅厅长周诒春都表示大力支持，将次南门外讲武堂校舍

及场地拨借给大夏大学，于1938年秋正式上课后，又在花溪拨1000亩土地兴建校舍，新校舍于1944年建成，但未迁入，再次搬迁至赤水。

**院系设置** 大夏大学是一所相当完备的综合大学，在贵州时院系设置如下：共设5院22系，即文学院5系、理工学院6系、教育学院3系、商学院5系、法学院3系。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和新闻学系；理工学院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土木工程学和建筑工程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行政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社会教育学系；商学院有商学系、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法学院有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还附设有师范专修科、教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和大夏附中。另外，还设有社会研究部、文史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出版有《新大夏》和《大夏周刊》。

**师资力量** 大夏大学师资雄厚，有教授、副教授50多名。在上海聘请的教授大多随迁而来，又在贵州增聘一些教授，如文学家谢六逸、李青崖、钟泰；外国语教授如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籍）、张光年；史地教授翦伯赞、周谷城、梁园东；社会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梁瓯第；政法系教授谌志远、钟跃天、高承元；经济系教授金企渊、赵兰坪；数理化教授夏元璠、陈景琪、谢仲武；教育学教授马宗荣、鲁继珍等；英文系主任、中学部主任张梦麟。

副校长欧元怀是福建莆田人，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南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从1930年起担任大夏大学副校长。后来，在教育厅长任期内（1940—1945），他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贵州教育。教育长吴泽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大夏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院长、社会研究部主任、社会学教授。总务长马宗荣曾在日本留学，是著名的社会教育家，曾任大夏图书馆馆长、社会教育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文通书局编辑所长，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馆长。文学院院长谢六逸，留学日本，是著名的作家、新闻家和日本文学专家，曾开创复

且大学新闻系；兼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文讯》主编。理工学院院长夏元璠，著名的物理学家，曾获美国耶鲁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原为重庆大学教务长，在大夏任理工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夏元璠为理科学长。商学院院长金企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院院长谌志远是政治学家，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大夏大学训导长、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邓世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中山大学法学教授、大夏大学经济系主任。高承元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大夏大学法律系主任。毛家琪曾任湖北法政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法学院院长、政经研究室主任。张梦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系毕业，大夏大学英文系主任、附设中学部主任。姚薇元，历史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任西南联大和大夏大学教授。廖世承是留美心理学博士，曾任光华大学校长、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大夏大学教育学教授。李青崖曾留学比利时，专攻法国文学，大夏大学教授。曹未风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大夏大学外文系主任。陈倚石，1941年任大夏大学教育系讲师，是有名的画家，后来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马宗荣、谢六逸、张梦麟和谌志远都是贵州人。

**贡献** 大夏大学迁到贵阳，贵州自此有了高等教育，贵州学生再也用不着长途跋涉到外地求学，可以就地报考名校。大夏大学是内迁各高校中招生最多的院校，在校学生经常在1450人左右，最高年份达1800人。在贵州长达8年，毕业学生1567人（详见附表3-2、3-3）。

教育学院贡献最大。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历史悠久，设有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和社会教育三个系。原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中写道：“教育学院之贡献，贵州全省中等学校校长，绝大多数由大夏教育行政系和教育心理学系毕业生担任，至于社教机关，如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负责人，亦多为社教系毕业生充当。”毕业生分配到贵州省内各学校任教，一向缺乏数理化教师的贵州“从此黔省数理教师不虞匮乏”，教育学院

行政系和教育心理系为各学校培养了教育科长和校长等管理人才，后来教育学院并入贵阳师范学院，成为师范学院建立的基础。

抗战期间，北大并入西南联大后，其新闻系停办，继续存在的只有谢六逸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大夏大学新闻系。社会教育家马宗荣在大夏期间，出版了《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社会教育入门》等 30 余种专著，对我国社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作用，大夏社会教育系的毕业生分到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大夏首开贵州社会学系，组织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社会研究部出版了《民族学论文集》《苗夷丛书》《苗胞影荟》《炉山黑苗的生活》等书；社会学家梁瓯第后来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即榕江师范）校长，对民族教育多有贡献。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共 12 册在贵州出版，是我国最早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

对贵大的贡献。私立大夏大学迁到贵州后，失去了在上海办学的优越条件，办学经费日益困难，校董会在 1942 年申请改为国立。2 月在行政院例会上，由军政部长、大夏大学董事何应钦提出大夏改国立的议案，蒋介石在申请书上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教育部长陈立夫顺水推舟，将大夏申请改为国立与贵州要求创办贵州大学的事一并处理，将私立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消息传出，大夏师生群起抗议，引起学潮。王伯群对教育部的决定表示愤慨，他对全校学生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在过去 19 年的岁月里，我当了 15 年校长，对大夏耗尽了心血，但我一无所求。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由上海迁到贵州来，也必须而且能够把它完整地迁回上海去。”接着，王伯群与教授代表金企渊、校友会代表王裕凯亲赴重庆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大夏乃私人出钱所办，并非政府所办。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经征得捐资创办人之同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学？诚问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有此先例吗？”此事陷入僵局，一方面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的方案



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全体摄影

已得蒋介石默认，另一方面大夏大学董事何应钦、孙科、孔祥熙、吴铁城等人都是政府要员，争执不下。董事会以张嘉璈、吴铁城为代表与教育部协商，4月21日行政院正式决定，“大夏大学照旧维持，除原有补助费外，每年度加拨50万元”，但大夏大学的文学院、法学院被拨归贵州大学。贵州大学设校址于花溪，在原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扩建，其实这片土地原先为大夏大学征购，已完成一期工程，所以贵大校园中有“大夏路”。

对师院的贡献。1939年，教育部制定《师范学院规程》，“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

以撤销，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师范院系”。1941年，教育部批准建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责令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师范两专修科并入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初办时，设有教育系、国文系、数学系、英语系和史地专修科、理化专修科，系的学制是四年，专修科三年，实际上是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和两专修科的演变。1944年秋，大夏大学迁至赤水，贵阳师范学院迁入大夏大学在雪涯路的校舍办学。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聘请大夏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夏元璠、著名文学家谢六逸（后任国文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曹未风为教授，又聘尹炎武（石松）为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聘杨宪益为英文系教授兼主任。总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师范两专科被划归贵阳师范学院，奠定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基础。

**影响** 私立大夏大学迁黔8年间，对贵州文化教育、社会进步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第二，结束了贵州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其一脉深埋于贵州，茁壮成长。第三，开启了国内学界科学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先河。第四，宝贵的“三苦”（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精神，成为黔沪两地的精神遗产。“三苦”精神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的理念，昭示着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理想来抵抗身处的苦难，通过知识的进步可以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这些理念成为华东师范大学、贵阳市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第五，1941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在贵阳成立时，大夏大学的招牌——教育学院和师范专科——划给了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大夏大学在花溪建的校舍，后来也成为贵州大学校舍的一部分；王伯群主持增设的大夏大学附中，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大夏大学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成立，理事会成员有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田君亮、曹未风等，提出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国家，粉碎敌人，争取最后的胜利”，并创办《抗建》《每周文艺》刊物，发表抗战文学作品。话剧和歌咏是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大夏大

学师生组织了“狼火剧社”“大夏青年剧社”和“大夏歌咏队”。影响最大的是“大夏歌咏队”，其宗旨是以歌曲“宣传抗战，团结同学，唤起民众，挽救危亡”，寂静的山城爆发出巨大的吼声，掀起声势浩大的歌咏运动。抗战时期，中学教育发展很快，急需中学师资，大夏大学在教育学院附设师范专修科和教育专修科，增强师资培养。大夏大学从上海迁来，于1938年6月增设附属中学，简称“大夏附中”，分初、高中两部，学制各三年。1939年，南宁大夏中学部迁到贵阳，学生分别插入各班。1944年“黔南事变”后，大夏大学迁往赤水，而附属中学仍留贵阳，校长王伯群先生去世后改名伯群中学。大夏附中是教育学院的实习基地，又是大夏职工的子弟学校，校长由王伯群兼任，教师多由大学教师兼任，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办学，强调“师生合作”“自强不息”和“三苦（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读）精神”，很快成为贵阳中学中的名校。<sup>①</sup>



大夏大学贵州校友会第一届全体理监事合影

<sup>①</sup> 史继忠：《大夏大学对贵州文化教育的贡献和影响》，《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1期，第87-93页。

大夏大学的知名校友有：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创始人柳谷书（柳传志之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周扬，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中国著名出版家、作家、儿童翻译家任溶溶，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思职，浙江农业大学教授陈子元，民盟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叶公琦等。

**回迁** 1944年，日军入侵黔南，大夏大学被迫紧急疏散到黔北县城赤水。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校长王伯群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请求救济，因病逝世。校董事长孙科召开董事会，推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在赤水继续上课。疏散前，大夏在贵阳有学生1450人，迁赤水后减少到863人，1946年又增加到1797人。1945年6月1日是大夏大学21周年校庆，王毓祥副校长撰写的楹联一副贴在大夏校门，其联云：“历尽万苦千辛，且喜来集斯宇；若要一劳永逸，还需打回老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夏仍在赤水上课。1946年5月大夏开始搬迁，于10月返回上海，10月28日举行开学典礼。1951年，私立大夏大学由人民政府接管，与私立光华大学合并，改组为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一所以培养教师为主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 国立湘雅医学院——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

198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院举行盛大建院70周年纪念会，海内外校友云集长沙，特别是当年湘雅村的老校友欢聚一堂，重点话题是谈湘雅村。他们在贵阳六年多，和湘雅村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引起了美好的回忆。湘雅村是个好地方，山有石洞坡，水有南明河，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宅口滩一叶叶扁舟，水老鸭（鸬鹚）时而潜入水底，时而站立在船舷，两三只合抱一条大鱼。因为战时通货膨胀，物价剧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肉，只好把实验过的狗、兔子煮熟，加些盐巴辣椒“打牙祭”，比现在吃山珍海味、人参燕窝还有味道。回想抗战时期在贵阳的六年，当年任生理学教授的朱鹤年还赋诗一首：“长沙迁往贵阳城，日机轰炸不安宁。次南门外建新屋，校址定在湘雅村。”老湘雅

村人，时刻惦记着当年他们居住成长的湘雅村。<sup>①</sup>

**西迁贵阳** 国立湘雅医学院的前身是私立湘雅医学院，1914年由湖南教育界人士组成的“育群会”与美国基督教“雅礼会”合办，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医学院之一。1931年，医学院与校董会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备案，保持中美合作办学的体制，学院自己行使管理权，经费主要由湖南省政府补贴，教育部资助，美国“雅礼会”补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湘雅医学院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继续维持正常秩序的医学院之一，一度收容60多名“借读生”，它的教学医院（湘雅医院）为战时病员提供服务。1938年，长沙情况危急，敌机时常来轰炸，经过反复考察论证，最后湘雅医学院决定迁往贵阳。



国立湘雅医学院迁至贵州贵阳办学

<sup>①</sup> 徐一鸣：《湘雅医学院与贵阳湘雅村》，载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编《贵阳百年教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938年7月，湘雅医学院开始搬迁，9月用汽车将学生和80吨图书设备经广西行程1400公里运到贵阳，10月11日完成搬迁工作；10月24日开始上课，比正常上课时间仅推迟三周。

**艰苦办学** 湘雅医学院到贵阳后，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租借七八处民居和旅社安置教职员工和家属，学生暂时借住在东山寺庙，借用阳明路贵阳医学院上课。1938年11月，租得次南门外窄口滩附近“长沙义园”的一片空地，修建湘雅医学院校舍，从此有了“湘雅村”这个名字。1939年2月4日，日机第一次对贵阳市进行轰炸。1940年7月12日日机再次轰炸，湘雅医学院动物室和附近的建筑物被毁。湘雅医学院的人员在贵阳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没有电灯，夜间点煤油灯或汽油灯。没有自来水，学生轮流赶着牛车到河里取水，只能晚上供给每个女生一瓢热水；男同学只能用冷水，后来就干脆下河洗澡、洗衣、洗被子。

随校迁来的学生有120名，分成4个年级，1940年招生160名，其中女生55名，占34%。1945—1946年共招生259名，在贵州期间共毕业8个班，150名学生。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湖南，其余来自广东、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江苏、河北、辽宁、山东、安徽、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他们大半是从沦陷区逃来的流亡学生，多无经济来源，学校的补助有限，生活很清苦，但是在战时状态下能坚持上大学，他们感到非常幸运，学习上自觉、勤奋、刻苦。学生们组织了“自助会”，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帮助贫困学生，并以缝衣、种菜等方式自救。

**师资力量** 湘雅人办学一向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即使在抗战时期的贵阳，条件差且困难多，这种优良的办学精神仍然得到了保持和发扬。原任校长王子玕于1937年受命调任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1939年8月校董会推选张孝骞为院长。张孝骞是长沙人，湘雅医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先后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深造，是著名的内科专家。学院有随校迁来的14名教授，5名副教授，15名讲师和6名助教。当时在贵阳的专家

很多，如贵阳医学院院长、热带病专家李宗恩，中央医院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等，又增聘 10 名名誉或兼职教授。学院领导以身作则，把教学放在首位。张孝骞院长，教导主任吴执中，训导主任白施恩、王肇勋，总务主任张德威、凌敏猷教授等，都是一面干行政工作，一面担任教学医院的工作，甚至有时上几门课。湘雅医学院与中央医院密切配合，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张孝骞兼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在中央医院兼任科主任或主治医师，中央医院院长及医师在湘雅医学院授课，相互支持，不取报酬。基础课由本院教师授课，李绍文教生物学，王承书教物理、数学，龙康侯、谢祚永教有机化学，朱鹤年教生理学，王肇勋教解剖学，张德威教组织学，白施如、刘秉阳教细菌学，徐荫祥、潘世箴教病理学。临床课由学院和中央医院专家讲授指导，内科学教师有张孝骞、吴执中、齐镇垣、李明俊等，外科学教师有沈克非、袁道、许殿乙，儿科学教师有钟世藩、杨显素、梁觉如，妇产科学教师有何碧飞、吕淑贤，神经科学教师有凌敏猷、黄友歧，热带病学教师有李宗恩，眼科学教师有陈世彬、张俊杰，耳鼻喉科学教师有陈世彬、林苻周，皮肤病学教师有秦作樑，公共卫生学教师有施正信、赖斗岩，放射学教师有荣独山、黎光旭。

**校风校纪** 湘雅医学院是一所六年制医科大学，设有医学本科。办学宗旨是把学生训练成好公民、好医生，宣扬公医制度的优越性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重视医德和医术的培养，要求学生“求实求确”，培养科研能力。办学目标是在战时及战后都办成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其办学特点概括起来包括：实行长学制；聘任合格的专业教师；加强基础训练；注重实验、实习；注意医德培养；注重英语教学；严格考试制度；实行淘汰制。前 5 年的教学时数，30% 为课堂讲授，70% 为实验和实习，第 6 年为医学实践，临床教学在中央医院和门诊部进行。上课不指定教科书，不发讲义，教师用英语讲课，学生必须做笔记，用英语提问、答题、写病历和实验报告，重视实际操作，每 4 人发 1 具尸体，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人体解剖。实验必须精确，达不到标准必须重做。在实习中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根据病情正确判断、诊疗，认真体会病人心理。

考试制度严格，除常规的月考、期考以外，随时都有小考，实习有前期考试和后期考试，实行“诚实考试”，一旦发现作弊，严肃处理，甚至开除学籍。考试或实验不及格可以补考，再不及格则留级；实习不合格不准毕业。

**贡献** 抗战以前，贵阳医学教育一片空白，不但没有医科大学，就连中等医事、护士学校都没有。抗战期间，湘雅医学院在贵阳办学6年之久，对贵阳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加上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建立，中央医院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内迁贵阳，使当时贵阳的医学教育水平和医疗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前后培养出了290名合格的高水平医师，如贵州省原工人医院院长、骨科专家孙其发主任医师，遵义医学院前院长、腹部外科专家陈荣殿教授，耳鼻喉科专家杨大俊教授，都是曾在贵阳学习毕业的湘雅老校友。这些校友后来成为新中国各大医学院校、医学科研单位或卫生防疫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或研究员，为发展我国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4年“黔南事变”，日军侵入独山等地，湘雅医学院被迫离开贵阳，迁往重庆杨公桥。1945年8月，日本投降，湘雅医学院迁回长沙，1953年改为湖南医学院。

### 国立贵州大学——贵州规模最大、科系比较齐全的大学

贵州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规模最大、科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先设贵州农工学院** 1939年，贵州省参议会提出设立贵州大学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议案，由贵州省政府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经行政院议定，先设立贵州农工学院。1940年12月，教育部电令组织贵州农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以叶秀峰为主任委员，欧元怀、王克仁、商文立、虞振镛为筹备委员。1941年10月，叶秀峰来贵阳考察，选定在贵筑县花溪建院，计划用地2000余亩，因其中600亩水田多次洽谈未能购置，只征购土地1006亩，与贵筑县政府协商，

改定划山地补换，将石头村一带贵阳女中校址连同荒坡千余亩转让给农工学院，占地 2000 余亩，即原贵州农学院旧址。这里风景优美，环境清幽，最适宜办学。10 月划定学校范围动工兴建，1943 年初具规模。

**农工学院师资** 1941 年 10 月，正式建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以李书田为院长。李书田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科，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历任北洋大学土木工程、铁路及道路工程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第一水利实验所所长。上任后聘请了 40 名教授、副教授到校任教，这 40 位教授多为国内知名人士，人才济济，一时之盛。有两名贵州籍学者罗登义、花莱峰受聘为教授。

罗登义，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毕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时任浙江大学农业学系主任，应李书田院长邀请兼任贵州农工学院教授。

花莱峰，清代循吏花杰之后，少时读南明中学，考取留日公费生，毕业于帝国大学电机系；周西成执政时，委任花莱峰为建设厅技正，他点燃了贵阳第一盏电灯，被称为“光明使者”，1941 年受聘为农工学院教授。农工学院设有农林、农化、农经、土木、机电、矿冶六系及大学先修班。1941 年 3 月招收 3 个先修班，8 月招收 6 个系一年级新生，12 月 20 日开学上课。

**国立贵州大学成立** 1942 年，时值私立大夏大学办学经费困难，申请改为国立。大夏董事长何应钦在行政院例会上提出议案，蒋介石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教育部长陈立夫顺水推舟，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成立国立贵州大学。此事遭到大夏大学董事长何应钦、校长王伯群及大夏师生抵制，但建立国立贵州大学已成定局。以贵州农工学院为基础建立贵州大学，1942 年 7 月正式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张廷休为校长。

**师资** 张廷休任校长后，致电李书田院长，表示原聘教授、副教授一律续聘，并在重庆等地招聘一批教授，如著名地质学教授丁道衡、乐森璋，著名物理学教授张永立，矿冶学教授崔有濂，数学教授任孟闲，化学教授杨葆昌，机



1942年成立的国立  
贵州大学

电工程教授竺良甫，土木工程教授葛天回，经济学教授李法宗、刘行骅，英语教授任泰、潘家询，历史学教授姚薇元，社会学教授吴定良等。还聘请茅以升、虞振镛、叶元龙、柳翼谋、任可澄等为特约讲座教授。下面重点介绍在外成名又来到贵大的贵州籍教授。

张廷休，安顺人，南京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回国后任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教育部主任秘书兼督导战区教育，蒙藏教育司司长，高等教育司司长，贵州大学校长。

丁道衡，织金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内蒙古白云鄂博大铁矿，1933年12月，他在《地质汇报》（第23号）发表了著名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首次将白云鄂博铁矿公布于世。他在结论中说：“若能在包头附近建立一座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言”“将促使中国的西北地区发达起来。”<sup>①</sup>丁道衡记录大量资料，收集地质资料35箱，风俗物品3箱。1935年留学德国，回国

① 包钢档案馆供稿：《白云鄂博的发现者丁道衡》，《西部资源》2011年第1期。

后任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1942年受聘为贵州大学教授后任矿冶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兼地质系主任，被选为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1949年8月，这位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学潮”的罪名关押囚禁，经多方营救出狱。丁道衡虽然身兼数职，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在北疆的白云鄂博，1950年，当他听到政务院派地质调查队开赴白云鄂博，开始大规模地质会战后，他激动地抹着脸上的泪光，祝福白云鄂博早日开发。1955年2月21日，这位对祖国铁矿资源和稀土资源做出卓越贡献的地质科学家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6岁。



丁道衡



白云鄂博铁矿区街中心花园前  
丁道衡塑像

注：“没有丁道衡，就没有包钢。”内蒙古人民为了纪念丁道衡教授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于1987年在白云鄂博区街中心花园，为他建立了大型塑像，这是贵州籍科学家在全国的第一座塑像。



乐森瑀

写出了数十篇调查报告，为这些资源的开发做了良好的基础。<sup>①</sup>此外，乐先生还是我国最早研究珊瑚化石的著名学者之一，对四色珊瑚完成了种属的总结和量定，提出分类学与系统演化方面的重要知识，被誉为中国珊瑚化石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贵州工作期间，对梵净山地矿、标水岩铜矿、万山汞矿、黔中的铝



张永立

乐森瑀，贵阳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奋斗65个春秋，是一名地质学家、教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回到贵州，先后担任贵州矿产测验团主任、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克服重重困难，以调查地质矿产为己任。他很热爱贵州，“我们贵州是块宝地，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若能开发地下资源，发展经济，就能摆脱贵州贫苦落后的境地，走上富裕之路”。乐先生还跑遍了贵州的东南西北，探测了煤、铁、铝、汞、铜、锰、金等多种矿产资源，

矿和煤矿进行了考察，绘制了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质略图》《贵州矿产分布图》，编写了《贵州煤、铝、汞、铁四大矿产概要》，为贵州的地质勘探和矿产资源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

张永立，贵阳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获博士学位，受聘为贵州大学理工学院教授兼数理系主任，是世界锥体物理学八大奠基人之一。在分子振动理论中有一个函数是以张永立的名字命名的。张永立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1912年生于贵阳，青少年时代就读正谊小学和模

<sup>①</sup> 于洸曾：《业绩永在，风范长存——缅怀尊敬的乐森瑀教授》，《贵阳文史资料选辑》2005年第14辑，第38-40页。

范中学，中学时对数学和英语特别用功，常常躲在书房里演算数学习题，随时抱着一本《英汉字典》反复查阅。1931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震旦大学数学系，在校期间发表数学论文，并利用课余时间写成了《矢算初步》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1935年后，自费到比利时鲁文大学深造，其指导老师都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如世界数学学会名誉主席瓦尔·甫山教授和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雷美德教授。留学期间他撰写了《宇宙线和乙烯分子的振动》一文，获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学生在比利时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时年26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永立怀着“抗日救国”的思想，离开比利时，回到中国，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大夏大学担任教授。1941年返回贵阳，受聘为贵州大学理工学院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他与谢六逸一起主持文通书局编辑所的编务工作，主编《应用科学》丛书，出版了《实用实验诊断》《黔省柞蚕问题》《农田水利》《中英德法对照土木工程词汇》《防沙保土》《中国农业史》《民众营养》等科学专著，促进了贵州科学技术的繁荣。他工作之余还举办科学讲座，介绍激光、原子反应及天文学知识，深受群众的欢迎，并兼任中国天文学会贵州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张永立赴云南大学讲学，受聘为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于是定居昆明。

葛天回，毕节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

任泰，安顺人，任可澄长子，美国欧柏林大学硕士，哈佛大学研究员，历任外交部翻译，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英语教授，又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所长、教务长。

杨葆昌，贵州人，北京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化学硕士，曾任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

贵大教师中有教授会、讲师会等组织，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对教学、科研、教师聘任及学校大事产生重要影响。贵大有“文社”“诗社”“会

计学会”“南洋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办有《贵大学报》《文风杂志》《工商管理》《行行》等刊物。抗战胜利后，外省的教师返回家乡，有的到外地谋职，教学一度受到影响。学校采取措施，新聘了一批教授、副教授、讲师，1948年前后，全校有教师239人。这一时期，作家蹇先艾被聘为中文系教授，朱厚锬被聘为外文系教授，顾光中被聘为生物教授，项英杰被聘为历史系教授，李独清、张英骏、谭勤余、张汝舟等或兼职教授，或改任贵大教授，田君亮、刘方岳等名教师担任特约讲座教授。

**院系设置** 贵州大学成立之初，除农工学院外，增设文理、法商学院。农工学院保留原有的6系设置；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社会、数理、化学5系；法商学院设政经、法律2系。1943年，将农工学院分为农学院和工学院，农学院下设农学（后改为农林、农艺）、农业化学、农业经济3系，顾青虹、罗登义、张丕介先后任院长；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矿业工程和机电工程3系及两年制电机专修科，丁道衡、竺良辅先后任院长。文理学院后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3系，任泰任院长；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地质学3系，丁道衡任院长。法商学院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和工商管理4系。全校共有5个学院、16系、1个专修科。1944年7月设立文科研究所，工学院和电机工程系增设电机专修科。是年冬，日寇入侵黔南，学校疏散遵义。1945年春日寇撤退后，学校迁回原址，工学院同时也从安顺迁回花溪。同年史社系改为历史系，农林系改为农艺系。1946年学校增设地质系。贵阳解放前夕，学校共有文理、法商、农、工4个学院，下设16个系、1个电机专修科，另有大学先修班、文科研究所和附属工业职业学校。

**学生培养** 国立农工学院自1941年春开始招收先修班学生，贵大成立后继续开办，招收高中毕业生，不收同等学力，修业期为1年，各科成绩合格者免试升入本科。原设立在安顺的贵州省立安顺职业学校，1943年由贵大接办，改为国立贵州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由花莱峰任校长。1947年在石头村办贵

大子弟小学。1945年开办文科研究所，分为中国文学部和西南文物研究部，聘任可澄为所长。任可澄病故后由其子任泰继任，任泰与德国教授鲍克兰为研究员，苗族学者杨汉先为助理研究员。为保证学校用电，设有贵大电厂，花莱峰为总务主任兼厂长。学校还办有农场，设有工程处。

农工学院1941年招收的学生1945年秋毕业，是贵州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42年在校学生400人，1947年已有学生1156人。学生来源广泛，除本省高中毕业生外，大多是外地流亡学生和华侨归国学生。到1947年毕业3届学生，共计444人。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的必修课，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个人兴趣爱好跨院系选修其他课程。教师要求学生写读书报告和学年论文，毕业班写毕业论文。学生中建有学生自治会、女同学会、华侨同学会及各系学生会、班会，还有贵大剧团、国剧（京剧）社、音乐社、美术研究社等文艺团体。

**贵大停办及恢复** 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根据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高等学校的布局，并结合贵州生源不足的实际，1953年教育部决定撤销贵州大学。其工学院各系分别调入重庆大学和昆明工学院，理学院分别调整到云南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法商学院的系科分别调整到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政法学院，文学院的中文、历史两系调整到贵阳师范学院，农学院在原址独立为贵州农学院。贵州大学的所有图书、仪器，除农学院保留了部分，法商学院分到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政法学院外，绝大部分图书则由赵凤岐校长带到云南，赠给了云南大学……现尚存于云南大学图书馆中。国立贵州大学自1942年成立，至1953年院系调整时撤销，最后图书、仪器分散流失，教学人员星散。从教育事业的长远利益看，贵州大学撤销，对贵州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一影响，逐渐反映出来。1958年，中共贵州省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会议上的指示，重新恢复贵州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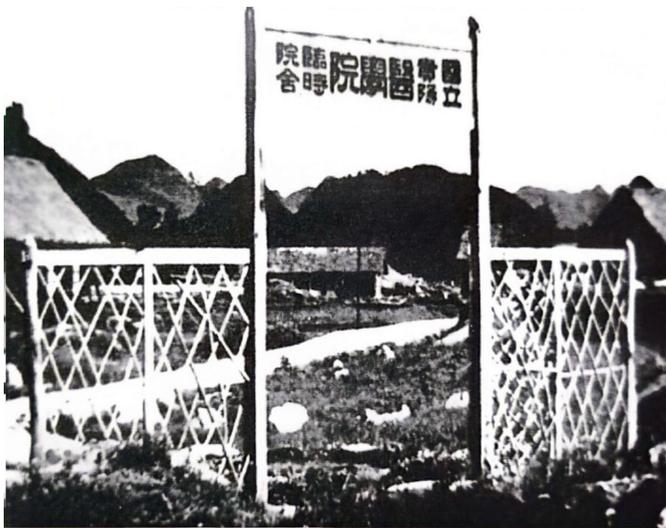
## 国立贵阳医学院——贵州第一所正规高等院校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于1938年3月1日，是贵州第一所正规的高等院校，也是当时全国9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

**创办**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华东地区大举进攻。北平协和医学院及保定河北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受到极大威胁，不少师生被迫离校向南撤退。教育部考虑到战时急需医务人员，为使流亡教师有书可教，流亡学生有书可读，决定在武汉新建一所医学院。1937年12月，教育部派北平协和医学院原教授李宗恩、公共卫生专家朱章赓和妇婴医学家杨崇瑞组成武昌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李宗恩任主任委员。筹备刚开始，武汉已危急，为安全起见，教育部决定将筹备中的武昌医学院改为贵阳医学院，增聘张志详、杭立武为委员，成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并将拟拨给武昌医学院的16万元按七折拨给贵阳医学院作为开办经费。1938年1月中旬，开始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等地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沦陷区的流亡医学生，共招收新生266人，以协和医学院学生为主，其次是河北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的流亡学生，一律免费入学，发给贷金。除贵阳地区学生外，均由招生处负责输送学生至黔。在汉口招收的学生，由汤佩松和齐登科等教授带领，从武汉出发，经重庆转抵贵阳。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任命李宗恩博士为院长。此时的贵阳医学院成为全国仅有的9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1947年7月，李宗恩院长调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教育部另聘任朱懋根教授为院长。

**办学艰难** 贵阳医学院初创时有两个明确目的：一是收容来自战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完成学业，使其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学校是在没有一间校舍的情况下成立的。学校暂借在贵阳中山东路王家烈公馆办公，以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为临时校舍上课，教职员工大部分住王家烈公馆，学生分住在省立医院（今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场路新世界旅社。1939年“二四



1938年3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

轰炸”后，为了便于防空疏散，在六广门外的一片空地上修建了19栋茅草屋用作学生宿舍，这便形成了“盐务新村”。后又在小宅吉建了8栋简易住宅，作为教职工宿舍。均为茅草顶、竹泥墙结构，贵医人诗意地把自己的学校称之为“草棚大学”。1940年，李宗恩接受了美国“洛氏基金会”捐赠的2万元，在贵阳南郊太慈桥购买了100多亩土地，修建了一座两层的教学楼，之后又增修一些宿舍，师生随即转到新校舍上课。建校后最大的困难是教学仪器缺乏，李宗恩院长与中央医院、省立医院、湘雅医学院等单位商定借用事宜，同时积极筹款订购一批图书和仪器。

**专业设置** 贵阳医学院的专业设置包括医学本科和职业专科，本科5年，专科3年。第一批在武汉等地招来的学生因为来源不同，程度不一，编为一至五年级各班，医事职业专科分为护士班和助产班两个班级，1940年又增设卫生工程专修科。1941年设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设有住院部和门诊部。1942年将医事职业专修科改设为贵阳医学院附属高级职业学校，设护士、助产两科。1946年增设药学专修课和医事先修班。由于战时急需医务人员，不能按照常规

秋季招生，有时会在春季招生，并允许招收插班生。

**师资** 抗战时期在贵阳医学院的教师，有许多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李宗恩（1894—1963），留美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热带病学专家。朱章赓是全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曾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公共卫生科主任，后调任卫生署长；担任贵医筹备委员的杨崇瑞是妇婴卫生科专家。杨济时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留美血液病专家，曾任湘雅医学院教务长、贵阳医学院内科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内科专家王季午任院务主任，外科专家周德裕任总务主任兼附属医院院长。郭一岑是留德心理学博士，任贵阳医学院心理学教授。杨葆昌留学英国、美国，任贵阳医学院化学科主任。贾魁为防疫专家，曾任贵州省防疫医院院长。朱懋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留校任教。杨静波、柳安昌、徐会渊、汤佩松、严镜清、秦作梁、沈隽祺、李瑞林、高永恩、宋杰、袁印光、程玉林、李葆真等一批专家均在贵阳医学院任教。

迁来贵州的医疗单位逐渐增多。中央医院在贵阳成立了分院。国际红十字会也有了贵阳分会，原先在协和医学院任教的林可胜教授指导的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在贵阳郊区的图云关落脚。经贵州省财政厅长周诒春推荐，李宗恩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的会长。这些机构彼此协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关系紧密。贵医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帮助。进口的药物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得到补给，他们还贵医输送了一部分师资。

**人才培养** 为了让医学科学在西南扎根，赢得贵阳人对新医学的了解、信任和热爱，反对愚昧落后，李宗恩让弟弟帮他写了一个宣传新医学的话剧，他亲自登台演出，解释新医学：人是一个整体，在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心理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依靠药物来对付某些症状，是等而下之的方法；细心的护理应包括帮助病人建立信心，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药物就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话剧演员都是医学与护士班的学生，气氛很是热烈。医学院还有一个教学医院的问题，自己办又无可能，李宗恩就找省政府商量借用省立医院，由贵医派教学医生去充实那儿的力量。省立医院的院长是 1932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朱懋根，一切都好商量。但是省立医院的经费不多，当时贵阳文化落后，认为新医学就是“开肚子”，没有什么人敢以身试“刀”，所以省医的外科既无器材，也缺少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和护士，甚至连切除盲肠那样的小手术都没有做过。

为了解决这一类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宗恩耗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半年后，贵医又加办了医士职业科，分别开办了三年制护士班和助产士班。三年后，有了这批专业人才，贵医就办起了门诊部，将其扩充为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并在其后办起了卫生工程专业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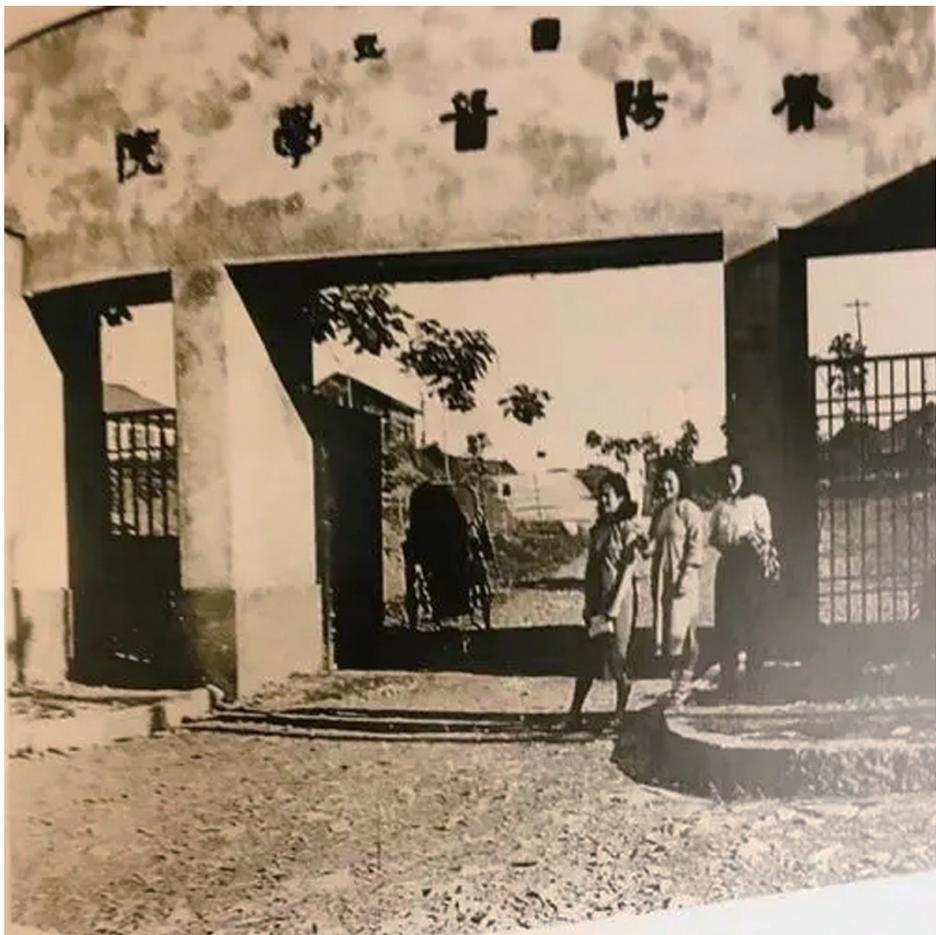
1944年冬，日军入侵黔南，贵阳医学院奉命迁往重庆，学校设在歌乐山，图书和仪器存放在贵阳留守处。贵阳医学院的学生与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学生合班上课，并以中央医学院作为实习的医院，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李宗



位于两广会馆旧址的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恩奉命接办协和医院，并带走一批协和的师生。外地来的教师和贵阳毕业留校工作的学生，有的到天津、杭州谋职，有的赴美深造，有的复员回家，导致师资力量大为削弱。教育部打算将贵阳医学院并入上海医学院，在校师生和校友坚决反对，强烈要求“一定要将贵医办下去”，于是由朱懋根继任院长，并迁花溪复课。

从建校到1949年，贵阳医学院共毕业417人，其中，医学院本科16期，



国立贵阳医学院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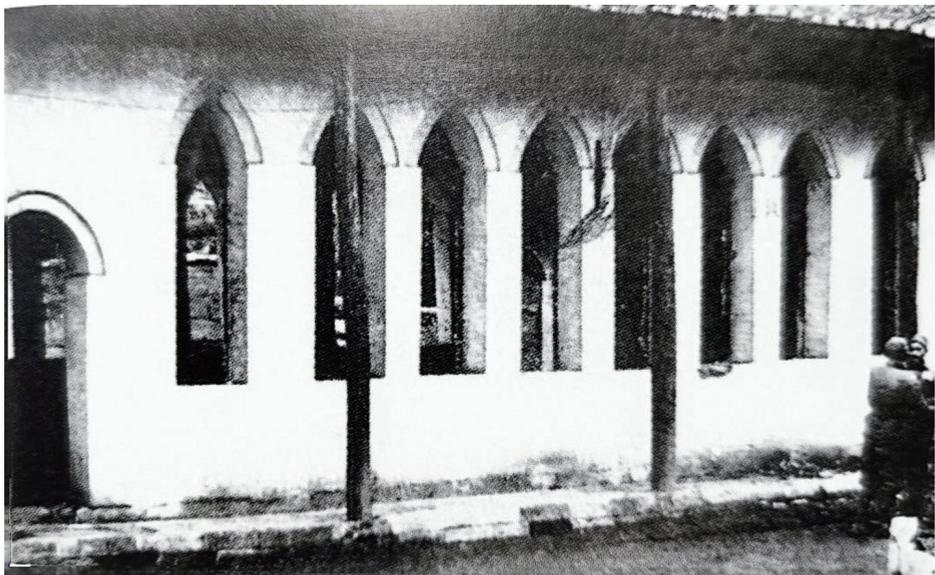
239人；护士班15期，113人；助产班11期，44人；卫生专修科4期，17人；药学专修科1期，4人。

**发展**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件通知：中央决定凡公立各院校、馆名称，概不加“国立”。因此，国立贵阳医学院于1950年12月24日起，取消“国立”两字，正式更名为“贵阳医学院”，划归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全校师生精神振奋，学校面貌焕然一新。2015年，学校成功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贵医人主动作为，顺利整合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服务贵州“大健康”战略，成立大健康学院，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学校始终秉承老院长李宗恩倡导的“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的精神，坚持“文化建设、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努力建设“具有明显特色、西部一流、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医科大学”。

###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教育的福音

抗战期间，贵州中等教育发展较快，除国立中学外，新增了几所省立中学，县立中学也普遍建立起来，还办起若干私立中学和职业中学，迫切需要培养大批中学师资。而贵州尚无师范学院。

**创办** 省参议会多次建议筹建一所师范学院。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0年来贵州视察，也认为“要培养师资以健全各级教育”，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和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张廷休是贵州人，极力倡导在贵州创办师范大学。194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并将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并入贵阳师范学院，拨30万元启动资金，明确常经费31.2万元，聘任王克仁为院长，于10月20日正式开学。师院草创期间，既无校舍和设备，又缺师资，暂借文化路贵阳师范学校部分校舍和教室上课。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于1941年6月创立，  
校址在雪涯路（今文化路）

**师资** 王克仁是贵州兴义人，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湖北蓝田师范学院教授，1940年起任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学院建立后，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到学校任教。王克仁四处奔走，招聘教师，聘留法教育学家熊铭清为教务主任，聘留美教育家袁公为训导主任，聘留日机电工程师赫星吾为总务主任，聘贵阳文字学家向知方为院长秘书，聘请大夏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元璠、著名文学家谢六逸、著名翻译家曹未风为兼职教授，聘尹炎武（石公）为中文教授兼国文系主任，聘杨宪益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聘李锐夫为数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聘黄国华为生物学教授，聘陈逵、戴乃迭（杨宪益夫人，英国人）为外文教授，聘李独清为国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教授），聘张汝舟为讲师、副教授。到1943年，学院共有教师48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

8人，讲师10人，助教8人。

**专业设置** 学院建立后制定《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组织大纲》，明确“以养成优良健全之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根据贵州的需要和师资情况，起初设立教育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及史地、理化两专修科。1942年增设体育童子军科，同年建立师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各系学制4年，毕业后可任高中教师；专科学制2年或3年，毕业生只能担任初中教师。教育系由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演变而来，专业课主要有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考虑到学生毕业后不一定都担任教育科长、中学校长或教导主任，于是采取补救措施，加开国文、外语、数学等课程，以便学生能够担任专科教师。国文、数学、英语是主科，本院师资也充足，所以单独设系。历史与地理、物理与化学合科，一方面是中学课程设置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师资不足，没有单独设系的条件。因为当时各中学都要进行童子军训练和开设体育课，所以设立体育童子军科，起初学制为3年，后改为2年。原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全部转入贵阳师范学院，1941年8月招生182人。1942年有本科生190人、专科生73人。1943年有本科生175人、专科生93人。

**发展** 1943年7月王克仁辞去院长职务，教育部改派齐泮林为院长。齐院长是河北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到任后，原聘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先后离去，改聘范传坡为教务主任、刘文修为训导主任、侯潘为总务主任。新聘了一批教授和副教授，如化学系教授谭勤余、数学系教授赵咸云、中文系教授王驾吾、中文系教授谭戒甫、教育系教授王学孟、童体科副教授杜化居等。1944年7月，改史地科为史地系，改理化科为理化系，本科生283人，专科生91人。1945年增设先修班。大夏大学迁走后，贵州省政府决定将大夏在雪涯路的校舍拨给贵阳师范学院，占地44.25亩，但房舍不多。学校走上正轨，由院长、各处主任、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院务会议，讨论和审议重大事项，还设有教务会议、教员升等审查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教职员福利金管理委员会。齐泮林一心办学，不问政治，

以超然的态度处事。因是外地人，又不善交往，与外界少有联系，不适应当时的社会，不愿再当院长，1946年暑假回家探亲，一去不返。

1946年11月，教育部电令称：“齐已应北大之聘，所以免去其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职务，并派杜叔机接任。”杜叔机是师院兼职教授，又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师生们提出“不要政客，要学者”的口号，组织“拒杜运动委员会”，要求教育部取消这一任命。教育部为缓和矛盾，做出让步，命令杜到英国考察两个月，院长一职由曾景代理。曾景是留德哲学博士，师院教授，暗中加入军统，很有政治手段。他上任后与教授会交涉，承诺不会解聘参与“拒杜”的教师和学生，并且经费开支将受教授会监督，历时4个月的“拒杜运动”渐渐平息。他聘请德高望重的王佩芬教授担任教务主任，并任命江西同乡徐儒教授为总务主任。此时师院的外地学生很多，成立了“湖南同学会”“安徽同学会”“江西同学会”等组织，院内的空缺多由同乡充任。抗战胜利后，部分教师返回原籍，1947年底全院教师共62名，其中，教授29名，副教授11名，讲师14名，助教8名；兼职教授12名，副教授4名，讲师9名。1947年师院到四川、云南、湖南、江西等地招生，连同本省新生共150人，在校学生共481人，其中，教



萧文灿

育系108人，国文系82人，英语系46人，数学系33人，史地系68人，理化系41人，体育童子军科42人，先修班61人。曾景在任时乱发聘书，财务混乱，出现贪污事件，1947年1月贵阳市法院审理曾景贪污案，造成不良影响，教育部不得不将曾景免职。

1948年教育部任命萧文灿为院长。萧文灿是贵州赤水人，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对新兴的《赋值论》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回国后，萧文灿先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担任数学教授。他热心教育

事业，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良好读书风气，从上任开始，就在《贵州日报》上宣称：“此后当本终身于教育的初衷，先求安定，后求充实，使贵州教育与时俱进。”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勤奋用功，将来做个合格的教师，才不致误人子弟。”希望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又对教师说：“从事教育工作，要有蜡烛一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贯彻始终的高尚情操，才能终身安于教育而不见异思迁。”他到南京、重庆、武汉、长沙等地招聘了10多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如聘梁祖荫、张英骏为地理教授，聘胡嗣仁为化学教授，聘朱厚锬为外语教授，聘武汉大学研究生周春元为历史系副教授，聘陶行知的弟子戴自庵为师范附小校长等，还聘田君亮、刘方岳等为特约教授。

戴自庵是贵州广顺州（今长顺县）人，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者。16岁考入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28年考入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接受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后创办南京燕子矶乡村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园、上海乡村幼儿园。1934年任“北平幼稚师范乡村教育实验区”副主任，当时北平的幼稚园教师大都出自这个实验区。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师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回贵州，在“贵阳青岩义务教育实验区”工作，受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长袁超俊委托，安排周恩来、李克农、博古等人的家属在青岩居住。而后，在桂林师范学校和达德中学任教务主任。1938年任师院附属小学校长，戴自庵认为，这是一所实验国民基础教育的学校，是师院的教学实验基地，也是师院教职员工的子弟小学，应遵循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办学，培养学生的自立精神和爱好科学的精神。教唱《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强调学风取决于教师的教风，严格教学制度和学生的升留级制度，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品德培养和知识传授，办学有声有色。

1948年师院新图书馆和理化实验室落成，动工修建礼堂。10月22日，举行师院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并出版院庆特刊《院闻周报》，强调“以新作

风培养新校风，以新校风建设新教育，提倡教授治校，指导学生自治，注意实事求是”。师院成立了“教学实习指导委员会”，负责计划、指导、考核学生学习，借以提高教学质量。出版了《贵阳师范学院院刊》《新师院》《教育学术》等刊物，组织学术性团体“南明学会”。1949年，师院共有教师92名，其中，教授39名、副教授10名、讲师8名、助教16名；在校本科生427人、专科生69人。从建校到1949年共毕业学生399人，其中，本科生299人，专科生100人。

1949年3月，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反饥饿运动”，师院召开“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全体学生抢救教职员学生饥寒运动大会”。1000多人上街游行，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三校教授会联席会议发表《教授会联合会要求改善待遇宣言》。国民党崩溃前夕，企图将贵阳各大学迁走、遣散，师院师生坚决抵制，保护学校安全。11月15日贵阳解放，师院于17日复课。

**更名**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取消“国立”二字，定名为“贵阳师范学院”，成立师院临时管理委员会，萧文灿为主任委员，胡嗣仁为副主任委员。不久，萧文灿辞去院长职务，调任贵州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划按照壁山、思贤山一带为师院新院址，占地372亩，新校舍于1953年竣工，9月15日在新校舍开学。同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将贵州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师并入贵阳师范学院，将贵阳师范学院外语、教育两系学生调往西南师范学院和昆明师范学院。调整后，贵阳师范学院设有中文、俄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7系及中文、历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艺术、体育8个专修科。当年在校学生979人，其中本科377人，专科602人，一半以上是四川、云南的学生。

1956年，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交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1958年，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内以联合办学的形式成立新的贵州大学；1959年，贵州大学从本校分出；1985年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沿用至今。

## 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在贵阳办学时间最短的大学

抗战时期迁到贵州的工科大学还有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在清朝道光年间，宁波教会办的崇信义塾，后来迁到杭州；于清宣统三年（1911）改称之江大学；1940年改为私立之江大学，设有工学院、商学院和文学院。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41年先迁安徽屯溪，后迁上海。1943年，之江大学工学院迁入贵阳市郊花溪，成为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贵州分校，下设土木、建筑、机械、化工等4系，同年招生100余人，在花溪开始上课，校长李培恩。1944年北迁重庆。1945年迁回杭州。

## 四、职业教育有较大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沦陷，东南沿海城市相继陷落，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资源被日本侵占，农业、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军需、民用奇缺，开发西南大后方成当务之急。贵州资源受到重视，开发贵州资源对促进西南各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批机关、学校、企业内迁，资金、人才向贵州流动，战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急需各方面技术人才，发展职业教育被提上重要日程。

1937年，贵州省政府和教育厅先后制定了《贵州省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章程》《贵州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方法》和《贵州省推进职业教育计划》。1939年6月成立贵州省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负责辅导各职业学校教学、教材及辅导员进修事宜。委员会由教育厅、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农业改进所、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农村合作委员会、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单位负责人组成，教育厅长张志韩为主任委员。为研究职业教育，协调教育部门与实业部门的关系，共同规划、统筹职业学校的设置，协助解决职业学校教师、生产实习及职业学校毕业生分配等问题。同时成立贵州省建教合作委员会，委员由民、财、建、教四厅及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农业改进所、农本局贵阳办事处、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西南公路管理局、农村合作委员会等单位负责人组成，主任委员由教育厅长张志韩担任。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贵阳通讯处成立，以“为个人谋生，为个人服务社会，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为宗旨，宣传职业教育，研究和改进职业教育，协助贵州发展职业教育。

抗战以前，贵州的职业教育落后，学校少，规模小，只有初级职业学校和讲习所、传习所，集中在省城贵阳。最早的是贵州省立贵阳甲种农业学校，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贵州官立蚕桑学堂，1908年改为贵州官立农林学堂，

1912年改为贵州省立农林学校，1916年改为贵州省立贵阳甲种农业学校，设有农科、林科、蚕科，并附设女子蚕桑丝业传习所，属初级农业职业学校。1928年因开办省立贵州大学，将甲种农业学校停办，1935年设立贵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设森林科和农作科，学制3年。卫生方面仅有省立医院附设的产婴医科传习所，工业和商业均没有职业学校。

抗战期间，职业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创办了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贵阳市商业职业学校，贵州的职业教育由初级发展到高级，并由农业扩展到农业、工业、医事、商业各个方面。国立贵州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国立贵阳医学院附设贵州省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中央医院创办附属职业学校，教育厅与贵州企业公司合办贵阳市商业职业学校，还建立贵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私立尚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由广西迁来，又开办私立黔筑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和私立贵州会计专修学校。

1945年，贵州全省有职业学校13所，学生1204人，并在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附设职业科。和抗日战争前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和其他各类教育相比，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不但学校少，规模小，平均每校仅百人，而且多数学校集中在贵阳，7个职业学校区中有3个未设职业学校。

### 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贵州是农业大省，职业教育中最先受到重视的是农业职业教育。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是贵阳乃至贵州历史最悠久、设备条件较好、规模最大的一所职业学校。学校坐落在贵阳城南油榨街，校舍建设古朴典雅，环境优美，四季花木争相开放，有田土山林数百亩作为实习园地，是学习的理想场所，贵阳城内许多人把学校作为休闲旅游的地方。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源于清末的蚕桑学堂、农林学堂和民国的贵州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贵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1937年改组为贵州省立贵阳职业学校，次年改森林科为高级森林

科，增设高级土木工程科和高级农艺科，成为一所兼有工农业的高级职业学校。1939 年为避免日机轰炸，学校先后疏散到清镇县卢荻村及贵阳市郊中曹司麦兆村。新校址地处偏僻，交通及环境条件都很差，有很多困难，教师变动大，学生不能随去的也多，教学情况不如从前，校长龙之田继续负责到暑期就辞职了。

1941 年学校迁回油榨街原址时，校舍已被炮兵司令部占用，学校财产和教学设备损失殆尽，不得不重新建平房做校舍，但是经济困难，一直未能恢复，全校农场土地不到 10 亩，生产工具仅有 10 多把锄头，校舍简陋，缺乏实验场地与生活活动场地，生活用水困难，教学设备缺乏，学生膳食难办，学生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困难。同年，贵州省立贵阳职业学校分为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7 年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初设高级农艺科、园艺科和农产制造 3 科，招收初中农业学校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的学生。1948 年增设森林科，农产品制造科停止招生。1949 年全校共有 10 个班，学生 169 人，教职工 42 人。

省立贵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虽然在抗日战争后办学条件较差，规模不大，但它在贵州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起着开创性的作用。它是在贵州解放前的职业学校中存在时间最长、毕业学生最多的学校，在农业技术人员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对贵州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贵州解放后，由省农业厅接办，改为贵州省农业学校，长期延续，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中等农业技术人员。

### 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规模较大，办学成果显著

民国时期，在工业类职业学校中，规模较大、办学成果较为显著的是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创办人是高士光。高士光曾经在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船学校、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任教师及科主任等职。抗战期间回到贵州，他谢绝了有关单位高薪聘请，集中主要精力办高工。其办学宗旨是理论与实际并重，聘请的专业课教师都是社会上有名的工

程师，学校设科从当时贵州最急需的人才出发。由于专业对口，教学质量高，在当时“毕业就失业”，其他职业学校学生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还未毕业就有用人单位联系来要人，不存在就业问题，成为办学成果显著的高等职业学校。

1937年，贵州省立贵阳职业学校附设土木工程一班，贵阳有了比较正规的工业职业学校。1941年，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成立，省立职业学校土木工程拨给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另设立机械科，每科招生1个班，共招生90名，校舍位于太慈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需交费入学，但学费比当时的一般高中低，并且每月有教育行政部门发给的30斤左右的大米补贴，家庭困难的同学，可以免费就读。1942年增设应用化学科，学校曾招收中等技工附读，每修完一科发给单科合格证书，全部修完发给合格证书。学校设有实习的工厂，学生可以进去实习，还可以自制机器充实设备及自制部分教学仪器。1947年增设电机科。机械科重点是机械制造和汽车修理，电机科主要是培养电厂技术人员，土木科侧重勘测及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应用化工科培养化工技术人员。

从建校至1949年贵阳解放，共办机械、土木两科各9期，化工科5期，水利训练班3期，共毕业学生1067人。高工毕业的学生一般由学校介绍工作，学土木的被介绍到铁道部门，学机械的被分到贵阳电厂、矿山机械厂，学化工的被分到贵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或留校工作，学水利的和学土木的大都去了贵州各市、县的水文站。另有因工作之需而没有按照对口专业分配的，还有一些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

1950年人民政府接办学校后，土木科交由省交通厅接办，建立贵州省交通学校；机械、电机、化工各科交工业厅，改为贵州省工业学校。

### 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

抗战期间，无论前方和后方都急需大量医务人员，医事职业学校迅速发展。国立贵阳医学院首先创办高级护理职业学校，陆军军医学院附设护士训练班，

卫生署公共卫生训练所迁到贵阳，中央卫生实验医院设有贵阳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贵州省立医院附设的妇产婴医科传习所发展为贵州省立贵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中央医院与中国护士学会合办私立黔筑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贵州省教育厅与卫生处创办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及省立遵义高级医事学校等。在医药类职业学校中，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是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

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创办于1939年，成立时借用大井坎正谊学校为校址（正谊学校当时疏散下乡），原属贵州省卫生处，1942年改隶属于省教育厅。创办时设有护理、助产、药剂、检验、卫生工程、生命统计、口腔卫生等7科，校长由贵州省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所长兼任，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女生，学制3年。卫训所教师在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兼课，专业课聘请各大医院名医授课，其教学设备也供高医使用。

1944年底，日寇入侵黔南，学校迁到清镇县卫城镇；1945年迁回贵阳，贵重图书仪器大部分损失，学校元气大伤。1946年秋，程本礼接任校长，学校秩序逐渐恢复。1946年冬，中央医院迁回南京，学校迁到中央医院原址。1946年12月，卫训所正式撤销，部分人员编入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48年，原属镇远专区的省立镇远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撤销，学生全部合并到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学校规模扩大，专业课教师主要由各大医院著名医师担任，教学质量逐渐提高，设备也逐步充实和完善，以中央医院留下的20张病床的设备，开办了1所小型附属医院，作为实习基地。

从1939年至1949年，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共办理护理科11期，毕业学生99人；助产科10期，毕业学生78人；药剂科4期，毕业生32人。3科共毕业学生209人，大部分后来成了贵州各医疗单位的领导和技术骨干。1950年人民政府接办后，与省立高级护士学校、遵义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及赣东北军区卫生学校合组为贵州省卫生学校。1961年9月，更名为贵阳市卫生学校。2006年1月，升格为贵阳护理职业学院。2021年，贵阳护理职业学院与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合并转设为贵阳康养职业大学。

### 贵阳市商业职业学校——办学时间短暂

抗战时期，贵阳商业繁荣，金融活跃，商业、会计职业学校顺势而生。1935年9月，由唐贡鉴、吴炉章等人发起，创设贵州省会计专修夜校，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会计人才，招收全省高、初中毕业生和公务员入学。普通会计班3个月毕业，高级会计班半年毕业，不久停办。

贵阳市商业职业学校在1943年由贵阳市人民政府和贵州企业公司联合举办，专门培养中等商业人才，仅开办1年就停办了。1946年恢复办学，由省教育厅接办，设有会计科、商科、银行等科。贵州解放后，该校被撤销。

1946年，贵阳市商会创办贵阳商业补习夜校，培训各行各业会计人员，经费由贵阳市商会开支，聘请会计教师3人开班授课，学生由各行业公会保送，每期招收五六十人，毕业后由保送单位安排工作，到1949年共办6期，毕业生350人。

1947年，开办于1942年的广西梧州的私立尚信会计职业学校迁到贵阳，设有两个会计班，出版《尚信会计通讯》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校与其他几所私立会计学校的会计补习班合并，由商业厅接办，改为贵州省贸易中等技术学校，后改成贵州省商业学校，现发展为贵州商学院。<sup>①</sup>

职业教育中，还有补习学校、专修夜校、职业训练所等。1938年成立贵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以“训练妇女职业技能、增进战时生产”为宗旨，省主席吴鼎昌、教育厅长张志韩、建设厅长何辑五及贵州知名人士王仲萧、谢孝思、陈筑山、戴蕴珊等为董事会成员，设有纺织、缝纫、编织、化学、蓄养、园艺等股，培训妇女职业技能。193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贵阳通讯处在达德学校开办职业补习学校，招收店员、职员和失学失业青年入学，办有簿记、会计职业班及工人补习班。

<sup>①</sup> 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354页。

## 五、国立中学对贵阳教育的贡献与促进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许多中学遭到破坏，各战区大批教师、学生流亡。为了安置流亡师生，1938年8月，教育部决定开办一批国立中学，在《国立中学规程》中明确指出：“为谋求战区省立中学教职员及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继续施教与受教起见，特暂设国立中学若干所，以继续发挥教育功能，充实民族力量。”国立中学的设置是抗战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国立中学安置流亡教师和学生，使中等教育能够继续发展。

国立中学直属于教育部，校长由教育部任命，教师由教育部安排，办学经费由教育部拨给，主要招收战区公私立中学的流亡学生。1938年在河南设立国立第一中学，以后依次为国立第二、第三、第四中学……依此类推。各国立大学附属的中学，按其性质也属于国立中学一类。教育部还通过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举办若干中山中学班（高中班），实际上是国立中学的雏形。

抗战时期由外地迁来和在贵州设立的国立中学有：国立三中、国立十四中、国立二十中、国立黔江中学、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国立毕节扶轮中学、国立贵州战时中学、国立汉民中学、国立贵阳青年中学等。其中，内迁和在贵阳设立的国立中学有：国立十四中、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国立贵州战时中学、国立贵阳青年中学。在贵阳设立的大学附属中学有：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些国立中学对推动贵阳的省立、县立和私立中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设在贵阳的国立中学

#### 国立十四中

“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神圣劳动，小农夫爱耕种，神圣劳动，小兵丁爱劳动。为甚读书，为甚读书，为辅助劳动。神圣劳动，美术的意态工，神

圣劳动，音乐的意味浓，神圣劳动，科学的理无穷。为甚读书，为甚读书，为吾人类大众。”<sup>①</sup>这是抗战时期陶行知先生为国立十四中写的校歌，充分体现了大众教育的思想和奋发图强的抗战精神。

“国立第十四中学”原名“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在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教育学院指导下进行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多方面实验。中大原设南京，1938年迁重庆，其实验中学迁贵阳，在贵阳东南郊马鞍山的荒地上建校（今省团校）。因中大与其实验中学分驻两地，不便进行实验，教育部决定将设在重庆的国立第十四中学改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而将迁到贵阳的中大实验中学改为国立第十四中学，以原中大中学部主任杨希震为校长。学制六年，高、初中6个年级各设两班，还有五年制实验班和春季始业班，学生500多名。师生随校迁来，教师多是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沦陷区的优秀教师，学生以流亡学生为主，兼收贵州学生。

国立十四中保持了中大实验学校的优良传统，坚持“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校风，强调“科学的理无穷，音乐的兴味浓，美术的意志工”，要求学生“爱做工”“爱耕种”“爱劳动”“为人类大众”。学生一律住校，统一着装，初中生穿童子军服，高中生穿黄色军装，佩戴校徽、领章，男生剃光头，女生留短发。教学认真，数理化 and 英语教材均用英文原版，课堂教学外举行专题讨论，注重科学实验。严格升留级制度，主科一门不及格留级，两门不及格或考试作弊者开除。组织学生种菜、植树，营造优美、安静的校园环境。班级之间经常开展板报、清洁、演讲、歌咏评比活动，组织歌咏队、戏剧小组，篮球队和排球队常与大夏附中争高下。

<sup>①</sup> 国立十四中校友会：《抗战时期在贵阳的国立十四中学》，载《贵阳百年教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114页。



---

1938年9月，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辗转迁到贵阳马鞍山，改名为国立第十四中学

**学生成绩优异** 1940年公布的全国中学报考大学的升学名额，国立十四中位居榜首。1943年，全国高中生毕业会考，贵州的前10名都是国立十四中的学生。浙大、交大、大夏等大学每年到国立十四中查阅高中毕业班的成绩单，成绩优秀的免试入学。

**人才辈出** 国立十四中在贵阳8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它的毕业生大多数都能考进当时的名牌大学。该校毕业生升学深造后，在国内外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成为某方面专家者不计其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抗日战争时期在贵阳就读于国立十四中。国立十四中的贵州籍学生和留在贵州工作的外省籍学生人才辈出，为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原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安逸夫、原贵州广播电视厅厅长杨德政、原贵州省外事办主任任安东、原贵州省科委主任著名科学家黄威廉、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谭绍凯等，都先后毕业于国立十四中。

1946年，国立第十四中学由贵州省接管，并从贵阳迁往独山县，改省立独山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迁返南京，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2年设立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作为师范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校址在师范学校内。开办时只有教职工12人，学生38名。附中校长由师范学院院长聘任，刘应文、夏伯刚、徐毅、齐泮林（院长）、李敬熙、刘国芳、伍静元等先后担任附中校长。因校舍狭小，都只设单轨班，即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1945年增设高中部，有教职工26人，学生125名；迁到贵阳雪涯路后规模扩大，1949年有高中、初中6个班，教职工46人，学生209名。

1950年，学校与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省立贵阳中学、私立中山中学合并为贵阳一中。<sup>①</sup>1963年，将贵阳第二中学改为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址在外环城东路贵阳师范学院对面。

#### 国立第一华侨中学

国立第一华侨中学（侨一中）于1940年5月在云南省保山市建成开学，华侨学生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免交学费、伙食费。除华侨生外，学校还招收少数来自国内各沦陷区的流亡学生。1942年10月，日机轰炸云南保山，侨一中校舍全部被毁，被迫迁往贵阳清镇办学。卢作敏、刘石心先后担任过校长。侨一中还招收贵州本地学生。

1944年9月日军进攻湖南、广西，贵阳形势危急，侨一中奉命撤销，将高中部并入四川綦江的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初中部划归国立十四中接管，改为分校。1946年9月迁海南岛海口市，改名国立第一侨民中学。新中国成立后

<sup>①</sup> 付宏：《抗战时期贵州的国立中学》，载《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34-38页。

改名海南华侨中学。<sup>①</sup>

1995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在原校址山头上，建造了侨一中旧址纪念碑。2016年9月，百花湖中学、小学正式更名为贵阳华侨中学及贵阳华侨中学附属小学。

#### 国立贵州战时中学

1944年冬，日军进攻湘、桂、黔地区，大量受难同胞，远自江、浙、赣、湘、桂，近至独山、都匀等地，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为安置大批流亡学生，教育部决定在贵阳增设国立贵州战时中学，校址定在南明河畔泰和庄（今贵阳二十中所在地），任命周封歧为校长。

1945年3月，经过登记和甄别考试，将合格的一千多名学生分为19个班级，成为当时贵阳规模较大的完全中学，学生全部是战区流亡到贵阳的学生，伙食、蚊帐、被服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提供。教育部拨给教学用的小电影机和生物影片、幻灯机和幻灯片，高中生物、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仪器。教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努力，很少有缺课者。学校设立校长、秘书、教务、训导、总务三处，会计、医务两室，注册两个组，设有组长和教务员。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军训管理、童军管理、女生指导四组，有组长、文书、出纳、事务人员。会计室设有会计员，医务室设有医生、护士、司药等。

1946年，学校由贵州省接办，改称省立贵州中学，由于大批流亡学生复原回原籍，学生人数减至500余人。1947年奉命撤销，原校舍设备不动，改为私立贵阳中山中学，初高中共15个班级，学生700余人，周封歧继任校长。1950年并入贵阳一中。<sup>②</sup>

① 《贵阳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贵阳百科全书（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

② 孔令中：《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 国立贵阳青年中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驻扎在贵阳市的青年远征军205师改设“国立贵阳青年中学”，直属军政部，由师长许太空任校长，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处和高中、初中及大学预科三部，各处处长和部主任，以及级任导师都由原有军官担任，校址设在贵阳南厂。学校教职工一百余人，学生1800人全是原有士兵，按其文化程度编为大学预科10个班，初中32个班，高中18个班。任课教师由原有军官担任，聘请了贵阳各大中学一些优秀教师兼课。教师和学生均按军阶发给工资、津贴和制服，伙食和其他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大学预科学习1年毕业后，全部保送至全国各大专院校深造；1949年，在校各年级学生全部毕业，学校撤销。<sup>①</sup>

### 省立县立中学的发展

抗战前贵州中等教育处于落后状态，1937年全省只有公私立中学32所，教职员1028人，学生不满万人，以当时贵州1000万人口计算，受中学教育的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当时的学校分为公立、私立两类，公立又分省立和县立。1926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周恭寿任教育厅长，将全省划分为8个中学区，以原来几县合办的联立中学为基础建立8所省立中学，即贵阳一中、赤水二中、遵义三中、安顺四中、都匀五中、瓮安六中、思南七中、镇远八中。1930年增设省立贵阳高中，1931年增设省立贵阳女子中学，1936年将遵义三中改为省立遵义师范学校，共有省立中学9所。1941年，为了更有效地为贵州提供师资和便于督导，教育部令将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团改为贵州省政府教育厅教师服务处，并由省教育厅接办原先的中山中学班，将中山中学班改为省立中学。1942年又复设省立遵义高中，1946年将国立三中改为省立铜仁中学，将国立十四中迁往独山改为省立独山中学，将国立二十中设在桐梓的女子分校迁往威

<sup>①</sup>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宁改为省立威宁中学。

国立中学对贵州中等教育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 1945 年统计，省立中学发展到 20 所（有独立设置的 16 所，附设于其他学校的 4 所），有 9 所是由国立中学和中山中学班发展而来，将近一半；共 141 班（含高中 63 班），在校学生 9386 人（含高中生 574 人），教职工 482 人。贵阳地区有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省立贵阳中学、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和省立清镇中学；遵义地区有省立遵义高级中学、省立桐梓中学、省立赤水中学；铜仁地区有省立铜仁中学、省立思南中学；黔东南有省立镇远中学；黔南有省立都匀中学、省立独山中学、省立瓮安中学和省立平越高级中学；安顺地区有省立安顺中学；黔西南有省立兴仁中学；黔西北有省立黔西中学和省立威宁中学。这种分布引起连锁反应，各地区以省立中学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推动县立中学的发展。

1935 年，贵州的县立中学仅有 14 所。抗战期间，县立中学迅速发展，1945 年有县立中学 71 所，共有 394 班（含高中 14 班），教职员 1401 人，在校学生 17715 人（含高中生 672 人）。此外，罗甸简易师范学校、三都造纸初级职业学校，附设有初中部；除册亨、赫章 2 县外，每个县都有了中学。

#### 国立清镇中山中学班

清镇抗战前无中学，抗战期间国立第一华侨中学迁往清镇五里桥（1938 年），湘鄂教区联合中学迁清镇东山寺（1941 年）。1939 年，驻清镇的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成立中学补习班，招收失学学生。后规模扩大，教育部下令改称国立清镇中山中学班。1941 年 8 月，中山中学移交贵州省教育厅，与正在筹备的清镇初中合并为省立清镇中学，以原清镇中山中学班班主任胡朝惠为校长。学校设有高中 3 个班、初中 3 个班，1945 年初中增至 6 个班，共有 9 个班，教职员 29 人，学生 213 名。1950 年更名贵州省清镇初级中学；1962 年更名贵州省清镇中学；1972 年更名清镇县第一中学；1992 年更名清镇市第一中学，并沿用至今。

省内的中山中学班还有：桐梓中山中学班、兴仁中山中学班、黔西中山中

学班、都匀中山中学班和平越中山中学班。除平越中山中学班外，均由中小学教师战区服务团第四团主办，直属教育部，教师都来自沦陷区，主要招收沦陷区流亡到贵州的学生。改为省立后，师生都转归贵州省，对提高贵州省中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中学教育质量，都有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大多迁回原地，而中山中学班改建的省立中学却留在贵州，外省教师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在贵州，继续为贵州教育做贡献。

### 贵阳县立中学——贵筑县立初级中学

1929年，当时贵阳只有一所省立普通中学，不能满足全贵阳县众多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贵阳县长郑绍臣提议办一所县立中学，选址在贵阳正阳街（今贵阳五中）。1930年创办了贵阳县立中学（简称县中），聘请著名教育家王梦淹为县中校长，教员多由省会公私中学的教师兼任。王梦淹是贵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热爱教育工作。王校长办学认真，受到社会好评。1933年，学校增设高中部，仅一期即被奉令停办。

1937年，县中奉令改为职业学校，两年后，疏散到乌当洛湾，不久，因生源不足停办。1941年，贵阳设市建制，贵阳县改称贵筑县；同年8月，县中恢复成普通中学，改名为“贵筑县立中学”（简称“筑中”），黄耀初任校长。1945年，章孝友任校长时，经贵筑县政府批准，学校迁到花溪，仅一学期，再迁到青岩龙泉寺。1947年，经贵筑县政府与参议会决定，将筑中由青岩再迁回花溪。当年秋天，在花溪设置新校招生，原在青岩的筑中学生仍在原校址就读到毕业。贵筑县中培育了不少人才，如郑代巩烈士（1937、1938年任全国学联主席）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筑中停办，学生合并到花溪中学。

### 多渠道创办私立中学

民国年间的私立学校是指非政府创办的学校，包括私人办学和社会团体〔如教会、会馆（同乡会）〕办学。贵州的私立中学虽然在清末民初不少，但在军阀统治下大都停办，抗战以前存在的只有13所，学生3458人。抗战期间，贵

州处于大西南后方的安全地带，大批流亡教师和学生来到贵州，外地和本地热心教育的团体和个人在贵州兴办学校，促成私立中学迅速发展。多渠道办学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历史悠久的私立小学办起了中学，如私立达德中学、私立正道中学。迁到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在1938年设立附中，以后演变为私立大夏中学、伯群中学。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生来贵阳创办私立清华中学，成为贵州名校。江西会馆在贵阳、遵义、安顺、铜仁创办4所豫章中学，后来四川会馆创办宏雅中学，两广会馆创办两广中学，湘鄂教区联合中学迁到贵州，贵州天主教会办起了私立程万中学，江西辛亥元老李烈均在贵阳创办私立西南中学，富商刘熙乙在毕节创办私立毅成中学，富商赖永初在贵阳创办私立永初中学，等等。

抗战时期政府鼓励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1940年省教育厅制定了《私立学校立案备案办法》《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和《贵州省县立及私立中学整顿办法》，对私立学校的办学和教师聘请做了具体规定，对办学不力、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私立学校予以取缔，对经费不足而办学成绩良好的私立学校在经费上给予特别补助。至1945年，全省经教育部正式备案的私立中学有37所，另有44所私立中学只在教育厅立案或未立案。贵阳的私立中学有清华中学、西南中学、达德中学、建国中学、大夏中学、毅成初级中学、正道初级中学、湘鄂教区联合中学（清镇，内迁教会学校）、豫章中学、永初中学、程万初级中学（教会办）、中山初级中学（修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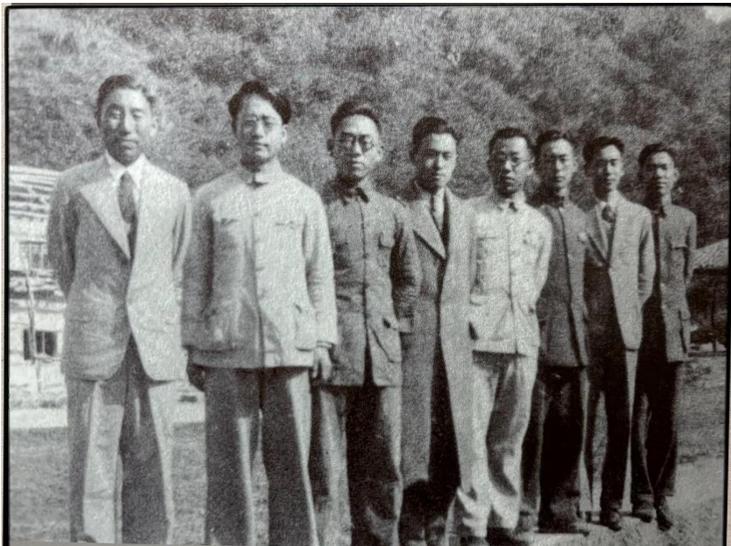
### 私立清华中学

贵山苍苍，富水汤汤。莘莘学子，荟萃八方。宏开讲舍，北胜南强。  
风疾草劲，源远流长。日新又新勿怠荒。同心协力为国光。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sup>①</sup>

<sup>①</sup> 唐树本：《贵阳私立清华中学的创办及其历史背景》，载《贵州教育志通讯》1984年第1期。

这是贵阳私立清华中学的校歌，内容健康，寓意深远，其中蕴含的爱国思想和自强不息精神至今仍值得称赞和倡导。清华中学除有统一的校歌、校旗外，各年级、班也有自己的班歌、班旗。班旗、班歌引导班级同学奋发向上，对班集体的形成和巩固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体现了班级特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大批学生流亡到武汉，清华大学研究生王万福、唐宝鑫（宝心）提议创办一所中学收容流亡学生，得到在武汉的清华同学会和梅贻琦（曾任清华学堂、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等先贤的支持，清华校友徐步墀、李振麟、索天章、冀吉甫、赵永昌、王仁达等人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征得清华大学校长及董事会同意，取名“清华中学”。鉴于武汉形势紧张，不宜办学，决定在贵阳建立清华中学。时值原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他对此大力支持。周诒春认为这所中学由清华校友集体创办，属于“私立”性质，不要政府津贴，可避免政府过多干预。但要在



私立清华中学创办人合影

贵州扎根，必须有地方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参加，提议邀请何辑五、任可澄、李宗恩、虞振镛、章元善、吴泽霖、赵雨圃、程觉民等人为校董，以后又增补叶纪元、杜惕生、徐广迟、彭石年、单葆真、钱存著等人。董事会公推周诒春为董事长，何辑五为副董事长，聘王万福为校长。经费主要由周诒春出面募集，先在贵阳、香港等地募捐，后又通过清华校友、重庆市长征募，又由清华教授朱自清出面向开明书店募捐中学用书。

1938年5月，贵阳私立清华中学正式建立，暂借龙泉街复圣祠作为临时校舍，招收高中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各一班，有学生115人。1938年，在花溪大将山下花溪河畔购得一片土地，先修建两栋二层木结构楼房，楼下作为教室和办公室，楼上作为学生宿舍。以后请清华校友童嵩代作远景规划，设计教学楼、图书馆、礼堂、食堂、宿舍、操场，1943年以前大体竣工。



清华中学毕业证书

清华中学在全省联考、会考中名列前茅，如1943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会考中，清华中学的成绩仅次于国立十四中，在全省居第二名。1948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姚安国、梁燕等人组成“贵阳特别支部”，以清华中学为据点展开活动，发展党员，又吸收师生29人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积极推动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清华中学在不久的时间内就声名远扬，成为战时后方的一所优秀学校。1946年，清华大学决定每年由学校保送5名应届生免试入学，次年又增加3名。学校建校十周年时，历届毕业生平均98.5%升入大学，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华西大学等均要求保送学生免试入校。1947年高中毕业生27名，保送清华北大的就有9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清华中学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有“两院”院士卢良恕、戴复东、萨支唐、屈梁生等科学家，有朱厚泽、丁廷模、赵西林这样的领导干部，有戴明贤、刘复莘、黎培基等艺术家，还有赴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国际名校深造的百余名硕士、博士。

1951年，人民政府接办清华中学，改名为贵州省花溪中学；1985年12月，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恢复清华校名，仍为公办学校。

#### 私立大夏大学附中——伯群中学

1937年冬，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迁到贵阳，校长王伯群是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1938年6月设立大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大夏附中”，既是大夏教育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又可供大夏教职工子弟就读，设在雪涯路侧的大夏大学内。大夏附中的校长由王伯群兼任，另设附中部主任执行校长职权。大夏大学的教师多在附中兼课。男女学生分部上课，第一年男女部各办高、初中一班，共4班。1939年秋，由上海迁至南宁的部分师生来到贵阳，



王伯群

学生分别插入各班，有高、初中6个班级，学生150人；同时将男女二部合并，实行春、秋两季招生。1942年，贵州举行省中等学校学生演讲比赛，大夏附中荣获高、初中冠军。大夏附中军乐队多次在贵阳演出，开贵阳市音乐演奏会之先河。1944年，学校已有七届毕业生；当年日寇入侵黔南，大夏大学迁往赤水，附中留在贵阳成为一所独立学校，遂改称私立大夏中学。同年王伯群在重庆病逝，为了纪念故校长办学之功，1946年改名贵阳私立伯群中学，迁往大南门外马鞍山（原国立十四中校址）。“大夏”意为“光大华夏”，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办学，强调“师生合作”“自强不息”和“三苦”精神。

从1938年到1949年，大夏（伯群）中学共毕业学生2000多人。1950年，军管会接管学校，并入贵阳一中。

#### 私立正谊中学

贵阳私立正谊中学是由一所历史悠久的小学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萧协臣，联合萧子有、杨伯坚、许镛卿等在贵阳创办“私立正谊两等小学堂”，设址于小河坎肖家祠堂。1911年，萧协臣又与陈自新、刘辑五等创办蕴真女子小学堂，不久“正谊”“蕴真”两所小学堂合并，并称为正谊中学，改为六年制，有高、初中7班，学生310人，萧协臣任校长。“正谊”之名来源于董仲舒之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正谊明道”为办学宗旨，以“诚敬勤朴”4字为校训，聘请名师执教，对学生要求严格，以教学质量高闻名省内，数理成绩特别优良。抗战时期，该校在疏散中损失极大，陈寿轩校长竭力撑持到解放。

抗战时期的贵阳教育受时局影响比较大，发展起伏不定，教育管理比较混乱，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进步思想在各学校中占主流地位。贵阳的教育虽然发展曲折艰难，但是却引领了全省教育的潮流，产生了一批教育家，推动了贵阳乃至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 六、乡村教育短暂兴起



黄质夫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兴起了乡村教育运动。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晏阳初等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张“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黄质夫在《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一文中指出：“我们改造乡村唯一的工具就是教育。”认为“中国民众以乡村人民为多数，而不识字的人也是乡村人民最多，因此，教育必须面向全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居住在广大乡村的民众以少数民族

为主，因此贵州的乡村教育实际上是以民族教育为主。

少数民族教育，起初称为“苗夷教育”，后来为了避免隔阂，改称“边胞教育”“边民教育”“边地教育”“边疆教育”，属于“特种教育”。最先进行“苗夷教育”的是基督教循道公会和内地会，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935 年蒋介石来贵阳，在接见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时，采纳了要重视民族教育的建议，当场表示“在贵州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要提出 10 万元作为苗夷教育经费”，于是成立“贵州省特种教育委员会”，拨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办 12 所边疆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因直属于省教育厅，所以一律定名为“贵州省立 ×× 初级小学”。为消除教会学校弊端，增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专门增设了“中华民族发展史课程”，还在青岩设省立贵州乡村师范学校。1940 年成立“贵州省边民教育委员会”，要求凡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县一律设立“边民教育促进会”。

1942年，在贵州省教育厅第二科设立边疆教育股，并制定《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规定各县国民教育应指定三分之一的学校办理边民教育，要求这些县的46所中学应尽量方便少数民族子弟入学。1945年建立“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以“开发边疆，改进边胞习俗，提高生活水平、文化水准”为宗旨，设立研究、调查、出版3组，研究组下设史地、教育、政经、礼俗、卫生等系，调查组负责边疆问题调查研究，出版组出版《边疆文化丛书》《边铎旬刊》《边铎月刊》。1946年建立“贵州省边地教育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全省边地教育原则及各种实际问题，拟定、审议边地教育各种方案，调整边地教育经费，指导边地青年升学及就业，制定《贵州省政府加强边胞教育办法》，由教育厅长傅启学兼主任委员。

乡村教育的兴起，与全国抗战形势有关。一是政府把边疆教育提上日程。为此，教育部在榕江设立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省教育厅在民族集居区开办边疆小学，设立教育实验区、地方方言讲习所和边疆师资训练所。二是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边疆教育。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吴泽霖、陈国均、梁瓯第等社会学家致力于民族调查并提倡边疆教育，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惠水建立实物区和乡政学院，爱国华侨胡文虎捐资在民族地区创办20所小学，贵阳文通书局出版《苗夷丛书》《边疆问题丛书》《民族学论文集》等，贵阳还成立民族导报社。

### 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

1935年，教育部拨给贵州乡村教育经费8万元，指定以3万元开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教育厅决定把这所学校建在贵阳市青岩镇，取名“贵州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以钱慎哉为校长。为了节省经费，学校以青岩的两所寺庙作为临时校舍，近北门的一所作为校本部，镇中心的一所作为学生宿舍，并在城外办一个农场，为学生提供农业实习用地。学校以培养少数民族师资和基层干部为主，招收全省少数民族学生，因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农村，故冠以“乡村”二字，实属乡村师范性质。从一份已经泛黄的贵州省政府的公文，我们可以窥

见当时政府对于乡村教育和乡村师资培养的关注和重视。

1936年1月20日，在一份由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叶元龙签发的政府令中，明确了设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的目的是：培育苗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师资，招收苗族学生入校学习。除师范部一个班之外，还附设一个初中班，两班各60人，共计招收120人。师范部主要培养中学师资，而初中班主要培养小学教师。

要求包括息烽、修文、开阳、清镇、定番（现在的惠水）、龙里等60个县，每县保送2名学员就读。并对学员的入学资格、考试要求、入学待遇、毕业去向做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师范部学生要求年龄16岁以上、25岁以下，初级中学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初中部学生要求年龄13岁以上、20岁以下，小学毕业或者拥有同等学力。二是所有学生均须苗籍，也包括猯猯（彝族）、狛家（另一种苗族）等，如该县苗族无合格者，就在汉族学生中选择熟悉苗民生活兼通苗族语言的进行保送。三是保送学生由县政府进行初试，初试内容包括笔试（国文、数学、公民、史地）、口试和体格检查，师范部学生为汉族的，加试苗语；到校报到后学校还要进行复试，合格后方可注册入校。四是学生复试合格后，在校就读期间，所有膳食、住宿、书籍、服装免费，一律由学校供给。五是师范部学生三年毕业后，由省政府委派回原籍，开展苗民教育。初中部合格的学生免试升入师范部，但在原籍苗民师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应委派其回原籍服务。

从这份政府令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贵州政府对于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对乡村教育师资培养的投入力度之大，并不亚于其他教育。1936年7月，教育厅再次签发政令，要求各县保送第二期学员就读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共计120名。1937年，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开始公开向社会招生，并扩大了招生规模，除少数民族学生外，兼收汉族学生。共招初中2个班，学生97名；师范3个班，学生104名；共201名学生。

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培训师资统计

培训期数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初中部	师范部	合计
第一期	1936年2月	1938年1月	60人	60人	120人
第二期	1936年8月	1938年7月	60人	60人	120人
第三期	1937年	1939年	97人	104人	201人
总计					441人

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师范学制为三年。课程除公民、国文、算学、理化之外，还加开专业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课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等；必修课有军训和农业知识、农业实践；选修课包括美术、音乐、教育行政等。在当时，青岩乡村师范学校算得上是省内培养乡村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了。作为乡村教育的师资培养摇篮，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在4年时间里，为各个县培养了441名少数民族乡村教师。但对于贵州广大的乡村教育需求而言，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乡村教育师资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广大乡村教育的需求。课程除公民、国文、算学、理化之外，还加开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等专业课，军训和农业知识、农业实践为必修课，美术、音乐、教育行政为选修课。

为了解决乡村师资需求，1937年7月，贵州省成立乡村教育师资训练所，作为乡村教育师资培养的补充。所长由教育厅长叶元龙亲自兼任，学员也由各县保送，训练期5个月，期满后所有学员返回原籍从事乡村教育，其中大部分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由于师资训练所属于短期培养模式，所培养的民族教师只能胜任小学教学。

总之，以贵州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开启的针对广大乡村教育所急需的民族师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教育的师资问题，也促进了乡村教育的规范发展。1939年10月，学校改名为“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次年1月迁往民族聚居区榕江，更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简称“国师”，俗称“榕

江师范”。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榕江办学期间，不仅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教育人才，还推动了乡村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

### 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

贵州作为民族众多的省份，民族语言也是极为丰富的，单是苗族语言就有白苗语、花苗语、红苗语、青花苗语之分。要想更好地发展面向广大民族同胞的乡村教育，学习和研究民族的方言和民俗，加强和各个民族的沟通交流，开展“双语”教学，是乡村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8年贵州省教育厅为了调查、研究贵州各地的民俗和方言，以便实施民族教育，成立了“贵州民俗研究会”，指派郭一岑为主任委员，傅启学为副主任委员，并聘请吴泽霖、宋怀忠、文彦生、蓝端禄等22人为委员，内设体质、心理、语言、社会4组，开展各项调查。同年9月，教育厅召开教育行政会议，全省各中小学校长、各县教育科长、省民众教育馆长、教育实验区主任及社会学家吴泽霖、陈国钧等参加。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会上明确指出：“贵州土著人民，据估计约有300万，唯因风俗习惯不同，致与我生出一种隔阂，而他们也得不到平等受教育之机会，这是一种极大的损失。现在既是全面抗战，当然要动员一切力量。想动员这伟大力量，一定要使土著同胞先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会议决定研究少数民族语言，造就“苗夷教育师资”。

1939年3月，教育厅在青岩设立“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研究苗夷语言以便推行政令，同时培养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小学教师。教育厅长张志韩兼讲习所长，希望通过短期训练，使学员兼通汉语和苗夷语，结业后在民族地区“推行政令”。聘请省内外语言专家做教员，苗族学者杨汉先在讲习所任教。招收学员采取保送与招考相结合的办法，不分族别，年龄在35岁以下，但必须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且谙熟苗夷语言，志愿深入农村服务。学员来自黔东、黔南、黔西40余县，学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学员情况统计（1939年3月—1939年9月）

语言种类	少数民族语言	人数	培训成绩
苗语	白苗语	9	合格
	青花苗语	17	合格
	花苗语	7	合格
	红苗语	9	合格
侗语	侗语	14	合格
布依语	客夷语	29	合格
两种方言	侗语兼青苗语	1	合格
	花苗语兼土夷语（彝语）	3	合格
不详	不详	3	不合格
总计		92	

所学课程有语言学、语音学、苗夷语及卫生知识、军训、公民，主要学习发音和记音。学员学习期间，膳食、制服、课本均由讲习所供给，还发零用钱。学习毕业后，分配教小学的20人，在政府及社教机关工作的15人，到各县文化促进会工作的39人，并选10人参加“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讲习所只办了1期，1939年10月训练结束。在方言所成立后，由于没有教材，各科教学均由任课教师编写讲义，边教学边研究民族语音，至1940年，基本编成方言及语音、记音工具等教材。

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结束后并入贵州省行政人员训练所改为方言组，专门研究翻译方言课本。1940年10月转入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师资训练团。1942年2月，教育厅委托干部训练团举办方言师资训练班。3月1日正式开班，令夷语区（布依语）贞丰、望谟、册亨、郎岱、安南（晴隆）、关岭、普安、安龙等县政府，侗语区榕江县政府，红苗语区松桃、铜仁等县政府保送学员受训，另考录10余人，共60人。其中，夷语组35人，侗语组13人，红苗

语组 22 人。课程分为方言课和公共课，方言有红苗语、青苗语、白苗语、花苗语及侗语、夷语、水家语、侬罗语（彝语）8 种，公共课有语音学、公民、国文、算术、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学方法及国民教育、地方自治、中华民族发展史、农业知识、卫生知识、军训等。原计划办 3 期，每期 9 个月，实际上只办了 1 期，学习时间为半年。第一期培训 101 人，学员毕业后发给证书，全部分配到原县任小学教师，并要求必须服务两年以上才准许升学或改业，否则必须赔偿学习费用。

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的成立，是为了培养出能使用“双语”（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民族教师和能听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教师，但由于培训时间短，加之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并没有实现乡村教育“语言关”的突破。

## 七、社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民国年间社会教育兴起，教育部把社会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系。1912年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1935年贵州省教育厅设立第三科专管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将学校教育“推而广之”，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种全民性的教育。社会教育之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风尚、文化素养、身体素质，陶冶人们的情操，充实人生，增强生计能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推动社会不断改良、进步。社会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文化、科学技术、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影、公民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强化国家、民族意识，宣传抗日救亡，增强抗战信心，加强军事训练和团体意识，成为社会教育的突出任务。抗战期间的社会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大教育”的概念。

### 社会教育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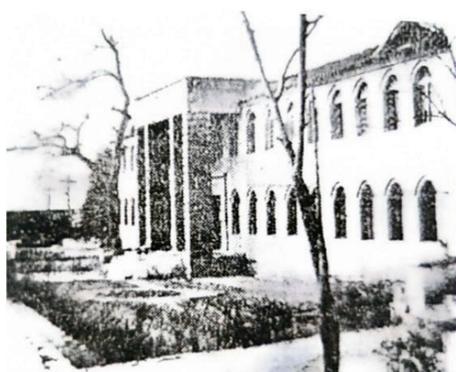
民众教育馆遍及全省。1935年，省教育厅设第三科后，即积极筹备建立民教馆，计划按地理位置建立东、西、南、北、中5所省立民教馆。1936年建立省立贵阳、安顺、遵义3所民教馆及省立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1938年设省立镇远、独山两个民教馆。以后省立民教馆逐年均有增加。在建省立民教馆的同时，县立民教馆也逐年有所发展。1936年建独山等13个县立民教馆；1939年，建贵阳等49个县立民教馆；1940年设铜仁等38个县立民教馆；同年设道真等县民教馆。为培训民教馆工作人员，省教育厅于1938年在贵阳举办民教馆长训练班，时间3个月，招收高中及师范毕业生39人加以训练，毕业后派到各县民教馆工作。1941年和1946年又分别委托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

所办理民教馆工作人员训练班，两期共培训民教工作人员 82 人。到 1942 年，全省有省立民教馆 6 所、县立民教馆 81 所。

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纷纷建立。继创办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之后，1936 年 7 月创办贵州省立图书馆，1938 年建立贵州省立科学馆，1939 年建立贵州物产陈列馆，1943 年建立贵州省立艺术馆。五大馆的建立，标志着贵州文化有重



贵州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于 1935 年 9 月在盘桥侧（今省府西路）成立



贵州省立图书馆于 1936 年在棉花街（今科学路）建成



贵州省立科学馆于 1941 年 10 月在棉花街落成，蓝春池为首任馆长



贵州省立艺术馆于 1943 年成立，与贵州省立科学馆在同一院内。陈恒安为首任馆长，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任第二任馆长

大发展。

据1942年统计,全省图书馆56所(省立1、县立55)、科学馆1所(省立)、艺术馆1所(省立)、体育场95个,还有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公共娱乐场、公园、电化教育服务处、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社会教育工作团、巡回戏剧歌剧团、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等民众教育场所和机构。按当时社会教育包含的内容,社会教育体系在全省已初步建立起来。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1935年9月,在贵州省警察教练所和贵州省法政学校原址(位于今中华路人民剧场、省歌舞团处),成立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简称“贵阳民教馆”),是贵州建立最早、设施比较齐备、经费比较充足、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众教育馆,在全省起示范作用。1943年又在原地建新馆,新馆是一座两层楼的西式洋房,由梁思成的同学、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寓设计建造。

贵阳民教馆有剧院、运动场、茶室、图书馆、阅览室、卫生室、眼病诊疗室、卫生教育展览室、篮球场等,开展了一系列的“为民众服务的业务”,如办理问字、代笔、法律顾问、科学指导、卫生顾问、旅行向导业务,指导公共食堂、宿舍、茶园、理发室、浴室、厕所、公共电话的管理,开办托儿所、诊疗所、游泳池,开展荣誉军人、军人家属服务工作。1940年,贵阳民教馆还举办了说书艺人培训班,帮助民间艺人提高知识水平和表演技能。同时积极推广篮球运动,每逢星期日,都在馆址侧边的篮球场举办“星期篮球赛”,贵阳各机关、学校、军队、民众团体都组织篮球队参加比赛,持续了多年。除此之外,每周放映1次幻灯,普及科学知识,放映3场露天电影,后来还成立“民众电影院”对外营业。由此可见,当时贵阳民教馆扎实开展了丰富的民众教育活动和民众服务项目,都以服务民众生活为主。

1944年,桂林失守,大批文化大家齐聚贵阳,一时间,贵阳成为文化艺术争奇斗艳之地。剧作家田汉在贵阳排演吴祖光的《少年游》,并在贵阳民教馆剧场公演,马思聪在这里举办多场为抗战筹款的公益演出,徐悲鸿也在贵阳

民教馆开办画展为抗战筹款。之后，《少年游》的演出班子并入“民教剧团”，剧团改建为半职业性质，罗军、麦放明等一批专业剧人加入了剧团。剧团延续了10年之久，演出了夏衍的《离离草》《芳草天涯》，曹禺的《雷雨》，吴祖光的《嫦娥奔月》《林冲夜奔》，老舍、宋之合编的《国家至上》和沈游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十多部话剧，还将许多世界名著改编为话剧，如小仲马的《茶花女》，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成为抗日战争中最有影响力的话剧团，成为宣传抗日救亡、发动民众参与救亡活动的主要场所。贵阳解放后，在“民教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贵州话剧团。

### 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

当95岁高龄的青岩镇退休教师丁德华接过曾孙女递过来的糍粑稀饭，并尝了一口时，她满足地笑了笑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味道和她当初在“社教实验区”读书时候的味道一样。老人家说的这个“社教实验区”就是“贵州省青岩义务教育实验区”，而当年实验区的事迹，至今还留在青岩部分人们的记忆中。

1935年10月24日，省教育厅为探索推行民众教育及义务教育的有效办法，决定在贵阳属第四区（青岩）设立“贵州省青岩义务教育实验区”。实验区主任为张学敏，下设社会调查股、学校教育股、生计教育股、健康教育股、公民教育股及设计委员会。实验区内，设有初级学校1所，学制四年，招收适龄儿童入学；设二部制学校1所，学制四年，分上午班和下午班教学；设短期小学9所，1年毕业，招收失学儿童及成年人入学；又以原私塾改设3个短期小学班，1年毕业。这些学校均属初小性质或短期补习，旨在普及基础教育，学生一律免费入学，并供给学生学习用品。招生时，少数民族学生优先，并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单独设班施教，实验区内成绩良好的私塾改为短期小学。经过一年的实践，成绩显著，受到社会各界赞扬。

为推广实验区经验，扩大实验范围，把短期小学、民众教育、社会教育融

为一体。1937年，省政府决定将实验区改名为“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以宋怀忠为实验区主任。宋怀忠，贵定人，早年曾就读于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园林系本科，热心乡村教育。在实验区工作的还有湘湖师范毕业生汪汝衡、晓庄师范毕业生戴自俺。另有李幼章、俞景玉、杨国五、钟在祥、龚琼仙、饶建斌、张培锦、田树藩、方敦明、刘幻云、丁一志、黄明方、莫云、艾玉成、金恒娟、黄重德、赵杰等一批有志于乡村教育的青年也来到实验区，形成了一个热心乡村教育实验和改革的群体。

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以青岩为中心，在青岩镇文昌阁建立了“民众学校”。实验区以宋怀忠、戴自俺、汪汝衡等进步人士为主体，推动社会教育实验和改革。实验区教员以陶行知提倡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为宗旨，本着“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教育服务态度，努力实现“扫除文盲，提高民众文化，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以抗击日寇”的目的。“民众学校”开展社会教育，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具体开设了破除封建迷信、男女文盲补习、失学儿童识字、简易补习、抗日时事宣传和话剧宣传等教育课程。课本采用《农民识字课本》，教育主题明确，在识字教育、破除迷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等侵华事实，介绍我国军民抗敌战况，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抵制日货，积极支持抗战。他们办了一份时事简报，取名《大家看》，摘取当日报纸的重要新闻和本地有教育意义的事件，用毛笔书写张贴在街道中心的阅报栏上，每日一期。并订购一些报刊陈列在实验区，供群众阅读。还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实验区的节目除在当地演出外，还曾到贵阳、惠水等地演出。

实验区采用的课本，除选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外，还选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作为教材，既教了识字，又教了唱歌，还进行了抗日宣传。同时结合实验区特点自编教材，教材内容简明，思想丰富，例如：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菩萨，都不是好汉！吃自己食，靠自己勤力去干。

你姓张，我姓王，农事忙，互相帮。

为密切和群众的关系，实验区还举办敬老会，设立民众代笔问事处。逢年过节，群众的婚丧嫁娶等，实验区都要协助，名为帮忙，实际是通过帮忙对群众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

实验区还利用和群众的良好关系，为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租房子，接待客人。周恩来、邓颖超、李克农等同志的亲属在青岩住了一年多，受到实验区和青岩人民的照顾。

起初，实验区仅局限在青岩周围的摆晚、歪脚、大茨窝、竹林、高山河等苗族、布依族村寨。青岩附近的少数民族村寨，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不愿送女子上学。实验区开办女子补习班时，经过挨家挨户动员，仍只有3个学生报名。补习班教师就带着这3个学生，不管晴天雨天、白天黑夜，挨门挨户上门去教。时间长了，教师与学生家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生逐渐多起来。之后，实验区范围逐渐扩大，沿着贵惠公路延伸，扩大到桐木岭、石头寨、花溪镇、大寨、董家堰、麦达、大水沟、竹林寨、团寨等地。

1940年宋怀中离职。1942年教育厅命令实验区迁铜仁，更名铜仁社会教育实验区，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结束。

## 贵阳文通书局

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四，《贵州公报》上的一则广告成了大新闻，让贵阳的大街小巷沸腾了，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原来是经营盐酒行业的贵阳巨富华家，在报上刊发了广告：

本局为促进文明，开通风气起见，不惜重资特派学生赴日本国精习印

刷图书、制造版片及各种技艺，并选购东、西洋名厂制造之铅印、石印各种机器。能印五彩博物图、地图、古今书籍、学堂凭照、银票、钱票、商标、广告等件。一切书籍欲为洋式装订，亦能照办。又为推广印刷事业计，并自制电镀铜模、花边电版、铜版、凸版、凹版、玻璃版、亚铅版、写真钢目版、毛笔版、三色二色版、铅条、书边、圈点配司、铜线、铅线、照相放大、人物山水写真，一切俱全……

现已克期开局，用特布闻，想亦明达君子所乐闻也。

华家要开办一个文通书局。文通书局做什么，大家不太清楚，但华家做的生意，总能让贵阳人兴奋。

晚清贵阳坊间流传最多的一句话是“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廷瑶代表的高氏家族，田产多，粮食多，所以说“高家的谷子”；贵阳唐家世代为官，家族显赫，出了40多位高官，如云南巡抚唐炯、云南总督唐继尧，所以说“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当然是说华家富裕，钱多。

华家祖上是诗书人家，富裕之后就用知识敬恭桑梓，改变贵州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造福后代。华之鸿选择以出版来发展贵州近代企业，作为自己一生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体现在他除投资办学校、兴教育、培养人才外，还把主要精力和钱财，花费在创办一所规模较大，具有先进机器技术设备的书局上，以便“端赖书籍”“传播新知识”，启迪黔人。他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给自己创办的书局起名“贵阳文通书局”。

华家开办的贵阳文通书局，是一家装备精良的印刷出版公司。从成立时间上看，文通书局比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晚14年，比中华书局（1912）早1年，比大东书局（1916）早5年，



华之鸿



华问渠

比世界书局（1917）早6年，比开明书局（1926）早15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书局之一，仅仅晚于商务印书馆，是贵州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开山鼻祖。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各大书局被迫迁往西南，机器设备难以搬迁，出版事业处于停顿状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华问渠以振兴战时文化，服务桑梓为己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文通书局的发展，在贵阳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成为一个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文化产业，是西南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黔籍著名教育家马宗荣，著名文学家、新闻学家、商务印书馆著名编辑、大夏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谢六逸出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主持图书和《文讯》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有了马、谢两位重量级编辑的加持，文通书局编辑所顺利地成立了由112名业界精英组成的编审委员会，阵容强大至极，是一个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正如《贵阳文通书局》一书所称：“这个编审委员会，可以说是集全国名门与学科名家于一体，融全国英才与名流为

一家。”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水平权威，其中有相当多的委员，是书局的主编、主审、撰稿人、定稿人，既保证了书稿来源的不断，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

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文讯》月刊，提供发表园地供专家学者、作家和一般文学青年发表作品。该刊先由谢六逸任主编，谢病逝后，先后由顾颉刚、白寿彝、娄子匡、岑家梧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该刊由诗人臧克家主持。在此阶段内，《文讯》因其可读性增强、进步性明显而



《文讯》封面

扩大了影响，甚至茅盾、郭沫若也在《文讯》上发表文章。文通书局在出版界享有极大的声誉。

文通书局参与出版中小学教材，是其对教育的突出贡献。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统一大后方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统筹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制发行工作，决定接纳贵阳文通书局参加“国定本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华问渠被推选为“七联处”监事之一，并在重庆等地设立办事处和分局，与教育部及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六个书局联系商洽编辑出版经营业务。在“七联处”中，文通承担供应教科书的比重虽较其他六书局小，但也跻身当时全国七大书店之列。文通书局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语文、算术教材，其中包括《文通初小常识国语教科书》《文通初小算术教科书》《文通高小国语教科书》等。

为适应抗战时期教育的需要，推动后方教育的发展，文通书局出版了大量的普及读物和教辅指导书籍。如编辑出版了《大学丛书》《中学复习受验丛书》《中学自学辅导丛书》《文通青年丛书》《文通少年丛书》《教育丛书》。谢六逸、张永立主编《大学丛书》，共28种，其中，有张世禄的《中国文化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论》，马宗荣的《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国古代教育史》，王裕凯等的《中西教育家》《大学训导之理论与实施》，蓝文征的《中国通史》，李洁菲的《中国近代史》，培林革著、殷炎麟译的《西洋戏剧史》，陈遵妣的《天文学》，何家泌的《植物生理学》，胡树辑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马宗荣、谢六逸主编的《中学复习受验丛书》共10种，包括高初中的国文、本国史、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生物等书。《文通青年丛书》有《二百个为什么》《世界史讲话》《从算数到代数》。《文通少年丛书》共20种，介绍中国物产的有《中国的茶和丝》《中国的米和麦》《中国的煤和铁》等5种；介绍中国历史的有《石器时代》《鸦片战争的故事》《辛亥革命运动史话》《詹天佑》等5种；介绍生物及生理卫生的有《古代生物》《家畜》《牙齿的话》《维生素的故事》4种；介绍儿童文学的有《白雪公主》《狐狸骗西瓜》等4种。《教

育丛书》有杜威著、李相勛译的《经验与教育》《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的经验》《中学教育法》《文盲字汇研究》《心之修炼》6种。马宗荣主编的《大教育家文库》，共12种，研究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管子、朱晦庵、陆象山、王阳明等12位教育家的思想。这些书籍的出版，使贵阳俨然成为抗战后方的教育发展高地。贵阳的各家学校，图书学科品类齐全，学生可以充分阅读，助力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通书局作为一个近代化的文化出版机构，在传播文化思想方面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它的创办并不在于纯粹商业利益驱动，而是有广化文教的使命初心。正如马宗荣所言，书局的宗旨是：介绍专门学术，并求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建国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兼负整理流通地方文献之责。<sup>①</sup>文通书局在贵阳经营44年，编辑出版涉及理、工、农、商、文、史、哲等领域图书，各类教科书及参考书、贵州乡土文献、民众读物及其他时论著述。据何长凤教授统计，文通书局出版各种图书500余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约292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印制的贵州纸币、票据、表册不可计数，创造了贵州出版史上的奇迹，为保存贵州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通书局还“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印刷出版了大批贵州本土文献。其中一类为贵州地方志书、地方文献资料方面的图书。地方志书包括民国《贵州通志》和十余个县的县志，如《瓮安县志》《都匀县志》《兴义府志》等。在这些地方志书中，保存了贵州一些府、厅、州、县的经济文化、人文地理、民族情况、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珍贵历史资料。此外，文通书局还先后编辑出版了《贵州文献季刊》和《贵州文献汇刊》共5期，数百万字。主要刊登当时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地理、制度、人物等的重大科学成果著作。文通书局出版

<sup>①</sup> 马宗荣：《文通书局增设编辑部的动机及其计划》，载《文通书局及其编辑所》，贵阳文通书局民国三十一年版，第5页。

的贵州文献图书保存了近代贵州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文学、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是了解和研究近代贵州发展的重要资料，为贵州文化的保存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胜利后，国内其他书局回迁原址，但因时局动荡，文通书局的出版和发行业务一度陷入低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通书局经历了公私合营的政策调整。1950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决定出版业务由国家统筹管理，文通书局的经营范围被大幅限缩。1952年，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在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之前，文通书局进行了财务清算，尽力解决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确保顺利过渡。至此，文通书局正式走上国营化道路，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附表

3-1 抗战时期内迁或新建的贵阳高等学校一览表

校名	原所在地	迁黔时间	在贵阳地点	离黔时间	备注
私立大夏大学	上海	1938.9	次南门外讲武堂	1946.9	迁黔时间最早，办学时间最长
国立湘雅医学院	湖南长沙	1938.10	湘雅村	1944.12	内迁大学，原为私立，1942年改为国立
国立贵阳医学院	贵阳	1938.3	王家烈公馆、阳明路两广会馆和三圣宫、六广门、太慈桥	2015年改名为贵州医科大学	可算内迁大学，也是贵阳新建的第一所大学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贵阳	1941.10	借文化路贵阳师范学校部分校舍和教室，后搬入大夏大学在雪涯路的校舍	现为贵州师范大学	新建
国立贵州大学	贵阳	1942	花溪	现为贵州大学	新建
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	浙江杭州	1943	花溪	1944年	又称私立之江大学贵州分校

3-2 大夏大学各学院在校学生人数<sup>①</sup>

年份 院别	1930年 (春、秋)	1931年秋	1932年秋	1938年秋	1947年春
文学院	241、157	145	142	70	223
理学院	59、88	107	115	84	335
教育学院	126、216	221	264	140	233
商学院	56、85	125	155	71	628
法学院	75、270	287	324	135	1101
高师(师范专修科)	202、239	272	231	104	—

3-3 大夏大学各学院历年毕业学生人数<sup>②</sup>

年份 院系	文学院	理学院	教育学院	商学院	法学院
1925年	4	1	33	9	9
1926年	12	6	14	10	10
1927年	37	13	18	11	11
1928年	40	9	24	16	16
1929年	44	8	26	13	13
1930年	22	5	40	11	11
1931年	26	10	23	6	6
1932年	17	9	34	15	15
1933年	57	16	60	16	16
1934年	27	23	71	36	36
1935年	20	22	62	46	46
1936年	27	38	82	47	47

① 侯怀银、李艳莉：《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29卷第3期。

② 侯怀银、李艳莉：《大夏大学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29卷第3期。

续表

年份 \ 院系	文学院	理学院	教育学院	商学院	法学院
1937年	5	18	30	12	12
1938年	25	23	43	29	29
1939年	7	24	39	21	21
1940年	17	35	48	17	17
1941年	18	42	34	59	59
1942年	28	34	23	75	75
1943年	17	30	9	71	71
1944年	16	20	10	67	67
1945年	15	18	9	46	46
1946年	16	13	2	38	38
1947年	28	26	25	61	61

## 后 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挖掘整理贵阳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2023年7月，中共贵阳市委决定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程。

为保障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共贵阳市委建立丛书编纂工作协调机制，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保障，办公室设在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由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单位承担具体编纂工作；组建丛书学术委员会，对丛书编纂质量进行评审及学术指导；引入总审订团队，从整体性和规范性上进一步提升丛书编纂质量。

编纂这套丛书，凝聚了各方智慧，汇聚了多方力量，得到了省内外多位专家的精彩指导，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滕伟华同志的悉心指导。省内相关行业的专家及专业人士参与撰稿，以融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地域性与普及性于一体为目标，力争将丛书打造为促进贵阳历史文化繁荣发展、提升贵阳人民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读本，让贵阳这片土地更加厚重，让贵阳这座城市更加灵动，让贵阳市民更加自信，让外来游客更加向往，让贵阳未来更加美好。

《甲秀昌明》是该丛书的教育分册，由贵阳市教育局成立的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编纂小组和顾问小组齐心协力完成。编纂工作历时15个月，编纂大纲三次推翻重来，九易其稿，最终围绕三大专题精选了17个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展现了贵阳600余年教育发展和变迁的辉煌，展现了先辈的智慧与创新精神，展现了贵阳“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

《甲秀昌明》的编纂得到史继忠、郑荣晴、段洪等老师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史继忠老师还提供了大量的教育历史人文资料，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另外，编纂本书查阅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贵州通志》《贵州通史》《贵州教育史》《贵州书院史》《明代的贵州（第二卷）》《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文化西迁到贵州·滚滚的文化潮》《贵阳府志》《贵阳市志·教育志》《贵州摄影史：1846—1912》《贵阳百年图鉴（1901—2000）》等，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引用时未一一标注出处，在此也一并致谢。





